

中西交通史
(一)



方豪著

華岡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方 豪著

中 西 交 通 史
(一)

華岡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中西交通史

本書詳考史前以至近代中西交通事蹟，包括南洋區域在內，闡明民族、宗教、文化、交通、藝術、政治、貿易諸般關係，為中西交通史鉅著。

全書共七十章。分爲五冊。

第一冊由史前至魏晉南北朝，計十七章。第二冊隋唐宋，計二十二章。第三冊元明，計十七章。附圖八。第四冊明清之際，計七章。附圖十。第五冊明清之際，計七章。附圖十五。第四、五冊，並附有「西人原名檢查表」。都百萬言。

The Chinese Library

(A Collection of Great Books of China)

History of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5 Vols

by

Maurus Hao Fang

(July, 1968)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六版

中西交通史 (一)

每部全五冊定價：新台幣二二五元整

編輯者：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一輯

出版者：華岡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一〇八二號

發行者：華岡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華岡于正路一號

電話：八六一〇九二三

郵撥：一〇四二五號帳戶

門市部：華岡書城

地址：台北市農安街三十五號之一

電話：五九四八四五

印刷者：華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華岡大義館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100-1)

例 言

一、本書第一冊止於南北朝；第二冊止於宋；以後續出者，將止於清代中葉。至清代中葉以後之中西交通史實，近人多列於中國近代史，本書不復敘述。

二、本書雖題名為「中西交通史」，但歷代中國與南洋之關係，亦略為述及。

三、外國原名以舉一次（第一次）為原則，但必要時，亦重為列舉。

四、因印刷上之困難，若干外國又原名及音譯，無法照刻，或以他字代替，或竟略去，務請讀者原諒。

五、若十歐洲古代人地名，或按拉丁文及其他文字原讀音，譯其對音，頗與近年國人全照英文讀音譯出者不同。

六、中西交通史為新興學科，書中涉及近人著作及意見處頗多；惟或舉姓氏，或不舉。其不舉姓氏者，係照現行出版法令辦理。

七、中西交通史範圍甚廣，作者才識，烏足語此！勉強從事，但求能藉此獲得讀者之匡正，則萬幸矣！

中西交通史第一冊目次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定義與內容	一
第二節 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興起	三
一 中國學者對於西北史地之研究	三
二 中國學者對於域外地理之研究	七
三 歐美學者對於中國之研究	九
四 日本學者對於中國之研究	三二
五 新疆及中亞之發掘與敦煌學	三六
第二章 史前史上兩問題	
第一節 中國人種之由來	三九
一 人類學上之觀察	三九

二	過去中外學者之意見……………	三
二	中國彩陶與西方彩陶之關係……………	三
第三章	古代傳說中之中西關係……………	
一	中國關於空桐崑崙等地之傳說……………	四
二	中國關於西王母之傳說……………	四
三	波斯關於中國之傳說……………	四
第四章	先秦時代中國與西方之關係……………	
一	春秋攘夷運動與歐亞民族之遷徙……………	五
二	伊蘭及印度文化東傳之路線與時代……………	五
三	北路傳入中國之伊蘭動物紋藝術……………	五
一	騎術之傳入中國……………	五
二	鎧與帶鈎之傳入中國……………	五
四	南路傳入中國之學術思想……………	六

一	南北路傳入西方文化之不同點	六二
二	南路傳入之地理與天文	六三
三	南路傳入之寓言及神話	六七

第五章 漢以前中國知識之西傳

第一節	希羅多德與克對希亞斯之稱述中國	七一
第二節	支那名稱之起源	七三
第三節	中國絲絹之西傳	七七
第四節	亞力山大東征與中西文化交流之關係	八一

第六章 漢代西域之經略(上)

第一節	西域地勢與古代人種	八五
第二節	張騫出使西域之經過	八七
第三節	匈奴在東西文化交流上之貢獻	九三
第四節	日氏西遷之影響及其種屬問題	九五

第七章 漢代西域之經略(下)

- 第一節 中西交通線之開闢……………一九九
- 第二節 中西交通線之保護……………二〇〇
- 第三節 中西交通線之門戶……………二〇四
- 第四節 班超之重振漢威……………二一一

第八章 漢擊退匈奴後之中西交通

- 第一節 漢與中亞各國之關係……………二二三
- 第二節 前後漢中西通道之變遷……………二二七
- 第三節 漢代傳入之中亞地理風土等知識……………二二九
- 第四節 漢代傳入之西域植物與音樂……………二三一

第九章 漢通西域之其他效果

- 第一節 神仙思想之幻滅……………二二五

第二節	騾馱之補充與馬種之改良	一三六
第三節	絲絹之大量西銷	一三〇
第四節	中國灌溉法之西傳	一三四
第十章	漢代中印間之交通(上)	
第一節	印度通於中國之始	一三六
第二節	秦代佛教傳入說之商榷	一三九
第三節	漢代佛教之始傳中國	一四一
第四節	佛教入華與歐亞交通之關係	一四六
第五節	中印曆算關係及佛教藝術之東傳	一四七
第十一章	漢代中印間之交通(下)	
第一節	漢代南方之海外交通	一五四
第二節	漢代西南方之對印交通	一五六
第三節	漢代之中印貿易	一五九

第十二章 漢對黎軒之認識

- 第一節 黎軒之考證……………一六二
- 第二節 漢及後世對黎軒之認識……………一六五
- 第三節 希臘文化之東漸與漢代之希臘譯名……………一六八
 - 一、希臘文化在東方之影響……………一六八
 - 二、漢譯希臘地名……………一六九
 - 三、漢譯希臘植物名……………一六九

第十三章 漢與大秦之關係

- 第一節 大秦之考證……………一七一
- 第二節 公元第一二世紀羅馬印度間之交通……………一七五
- 第三節 後漢書等對大秦之記述……………一七七
- 第四節 中國與羅馬之通使與通商……………一八〇
- 第五節 漢代傳入之大秦等國樂舞……………一八六
- 第六節 羅馬帝國滅亡所受中國之影響……………一八八

第十四章 公元前後希臘羅馬作家關於中國之稱述

- 第一節 拉丁詩人之稱述……………一九三
- 第二節 希臘地理學家斯脫拉波之稱述……………一九四
- 第三節 羅馬哲學家塞納加之稱述……………一九六
- 第四節 羅馬地理學家梅拉之稱述……………一九七
- 第五節 不里尼烏斯博物志之稱述……………一九八
- 第六節 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之稱述……………二〇〇
- 第七節 托勒密地理書之稱述……………二〇一
- 第八節 弗勞羅斯諸人之稱述……………二〇四

第十五章 魏晉南北朝之中西交通

- 第一節 三國志晉書宋書之記載……………二〇六
- 第二節 梁書南史魏書之記載……………二〇八
- 第三節 魏書所記中亞西亞各國遣使來華年表……………二一四
- 第四節 魏晉南北朝與南海諸國之貿易……………二一六

第五節	北朝時外僑之雜居與歸化	二二〇
第六節	朱應康泰之出使南海	二二一

第十六章 漢末迄南北朝與西方各國之佛教關係

第一節	漢末三國時西域譯經師之東來	二二五
第二節	三國及西晉時中國之梵譯名家	二二七
第三節	東晉時東來高僧鳩摩羅什	二二八
第四節	東晉時其他東來高僧	二二九
第五節	南北朝時往來南海之中西僧人	二三一
第六節	隋以前中外求法譯經僧俗總錄	二三三

第十七章 法顯等之訪印及貢獻

第一節	法顯歷遊天竺記傳佛國記研究	二三六
第二節	法顯略傳及其去印路程	二三九
第三節	法顯自印度歸國之路程	二四一
第四節	法顯回國後事略	二四三
第五節	宋雲惠生等之西行	二四五

中西交通史第一冊

杭縣 杰人 方 豪

第一章 導 言

第一節 定義與內容

本書稱「中西交通史」，蓋其主體爲中國。舊時所稱「歐亞交通史」或日人所用「東西交通史」，亦以中國爲主。然以其爲歷史，故中國之地域乃隨時代而不同。

但以方位（西）作研究範圍，本不妥適。如講中國與阿拉伯、印度交通史，往往涉及南洋；談中俄交通史，則又不能避免敘述中國與北方或東北方及西北方之關係。最恰當之辦法，莫如縮小研究對象，劃定區域，如專講中英交通史、中法交通史、中印交通史等，則界限既定，申述亦更能詳明。

今日所以仍用此一名稱者：一爲國人沿用已久，一爲教育部已以此名訂爲大學課目之一。惟今日國人習用之「西」字，蓋指歐洲或兼美洲而言。自明末以來，稱「西學」「西教」「西士」「西書」「西畫」「西樂」，乃至「西醫」「西藥」等等，無不如此。清代中葉以後，震於

西力之東漸，幾有談「西」色變之勢，至清末，張之洞輩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於是「中西」二字之連用，乃尤爲普遍；但其結果，則大至思想學術，下至生活習俗，無不呈中西合璧或中西混合之象；及五四運動以後，乃有東西文化之爭，有贊成全盤西化者，有主張發展傳統文化而僅加若干外來材料以爲補充者。「西」字的今日習慣用法，至此乃更確定爲指歐美而言。

顧就歷史言：中國版圖之疆界固隨時代不同而有變遷，「西」字所指，更因歷代地理知識之差別、國勢之強弱及對外交通之發達與否，而或遠或近，漫無標準。陸上如此，海上亦然。如今日所謂「南洋」，明萬曆間尙稱爲「東西洋」，張燮因有「東西洋考」。足徵方位之稱，最難固定。

本書既沿用舊稱，不能不劃定範圍：大體言之，本書內容將包括歷代中國與歐亞大陸之中國迤西部分之關係而言；然在敘述上有必要時，則亦兼及中國與東南亞（越南、緬甸、暹羅）及南洋等處。

空間之範圍既定，當進而解釋「交通」二字之意義。（近代日人尙有通交、交涉、交流、流通等名。）

「交通」二字之英譯，當爲Relation或Intercourse，則採用「關係」二字，實較妥切。

名字確立之最要因素，乃爲「約定俗成」；如在應用上能確定其含義，則其本身縱稍舛不合，亦不致有重大影響。此本書之所以仍沿舊稱也。

中西交通史所包括之內容，大略如後：

民族之遷徙與移殖；血統、語言、習俗之混合；

宗教之傳佈；神話、寓言之流傳；文字之借用；科學之交流；藝術之影響；著述之翻譯；商貨之交易；生物之移殖；海陸空之特殊旅行；

和平之維繫（使節之往還、條約之締結等），和平之破壞（糾紛、爭執與大小規模之戰圍等）。

第二節 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興起

中西交通史之列爲中國大學課目之一，爲時甚晚，實爲一新興之研究課題；但溯其淵源及所以興起之原因，似不能不歸於後列五者：

一 中國學者對於西北史地之研究

西北爲自古中西交通之孔道，故西北史地研究風氣之發展，乃引起國人對中西關係探討之興

越。此一研究，始於嘉慶年間，其時考證之風正盛，故所採用之研究方法，亦與考證學派有密切關係，或據古以證今，或依今以稽古，更有因宦遊而親履其地者，有因流放而目覩其實者；考證之外，又加調查，此西北史地研究之所以有輝煌之成就也。宦遊從征者如：方觀承之從軍雜記；七十一之西域聞見錄、西域舊聞、新疆輿地風土考、回疆風土記、新疆紀略、軍台道里表；永保創修塔爾巴哈台事宜及烏魯木齊事宜；松筠自撰之新疆疆域總敘及其囑徐松所纂新疆識略、汪廷楷所纂西陲總統事略；和瑛之三州輯略、回疆迪志；鍾方之哈密志、慶林之奉使庫車瑣記；倭仁之沙車紀行；珠克登之喀什噶爾事宜及新疆紀略；周有才之新疆撮要錄；陶保廉之辛卯侍行記；王廷襄之葉柝紀程；王樹枏之總修新疆圖志，親撰國界志、訪古志、禮俗志及新疆小證；宋伯魯成新疆通志之建置志及山脈志；鍾鏞則成實業志與郵傳志，並單行為西疆備乘。遣戍者，若紀昀之烏魯木齊雜記（及其他兩種）、河源紀略；趙鈞彤之西行日記；王大樞之西征錄；曹麟閣之新疆紀事詩及塞上竹枝詞；洪亮吉之天山客話、萬里荷戈集、塞外錄、伊犁日記、天山紀程等；吳熊先之伊江別錄；李鑾宣之荷戈詩草；林則徐之荷戈記程；汪廷楷之修西陲總統事略；祁韻士之西域釋地、西陲要略、皇朝藩部要略、新疆要略等；徐松之西域水道記及校補、新疆識略、漢書西域傳補注等；史善長之輪臺雜記；方士淦之東歸日記；張蔭桓之荷戈集等。

其他尚有傅恒之皇輿西域圖志及西域同文志；齊召南之西域諸水篇；錢恂之中俄界約辭注；許景澄之西北邊界圖地名譯漢考證、帕米爾圖說；黃懋村之西轅日記、崑崙釋、遊歷芻言、和林考、西徼水道等；李光庭之庫爾喀喇烏蘇考，及塔爾巴哈台沿革考；龔棠之廓爾喀不丹合考等。其他涉及蒙古、青海、西藏者從略。但別有純學者數家，不可不特為指出：

沈垚，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優貢生，足未越關塞，而能道絕域山川，重要著述有西北地名雜考、西遊記金山以東釋、西域小記、元史地理志釋、水經注地名釋等。

李兆洛，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進士，著有歷代地理韻編、外藩蒙古要略序（見養一齋文集）等。

張穆，道光中優貢生，用史志體著蒙古遊牧記；又著有西域釋地序、書蒙古源流後等。

魏源，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進士，著有聖武記、元史新編、海國圖志、西北邊域考、外藩疆考、西征厄魯特記、新疆後事記、葱嶺三幹考、綏服西屬國記等。

何秋濤，與魏源同年成進士，著北徼彙編，專談中俄史事，增訂後，文宗賜名朔方備乘；其他尚有遼金元北徼諸國傳、元代西北方疆域考、哈薩克述略。

洪鈞，同治七年（一八六八）進士，出使俄、德、奧、比等國，著有元史譯文證補、中俄交界圖；又西夏國志，未刻。

鄒代鈞，光緒十一年出使英、俄。一生提倡繪圖。著有西征紀程、中俄界記、蒙古地記；又西域沿革考，未刻。

沈曾植，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以進士用。民國十一年始卒。著有元朝秘史注、蒙古源流箋證、元經世大典西北輿地考、史外合注（蒙轡備錄、黑韃事略、西遊錄、異域說、塞北紀程、近疆西夷傳）、島夷志略廣證等。

丁謙，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貢生，對於歷代史籍作有地理考證者凡二十九種，如大唐西域記、西遊記、經行記、西遊錄、異域錄、元秘史、西域求經記、佛國記、穆天子傳及各正史之西域傳、匈奴傳、四夷傳、外國傳等，並作有馬哥博羅遊記補注改訂、元代客卿馬哥博羅遊記地理補注及宋徐靈黑韃事略補注等。

張相文，民國二十一年卒，著有耶律楚材西遊錄今釋、湛然居士年譜、西遊記辨訛、成吉思汗陵寢辨證等。

王國維，民國十六年卒，著有聖武親征錄校注、長春真人西遊記注、西胡考、劉郁西使記校注、劉祁北使記校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蒙轡備錄箋證、黑韃備錄箋證等。

當代學人之尙存或作古未久者，概不列舉。就以上所錄，已足見乾嘉以降，中國學人對西北及邊疆地理之興趣至爲濃厚，由是而推至中外歷史關係之探索，亦爲極自然之事，故近年中西交

通史研究之興起，不能不以此爲第一原因。

二 中國學者對於域外地理之研究

中國學者對於域外地理之研究，乃與中西交通史直接有關，而爲其一部分。域外地理研究之開端，又與元史研究有密切關係。遠者不論，以清代言，清初，邵遠平著元史類編，其後錢大昕有元史考異及元史拾遺，並補元史氏族表及藝文志；汪輝祖成元史本證；魏源著元史新編；而前引張穆、何秋濤、洪鈞、丁謙、張相文諸人之著述中，亦多與元史有關者。秋濤之聖武親征錄校正，用力甚勤；而其朔方備乘中之遼金元北徼諸國傳、元代西北徼諸王傳、元代西北方疆域考，均極精審。洪鈞之治元史，則以能利用海外史料，而爲前人所不及；丁謙考證多而不甚精。李文田之元秘史注，徵引書達六七十種，地理、年代、史實均有比證；又作有耶律楚材西遊錄注、元史地名考、和林金石錄等。近年更有屠寄撰蒙兀兒史記，柯劭忞輯新元史，而達於高潮。

域外地理研究興起之另一原因，則爲鴉片戰爭後海禁大開，出國貿易與考察、出使、留學者踵相接；卽是未出國門者，或親與西人交接，或研讀西人所著外國史地；而西人亦競撰介紹世界情形之書；於是道光以降，談世界情形與記述遊歷之書，遂乘時而起。魏源之海國圖志與

徐繼畬之瀛寰志略，實爲代表之作。

魏源爲林則徐好友，則徐亦曾委人譯四洲志、澳門月報、萬國公法及華事夷言錄要；四洲志卽由源收入海國圖志。此書之史事及考證，雖舛誤時見，然地理之外，更及戰艦、火器與夷情，實當時致用之書，影響及於日本，張之洞稱爲中國知西政之始。瀛寰志略實本於外人原著，且作者對外接觸頗多，凡海國圖志之誤者，類能辨正。梁啓超之初獲世界知識，自云卽賴此書。黃遵憲之日本國志，統該日本之政情、民風及歷史，爲清末言域外地理之傑作，然與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興起，則僅有間接關係。

至於對前人之域外地理著述加以研究者，則有沈曾植之島夷志略廣證，及丁謙之一切地理考證著作，惜其書附會多而根據確實者少，殊不爲學術界所取。

記述出國考察旅行之類者，則有李圭環遊地球新錄、潘鼎珪安南紀遊、李仙根安南雜記、魏源征撫安南記、黃懋村遊歷芻言、印度劄記、陳倫炯東南洋記、南洋記、傅顯緬甸瑣記、李光庭亞刺伯沿革考、俾路芝沿革考、程遜我噶喇吧紀略、黃可垂呂宋紀略；龔柴則於越南、緬甸、暹羅、印度、廓爾喀、不丹、波斯、阿富汗、俾路支、亞洲俄屬等，皆有考略之作；關於亞洲以外者，則出使之記爲多。同治五年（一八六六）總理衙門派斌椿出洋遊歷，實其嚆矢，著有乘槎筆記。繼之者有黎庶昌奉使英倫記、劉錫鴻英軻日記、張德彝航海述奇、使英雜記、

使法雜記、李鳳苞使德日記；遊記之屬，則鄭昌棧、顧厚焜所作多與美洲及非洲有關；沈敦和則對英、法、德、俄皆作有志略；繆祐孫於俄羅斯源流、疆域、水道、山形、戶口等，各有專著。容闈爲我國近代最早之留美學生，並倡導留學，著有西學東漸記。

域外地理發達之又一原因，則爲清代中葉以後，國勢不競，而引起士大夫對時事之關心，梁廷枋卽其一也。梁氏除修有廣東海防彙覽及粵海關志外，並著蘭倫偶說、合衆國說、粵道貢國說、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及夷氛記聞等。林則徐、魏源之貢獻，已見上述。編著外交史者有二人：一爲夏燮（署名江上塞叟），著有中西紀事；一爲王之春，國朝柔遠記卽其所撰述者。

外人在中國編印期刊書冊，以介紹域外史地，間接引起中外交通史之研究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丁韋良（William A. P. Martin）、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茲不備述。

三 歐美學者對於中國之研究

歐美所謂東方學（Orientalology）及漢學（Sinology），又譯華學或中國學，日人稱支那學），其重要研究題材之一，卽爲東西或中西之交通史。

東方學與漢學之興起，蓋由於元代東來西人遊記之逐漸引人注意，新航路與新地之連續發

見，故最初之東方研究，實具有極濃厚之殖民地研究之意味；研究之目的既在協助殖民政策，研究之態度與立論之觀點，遂亦帶殖民色彩；且以爲殖民地人士無研究自身史、地、語言、民族、宗教各方面之能力，於是東方之研究乃爲西人自視爲非伊等莫屬之事。東方學之範圍甚廣，以地區言，則有埃及學、敘利亞學、巴比倫學、印度學、日本學、蒙古學、漢學等。

東方學在任何一地區均屬零星而不成系統者，但以成績言，則均有最初之草創期、進展期與發達期。

漢學之草創期乃明末在廣東、福建(臺灣)、浙江沿海一帶活躍之葡、西、荷冒險家與傳教士之報告，及清初康熙前進入內地之傳教士寄回歐洲之西文函札與著述，及各修會負責人向各該總會長之教務報告，澳門、廣州、臺灣西人之商務上或軍事上之報告，以及麻六甲(Malacca)、臥亞(Goa)、巴達維亞(Batavia)等地所獲得有關中國之消息，而傳往歐洲者。此一時期中，如利瑪竇(Matteo Ricci)研究開封猶太教傳入之經過，並記錄鄂本篤(Bento Goez)自歐洲步行來華之情形，撰成基督教傳入中國史(De Expeditione Christiana apud Sinas)、由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發表，此後則有艾儒略(Jatio Aleni)、會德昭(Alvarez de Semedo)之繼續探討。

最先記述唐景教碑而研究其傳入歷史者爲會德昭，其次則爲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卜彌格 (Michael Boyia)、陽瑪諾 (Emmanuel Diaz) 等，國人方面則有王徵、李之藻、徐光啓輩。

研究猶太教與唐景教之傳入中國，實開研究中西交通史之端緒，而鄂本篤之自陸地來華，則爲當時經海道而來中國者，提供一條新路。

西洋教士既深入中國，且與士大夫接近，中國人渴欲知其來華之行程，西教士亦自述航海經歷，且必希望獲悉在伊等之前，尙有何人曾到中國；而西教士爲壓倒佛教「西天國」說，故必自稱爲來自「遠西」者，利瑪竇且以「西秦」爲號，西秦者，泰西之倒也。署名利瑪竇作之「辯學遺牘」有云：「至於三千大千之說，不知孰見之？孰數之？西國未聞，卽西來士人，曾遊五印度諸國者，其所勸化婆羅門種人，入教甚衆，亦不聞彼佛經中，曾有是說。」

明天啓三年（一六二三）艾儒略撰「職方外紀」，爲我國最早之世界地理書，而於中西交通情形，記述尤詳。最後並有二節專述海舶與海道。崇禎三年（一六三七）艾氏又撰「西方問答」，亦述路程、海舶、海險等。至所著「大西利先生行蹟」，則更可爲當時中西交通之實例。

康熙以後，由於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派遣學識最淵博之教士白進 (Joachim Bouvet)、張誠 (J. E. Gerbillon) 等來華，若輩乃以其實地研究觀察所得，報告歐洲，而使歐洲學術界對中國研究之興趣，大爲增加；加以利瑪竇逝世後，教會內部對於敬天、祭孔、祀祖等

問題，分贊成與反對兩派，互訴於教廷，歐洲有若干大學，亦加入辯論；在華各修會之教士，尤以反對派之多明我會 (Dominicans)，對中國之禮俗，亦群起研究，雙方寄往歐洲之資難函件，對於漢學之進展，實為一大刺激。

一六六六年 (康熙五年) 郭爾倍特 (Colbert) 創設科學院 (Académie des Sciences)，以訂正地理學及天文學上之訛誤，而白進，張誠等即該會所派以求得中國方面之知識者，故漢學在歐洲之得樹其基礎，法國之得為漢學先進國，此科學院實有最大貢獻；而重要之學者，白、張二氏以外，有李明 (Louis Le Comte)、劉應 (Claude Vi delou)、馬若瑟 (Joseph H. de Prémare)、E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雷孝思 (J. B. Régis)、錢德明 (Jean J. Amiot)、馮秉正 (Joseph A. M. de Moyra; de Mailla)、宋君榮 (Antoine Gaubil) 諸人。荷蘭人雖致力於日本及印度之研究，但其著述中亦不乏與中西交通史有關者；至德國與瑞典學者之隨荷人僑寓出島荷蘭商館者，其研究僅限於植物學。一六六一年 (順治十八年) 後，英人對印度亦作有計劃之研究。一七二五年 (雍正三年) 俄帝大彼得派人作第一次東方之探檢，以調查亞洲與美洲間有無海峽。凡此皆有助於東西或中西交通史研究之開展。

同時，在歐洲亦有一空前鉅著出現，即耶穌會士杜赫德 (J. B. du Halde) 於一七二五年 (雍正十三年) 刊行其《中華帝國全誌》，書之全名為「中華帝國及中華屬地韃靼之地理、歷史、

紀年、政治、物產敘述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另有兩書，可與前書鼎立而三者：一為北京各教士研究中國之結晶，名為「北京教士撰關於中國歷史、學術、習俗等之論著」(簡譯為「北京教士報告」)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共十六冊，自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至一八一四年(嘉慶十九年)刊完，歷時四十年；二為「耶穌會士述異借鑑書札集」(簡作「耶穌會士書札集」)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共三十四冊，自一七〇二年(康熙四十一年)至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刊完，凡七十四年。以上三書版本甚多，不能備述。

然漢學之發揚光大期，應始於法人傅爾蒙 (E. Fourmont) 之出刊中國文典 (Grammatica Sinica)。傅氏奉法王路易十四世命，從巴黎外方傳教會(中國黃姓修士(福建興化籍)攻中文，然其書實取材於西班牙教士伐洛 (Francisco Varo) 之官話文法，譯為拉丁文而已。彼又襲取馬若瑟之中國語割記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而疵議之，故其人品實無足取。然法國初期漢學者，皆出其門，稱近代漢學之始祖。

傅氏弟子中之傑出者爲德經 (Joseph De Guignes)；其侄特德來耶 (De Shauricraves) 亦治滿漢語。

德經爲中國人源於埃及說之創始者，一時從者頗多，爲引起歐洲學術界研究中西古代交通之一大問題；其巨著「耶穌基督前迄今匈奴、土耳其、蒙古及其他西韃靼民族通史」(簡作匈奴等民族史)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avant et depuis J. C. jusqu' à present)，成於一七五八年 (乾隆二十一年)。

德經之子小德經 (Christian L. J. de Guignes)，曾任廣東領事，受拿破崙一世命，纂漢法拉丁字典，皇皇巨冊，然實以意大利人熱莫那 (Basilio de Genova) 之中拉字典稿爲藍本，附以法譯而已。

一七九六年 (嘉慶元年) 六月二日，以藍歌鎮 (J. M. Langlet) 之倡議，巴黎東方現代語學校 (L' 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成立，至一八四四年 (道光二十二年) 而設中國語講座，一八八四年 (光緒七年) 設遠東史地講座。

十九世紀以後，歐洲漢學與東方學之其他各國部分，進步甚速，則以語言、歷史、人種、考古等學科研究方法，亦至此時而完成。法國方面，首先造成漢學爲專門學科者乃萊慕沙 (L. Lévy)

el Remusat)，一八二五年（嘉慶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任巴黎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漢學講座之第二任教授；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與德國學者格拉勃洛德（H. J. Klapproth）發起亞細亞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刊行亞細亞學報（Journal Asiatique）。

其後有儒連（Stanislas Julien），皮瀧（E. Biot），德理文（De Saint Denys），沙畹（Emanuel Eduard Chavannes），馬伯樂（Henri Maspero），伯希和（Pelliot），高迪愛（Henri Cordier），格拉納（Marcel Granet），維西愛（Arnold Visièrè），勒維（Sylvain Lévi），格魯賽（Ren Grousset），鄂羅梭（L. Auouveau），費耶（Gabriel Ferrand）諸名家。法蘭西學院之漢學講座，即由萊慕沙、儒連、德理文、沙畹、馬伯樂而遞相主持者。至一九一二年（宣統三年），則為伯希和特設中亞史地考古講座。

東方現代語學校遠東史地講座之名教授，則有高迪愛、格拉納、維西愛等。

法國人主持之東方學刊物有通報（T'oung Pao），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高迪愛所創辦，頗有關於中西交通史之佳作，發行所設於荷蘭萊頓（Leiden）；亞細亞學報，則以印度、西亞、埃及為主；河內遠東法蘭西學校校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七年）創刊，以安南及中國之研究為中心。

一八五五年（咸豐五年）萊頓大學亦設漢學講座，荷蘭之漢學名家有霍弗曼（J. J. Hoffman-

ann)、施古德 (Gustave Schlegel)、格路特 (Jan Jakob de Groot)、維森 (M. W. de Visser)、戴溫達 (J. J. L. Duyvendak)、哈克曼 (Heinrich F. L. Hackmann) 諸人；而施古德協助創辦通報，戴溫達近年主編通報，實為最傑出者。萊頓並出版東方學報 (Acta Orientalia)，為荷蘭、丹麥、挪威東方學會聯合會所辦。有關漢學之論著，殊不多見。

德國漢學之開山祖師，應推基爾旭 (A. Kircher)，著有中國禮俗記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illustrata)，時康熙六年 (一六六七)；至雍正二年 (一七二四) 乃有大哲學家華爾弗 (Wolff) 弟子畢芬格 (Beufinger) 著中國哲學 第二期巨子，不能不推格拉勃洛德，著作之富，且逾法國之萊慕沙；格氏之後有古滋拉夫 (K. F. Augustus Gutzlaff)、莫爾 (Mohl)、紐曼 (K. F. Neumann)、蕭特 (W. Schott)、卜拉特 (Plath)、甲柏連 (Gabriente)、葛羅貝 (W. Gräbe) 諸人。一八八七年 (光緒十三年)、柏林亦成立東方語言學校，有漢文、日文兩部，時德國二十一大學中，有印度學、巴比倫學、埃及學而無純粹之漢學講座；柏林大學則自一八九二年 (光緒十九年) 甲柏連卒後，不復有漢學科；又十五年而葛魯貝卒，並漢文課程亦歸於消滅；碩儒夏德 (Friedrich Hirth) 至失望而赴美！在其前者，格拉勃洛德居俄，莫爾留法，紐曼在英，足徵德國初期漢學之不受人重視也。

一九一二年 (民國元年)，柏林大學設漢學講座，聘荷人格路特為教授；十一年後，福蘭

爾 (Oto Franke) 繼之。

來比錫 (Leipzig) 大學之漢學課程，頗具歷史，甲柏連逝世後，繼之者爲孔好古 (August Conrady)。一九二四年 (民國十三年) 佛蘭克府 (Frankfurt) 大學設中國學院，主持者爲尉禮賢 (Richard Wilhelm)；一九三〇年 (民國十九年) 衛氏卒後，魯雅文 (Erwin Rousselle) 繼任院長。

其餘研究中國者，尙有福爾克 (Alfred Forke)、艾維耐 (Werner Eichhorn)、愛伯華 (W. Eberhard)、土耳其安哥拉大學任教)、明士特爾倍克 (O. Muensterberg)、伯納爾提 (Alfons Bernhardt)、格隆維德 (Albert Grünwedel)、勒可克 (A. Vor Le Coq) 諸人。

德國漢學論文發表刊物，有一八九八年 (光緒二十四年) 刊行之東方語言學校年報、一九一二年 (民國元年) 創刊之東亞年報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後八年出版之東亞輿論 (Ostasiatische Rundschau) 及大亞細亞 (Asia Major)、一九一三年 (民國十二年) 始刊。

英國之漢學研究，當始於一八二三年 (道光三年) 皇家亞細亞學會之成立；十九世紀初有來華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米憐 (William Milne) 等。一八七六年 (光緒二年) 牛津大學始設中國語文講座，最先任教者爲理雅格 (James Legge)；繼其任者爲蘇烈洵 (Soo-ling)；現在牛津講中國哲學宗教者爲休中誠 (F. R. Hughes)。後牛津大學十二年，劍橋大學之

漢學講座亦告成立，威安瑪 (Thomas F. Wade) 爲首任教授；繼之者爲翟理斯 (Allen Herbert Giles)，慕爾 (A. C. Moule)。利物浦，曼徹斯特，倫敦等大學，亦各有漢學一科。

此外可舉者有皮爾 (Samuel Beal)，E 克爾 (E. H. Parker)，衛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斐利浦 (Philips)，霍渥斯 (H. H. Howorth)，華脫斯 (Thomas Watters)，甘爲霖 (William Campbell)，玉爾 (Henry Yale)，拉古貝里 (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斯坦因 (M. Aurel Stein) 諸人。

美國人開研究中國風氣之先者爲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曾在中國傳教並任外交官，回國後，授中國語文於耶魯大學，著有「中國」(The Middle Kingdom) 一書；其後有羅志意 (W. Woodvil Rockhill)，衛廉福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拉士雷特 (Kenneth Scott Latourett) 等。哥倫比亞大學之漢學講座，始設於一九二〇年 (光緒二十八年)，首任教授爲德人夏德；略晚於夏氏二年，亦主講東方學於哥倫比亞者，有洛弗爾 (Berthold Laufer)，亦德人；卡德 (Thomas F. Carter) 等。

美國大學之注重漢學研究者尙有加里福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而以哈佛大學爲最努力，有遠東語文科，並成立哈佛燕京學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以艾利塞夫 (Serge Elisséeff) 爲社長；辦有哈佛亞洲學報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創刊於一九

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此外名家有福爾克、馬克奈阿（Hurlly F. Mac Nair）及摩斯（Morse B. Morse）等。出版物方面，尙有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創刊之美國東方學會會報（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一九三六年創刊之（China Institute Bulletin）等。

歐美其他諸國，治漢學者尙多，姑從略。

歐美之東方學及漢學，於東西（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興起，均有直接間接之關係；其有直接關係者，即研究之方向，大部爲與東西（中西）交通史有關者，特舉若干人於後：

法國漢學家中，萊慕沙有法顯傳（佛國記）譯注；儒連譯有大慈恩三藏法師傳及大唐西域記；沙畹則有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 Kiu Occidentaux，馮承鈞譯，民國十四年，商務），並與伯希和合著中國摩尼教考（民國二十三年馮譯，商務）。勒維有王玄策使印度記。（Les Missions de Wang Huen-t's dans l'Inde，民國二十三年馮譯，載史地叢考）；高迪愛之漢學書目（Bibliotheca Sinica），中國與西洋列強外交史（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及其骨補玉爾之馬可波羅遊記，與契丹紀程錄叢（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又譯注和德理東遊記（Les Voyages en Asie au XIV^e siècle de Odoric de Pordenone），均爲山西交通史之傑作。

馬伯樂、伯希和二人所著甚夥，未遑悉舉。伯氏所著，重要者如交廣印度兩道考（民國二十二年馮譯，商務）、鄭和下西洋考（民國二十四年馮譯，商務）、十六七世紀中國之方濟各會修士、中亞之方濟各會修士、中古中亞之基督教、敦煌古代美術所受印度之影響、古伊蘭在中亞及遠東之影響、西域古代之印度及中國文化等。又蒙古與教廷，馮承鈞譯成未刊。馬伯樂之重要著作，如：唐代安南都護府考、中國與中亞、漢以前中國所受西方文化之影響等。沙海昂（Antoine Charignon）著有馬可波羅行紀（民國二十五年馮譯，商務）。

英國漢學家，理雅格研究景教碑，並譯判法顯佛國記。慕爾著有一五五〇年前之中國基督教，實元代中西交通史權威之作；又與伯希和譯注馬可波羅遊記，爲馬可遊記最精確之本。皮爾著有法顯宋雲合傳、玄奘傳，並譯大唐西域記。衛烈亞力有前漢書西域傳注釋。斐利浦則以馬欽瀛涯勝覽爲中心，研究福建貿易港之沿革。霍渥斯著有九世紀至十九世紀之蒙古史。華脫斯有大唐西域記考釋。甘爲霖專治臺灣史，著有荷蘭人統治下之臺灣 *Formosa under the Dutch*。玉爾所著，已見前。拉古貝里在一八九四年發表其中國文化源於巴比倫之說，著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其說已不復爲今人所取，然頗引起當時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之興趣。（以上若干書原名，見本書第二三冊。）

美國漢學家之撰著，有關中西交通史者，如羅志意之譯注盧白魯遊記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又與夏德合譯趙汝適諸蕃志 *Chu-tu-Kua*, his Work on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夏德(原德人)會譯史記大宛列傳爲英文，著有中國與東羅馬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拉士雷特則有中國基督教史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及中美初期之交涉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洛弗爾之名著中國與伊蘭 *Sino-Iranica*，乃專就植物金石以考中西交通者；又著有中國天主教藝術史 *Christian Art in China*。漢代之陶器 *Chinese Pottery of Han Dynasty* 一書，述及秦漢時代中國藝術所受西伯利亞之影響。馬克奈阿有中國之國際關係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ther Essays*。摩斯著有一六三五年至一八三四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記錄 *The Chronicle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又著中國國際關係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專述近百餘年中國外交史。

四 日本學者對於中國之研究

日本之研讀中國古籍，雖可上溯一千七百餘年前應神天皇時代，皇子稚郎之讀論語；其後，經隋、唐、宋、元、明、清，無論在佛學、理學、詩文及史學各方面無不受中國影響；但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接受世界新文化，日本新史學亦同時出現。日本新史學之發端，在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明治十九年）東京帝國大學聘德國史學家黎斯（Ludwig Riess）任教於新創設之史學科，日人方面，則有坪井九馬三同時受聘。日本輸入新史學方法之初，即劃分國史、中國史、西洋史爲三大組，東西交通史之注意，亦始於此時。而市村瓚次郎之授中國史於學習院，那珂通世之刊印「支那通史」，並注重於中國與亞洲各國間之關係，實開中外交通史之先河。

甲午戰爭後，日人在中學校亦以東洋史與西洋史並重，東洋史則仍以中國爲中心。從事於東洋史之編纂者，有宮本正貫、藤田豊八、市村瓚次郎等，而桑原隲藏所著爲最負盛名。

日人之東洋史，實爲西人所倡導之東方學之一部份，初興之期，名家輩出。若那珂通世有「校正增注元親征錄」、「外交釋史」、「成吉思汗實錄續編」等；所著「支那通史」，並及歐亞大陸各國之歷史關係。「外交釋史」現存四卷，而原定計劃則有二十卷，除與我國及朝鮮歷代之交聘、交通、通商志外，並有西葡通商志、荷蘭通商志及歐美通商志，實爲日本與西方之交通史，規模宏大，惜未完成！市村瓚次郎有「東洋史統」；白鳥庫吉對於中西交通史上之重要關係國，如大秦、拂菻、條支、粟特、赤土、月氏、罽賓、大宛等無不研究；而於肅慎、室韋、匈奴、或就與高麗、蒙、朝鮮等，亦有論著發表。藤田豊八則有「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分

西域、南海二篇；箭內互以蒙古史名，其「東洋讀史地圖」，亦膾炙人口，後由和田清爲之補訂；原田淑人着重於服飾之研究，而西域發見之材料，則頗涉及中西之交通；伊東忠太專重於中國建築史，於中國建築所受外來影響，考證甚詳。

日本之東西交通史權威，宜莫過桑原隲藏，所撰「蒲壽庚考」，實一部宋、元時代之中西交通史，吾國有馮攸及陳裕菁譯本。論文集有「東西交通史論叢」、「東洋文明史論叢」及「東洋史說苑」等。三宅米吉著有「嘉永以前日歐交通年表略」、「古代歐亞大陸交通考」及「二千年前東西文明之媒介者」，頗稱精審。

濱田耕作除致力於考古學外，對於東洋美術史亦有專著，而於東西藝術作風之流傳，頗爲注意。矢野仁一以中國近代史著名，著有「中國近代外國關係研究」，及「近代中國外交史」等；羽田亨則專攻西域，所著「西域文明史概論」，有錢稻孫及鄭元芳兩種擇本，古代中西交通史之名著也。新城新藏與飯島忠天皆爲東洋古代天文學權威，新城主中國古代天文曆法乃中國人自己所發明，如二十八宿之確定，實較印度、天方爲早；飯島則以爲中國天文必受西方影響。飯島有「支那曆法起源考」，新城則有「東洋天文學史研究」，沈濤譯。中川清次郎著「西力東漸本末」，側重於西方之侵略。

較近之日本學術界，尤以在九一八事件及盧溝橋中日戰爭爆發後，研究中日關係史者，仍

不乏其人；研究東西交通史者，已鮮有人專攻中西交通史；而從事日本與西方交通史研究者，則已化整爲零，而專門研究日本與某一國之交通史。

中日交通史，無論在中國或日本立場言，均爲兩國對外關係史之一部分，故亦有間接涉及中西交通史者，而以近代爲多。

中山久四郎（舊姓中村）著有中國史籍上之日本史，載大日本講座第十七卷，於清代文化所予日本之影響，尤爲熟稔；秋山謙藏有「中日交涉史研究」而於元明兩代，似有偏嗜；研究隋唐與日本關係者，有遠藤元男氏；宋代中日關係，則不能不推森克己爲最出色。此外若石原道著、加藤繁、中瀨古六郎等，皆各有貢獻；而辻善之助之「增訂海外交通史話」，及藤田元春之「古代中日交通之研究」與「中日交通史研究」（中、近世篇），尤稱善本。其注意明代中日關係，或日本與華南關係史者，有小葉田淳；用力於日本與南洋交通史，因而亦涉及東西交通史者有岩生成一，而桑田六郎之成就，尤不可忽視，三人前皆任教於臺北帝國大學。

此外則宮崎市定、鈴木俊、杉木直治郎等，皆晚近在京都、九州、廣島等大學授東洋史者。

其純粹研究中西交通史者，年來已日見稀少。石田幹之助著有「歐人之中國研究」及「歐美對中國之研究」二書；後藤末雄著有「中國文化與中國學之起原」及「東西文化之流通」；所

著「乾隆帝傳」及所譯「康熙帝傳」，於兩帝之提倡西學，特別注重。而「中國思想傳入法國考」一書，價值尤高。佐伯好郎所著「中國基督教之研究」，至第三冊而止，近又出「清朝基督教之研究」；而其最早成名之作，則為「景教之研究」與「景教僧旅行誌」，所搜材料頗廣，然其人成見極深，有失史學家風度。瀧口靖夫著「東洋文化史上之基督教」，分波斯、印度、中國等三篇，範圍較廣。新村出所著雖以關於日本天主教（吉利支丹）史者為多，然偶亦撰著中西交通史之論文，有「南蠻記」、「日本吉利支丹文化史」、「吉利支丹研究餘錄」、「新村出選集」（第一卷南蠻篇）、「日本之言葉」等。岡本良知著有「長崎開港以前歐舶來往考」、「十六世紀日歐交通史之研究」及「十六世紀世界地圖上之日本」等。

日本研究天主教史之風氣甚盛，巴夕（Paris）所著法文日本天主教史，有太政官譯「日本西歐史」上下二冊。而近年以全力從事於此者，則有海老澤有道，著有「一切支丹史之研究」、「一切支丹典籍考」、「一切支丹之社會活動及南蠻醫學」等；比屋根安定與主教浦川和三郎亦各有述作；前者有「日本基督教史」，後者有「一切支丹之復活」。姉崎正治有「一切支丹迫害史中之人物事蹟」、「一切支丹宗門之迫害與潛伏」、「一切支丹禁制之終末」等。山本秀煊亦著有「日本基督教史」。

日本之對外交通史，近年已趨於分國及分類之研究，基督教史即為分類研究之一。屬於此

一性質者，如外山卯三郎著「南蠻學考」、日本初期洋畫史考」、「日歐交涉文化論」等；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語學之研究」等；岡田章雄著「南蠻宗俗考」、「南蠻帖」等；古賀十二郎著「西洋醫術傳來史」等；關衛著「西域南蠻美術東漸史」等。

分國之研究，如：武藤長藏作有「日英交通史之研究」；其「對外交通史論」，則包括日葡、日西、日蘭、日英及有關中西交通之論文；日伊協會編有「日伊文化交涉史」。外山卯三郎著「日葡貿易小史」。日葡協會編有「日葡交通之起源」、「日本與葡萄牙」、「日葡通交論叢」、「日葡交通論輯」及「初期耶穌教徒編述日本語言學書研究」等。松波仁一郎著有「菲律賓與日本」。日蘭協會輯有「日本與和蘭」。

日本之東西交通史，或日歐交通史研究，多偏於西洋文化之東漸；中國之中西交通史研究，亦有此現象。金子健二之著「東洋文化西漸史」，後藤末雄之著「中國思想傳入法國考」及山田智三郎著，蘆谷瑞世譯「十七八世紀歐洲美術與東亞之影響」，則作相反之研究。吾人對中國文化之西被，似亦應特加注意也。

日人著述繁多，名家亦復不少，以上為舉例性質，疏漏之處，知所不免。

五 新疆及中亞之發掘與敦煌學

新疆爲古代中西交通之孔道，故新疆地下之發掘，與中西交通史研究之關係最深。率先倡導者爲俄國，其次則英，又其次爲法、德、瑞典、日本、美國，相繼而起。組織探檢隊者，俄有克萊門茲 (D. Klements)，及科茲洛夫 (P. K. Kozloff)；德有格隆維德及勒可克；法則伯希和；日本爲橘瑞超及大谷光瑞；瑞典爲斯文赫定 Sven Hedin 等。

規模最大者，則爲英印度政府所派匈牙利人斯坦因之四次考察，(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八年，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及一九三〇年)先後出「沙埋和闐記」(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古和闐考」(Ancient Khotan)、「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千佛洞」(The Thousand Buddhas)、「亞洲腹部考古記」(Innermost Asia)、「沙漠契丹廢址記」(Ruins of Desert Cathay)、「西域考古記」(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等書，而最後一種，則爲綜合三次探檢之報告，有譯本曰「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所附十九世紀後半期西域探檢略表，值得參考。

至民國十六年，乃有北平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斯文赫定合組之西北科學考察團，發見長城遺址、漢簡、古墓群、壁畫、寫經及其他古物甚多；此後國人黃文弼復兩度往訪今土魯番、庫車一帶，頗有所獲。民國三十一年，教育部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至居延、敦煌等地考察。

至於中亞語言之研究，參加者有法國勒維、德國謝格 (Sieg) 及謝格林 (Siegling)、英國

日雷 (H. W. Bailey) 等；國人亦有力步西人之後，以從事研究者。凡此胥有助於中西交通史之研究，而促其日益進展也。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敦煌鳴沙山千佛洞古卷之發現，使吾國學術研究上獲得極重要之大量史料；且以其中並有梵文、西藏文、回紇文、波斯文、于闐文、龜茲文、西夏文、鞏利文資料，而敦煌又當古代中西交通之要道，故對於中西交通史之裨益為尤多。佛教、火祆教、摩尼教、景教之文獻，均有存者。歐洲學者，除最先劫取之斯坦因、伯希和二人外，參加研究者有沙畹、勒維、馬伯樂等；日本則有羽田亨、狩野直喜、石田幹之助、鈴木虎雄、那波利貞、仁井田陞、松本榮一、高楠順次郎、松本文三郎、石濱純太郎、矢吹慶輝諸氏，皆一時之選。我國學者，則有羅振玉、王國維、羅福成、許地山諸人；其尙生存者從略。

第二章 史前史上兩問題

第一節 中國人種之由來

一 人類學上之觀察

談中國國際關係史，首先應探討者，即中國人種是否由外而來。在中國發現之人類化石，迄今爲止，自以北京人（或譯震旦人；近李濟之先生主張譯爲「支人屬北京種」，見所著「北京人的發現與研究之經過」，載大陸雜誌五卷七期）爲最早，去今約五十萬年，故暫時可假定北京人爲中國最早之人；現在應研究者，即北京人是否由外而來。此本屬於人類學之範圍，茲僅將人類學上之觀察，敘述於此。

（一）北京人是真人，因在發現北京人之房山縣周口店第一採集地點，其灰層中有曾經燃爲之骨、角、火灰遺燼及木炭，均經法國史前學權威步日耶教授（Breuil）鑒定，認爲北京人已具有控制「火」的能力；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稱北京人爲「火」的主人。一般人類學家即以此列北京人爲真人（*Homo Sapiens*）。李濟之先生以爲「北京人用火的能力，可能有更早的傳授」。「這點證明人類智慧的發展，開始於比北京人更早的時代。」（見所著「北

京人的特質與生活」，載大陸雜誌五卷十期)

(二) 北京人或為現代蒙古種人北派之遠祖。北京人研究專家魏敦瑞教授 (Fr. Weidenreich) 曾看出北京人體質，與現代蒙古種人北方一派，有若干類似部分。但北京人是否即係現代蒙古種人之遠祖，尙未為學界一致接受，因 (1) 體質特徵並不全屬於先天的；(2) 尙有若干並不僅限於蒙古種人的體質；(3) 材料不足。

(三) 北京人或原始於中國南方。因長江流域及長江以南，近數十年，已有若干舊石器時代及新石器時代人類遺存物發現，而以廣西武鳴及桂林之洞穴遺存為最重要。近十餘年來，爪哇一帶屢有新猿人發現，乃又有學者認為北京人係由爪哇經中國西南而至北平者，而柯尼格華 (Von Koenigswald) 在香港中國藥店所購得之三枚巨人白齒化石，相傳即採自廣西一帶，此說乃獲得更有力之支持。

(四) 但又有一說，則認為在第三紀末期，在希瓦利克 (Siwaliks) 印度山脈附近，有一種巨猿，從喜馬拉雅西界山中，向東蕃衍，成為中國南方之步氏巨猿 (Gigantopithecus Blacki)，時在第四紀初期或中期。從雲南再出發，分兩股，步氏巨猿或其後裔一部分北行而成中國猿人，一支往暹羅、新加坡而至爪哇，成為古爪哇猿人 (Meganthropus Paleojavanicus) 及粗大猿人 (Pithecanthropus robustus)。見一九四五年魏敦瑞發表 (Giant early man from Ja-

va and South-China) 一書。

(五) 至於較北京人晚四十餘萬年，距今兩萬餘年之「周口店上洞老人」，則體質人類學大師魏敦瑞曾分析保存最完全之三具頭骨，而謂一〇一號（老人）為原始蒙古形，一〇二號（女）為美拉尼西亞 (Melanesia) 形，一〇三號（女）為埃斯基摩形。哈佛大學胡敦教授 (Dr. A. Hooten) 對於兩女性之判斷，同意魏敦瑞看法，但對老人體質，則認為「似為原始歐洲白種人，而雜有古澳洲土人血液」。但須補充說明者，即現代美拉尼西亞人與蝦夷人，一為黑種，一為白種，但均雜有若干他種人血液。憑骨骼以分辨兩萬餘年前人之人種，絕不能十分肯定，然其不屬於同一人種，則為不爭之事實。魏敦瑞有一極重要結論曰：「周口店山頂洞所埋一家人，原屬外來的流動部落；施以攻擊，最後並加以消滅者為周口店土著，此輩周口店土著，實為真正原始中國人之代表。」

可知在荒古時代，在現在中國境內，已有人種上之混合。李濟之先生在「中國民族之始」一文中，謂：「假如我們對於構成中國民族人種成份，沒有預定的成見，我們對於所有在中國境內存在的各色人等及他們在中國民族史的地位，尤其是早期的，都應該予以同等的重視。」（大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

二 過去中外學者之意見

三百年來，歐洲史學家對中國人種來自西方某一地之意見，發表頗多；雖成過去，然既為中西交通史上一頗費爭論之問題，則亦為學者所不可不知。

明末清初以降，歐洲來華教士，對中國漸有較詳之介紹，歐洲學者對中國民族之由來，亦大感興趣。蓋中國舊籍中，時時道及西方，如各書之記周穆王西巡崑崙，會見西王母；「逸周書王會解」所載來朝各國中，多為西方古國，如渠搜（或云渠與搜為二國）、月氏、大夏等；他如詩經有「西方美人」之說，列子有「西方聖人」之語；而黃帝登崑崙及命伶倫赴崑崙採竹以製樂器之傳說，同時亦傳入歐洲，歐人乃以為中國民族實來自西方，但亦分多說：

(1) 有主埃及說者。一六五四年（順治十七年）德國耶穌會士基爾旭著「埃及之謎」(O. J. dipi Aegyptiaci)，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又著「中國禮俗記」，均以中國文字有同於埃及象形字之處，而認為中國人係埃及人苗裔，贊成基爾旭之說者，有同時人卜彌格，亦耶穌會士，曾到中國。反對基氏最力者為弗累累 (N. Freret)，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六日宣讀其論文。但一七一六年另有法國雨愛 (J. B. DuRoi) 主教，從古代海上通商史之研究，而謂印度與中國俱為埃及殖民地，兩國民族，至少大部分屬於埃及人血統。此外作同樣主張者，有於

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發表書札之特梅朗（S. de Mairan），但梅朗之友巴多明，時在北平傳教，則力駁其說。與梅朗發表書函同年，德經則以中國字有似腓尼基字母而謂中國古代史實卽埃及史，且定埃及人遷居中國之年代爲公元前一二二二年，卽周武王十三年；又謂中國文字僅由三個腓尼基字母所造成。以上諸氏皆法人。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英國渥柏敦（Warrington）認爲中國文字係由埃及象形字之流行體演變而成。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法國特保（C. de Pauw）起而反對。不意一七六一年倫敦王家學會尼特姆（Needham）在意大利都靈博物院見一埃及依西斯（Isis）神像，上刻埃及字，由梵蒂岡一中國職員在康熙字典中覓得相同者十二字，乃遍請羅馬名學者證實其說，其時在北平之耶穌會士韓國英（Cibot）竟亦覆書贊成其說。一七七三年福祿特爾（Voltaire）則斥唱此說者徒耗一己之精力，而又浪費他人之精力也。

乃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開羅一阿拉伯古玩商人，揚言在得培斯（Thebes）古墓中發見中國古瓶，前說又復盛極一時。英國威爾根生（J. G. Wilkinson）謂發見不止一處，且在墓中，故非後人所造。然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在中國之英人麥都思（W. H. Medhurst）指爲明代磁器。法國漢學家儒連則推爲公元後七世紀物。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美國摩爾敦（S. G. Morton）則在所著埃及人種志（Crania Aegyptiaca）書中，力言中國人與埃及人非同

種族。實則此等磁器皆爲該古玩商得自紅海與印度間諸通商巨埠者，可謂惡作劇矣。

此外，又有根據公元前五世紀之希臘史家希羅多德 (Herodotus) 及公元前一世紀之西西里史家第奧道羅 (Diodorus) 所述埃及名王拉姆西斯二世 (Rameses) 征服中國事，而主中國埃及同源論者。但第奧道羅之說實襲自希羅多德，而希氏書中並無述及埃及征服中國之迹象，第奧道羅固有「渡恒河，入印度以達於大洋」之語，但顯係後加者，其不足信也明甚。

故以上謂中國人來自埃及諸說，不論其根據如何，至今已爲人吐棄無遺。

(2) 有主巴比倫說者。一八八〇年 (道光六年) 後，倫敦大學教授拉古貝里倡言中國古代之「百姓」卽巴比倫之巴族 (Bak)，而爲「巴克」一音之轉；並謂神農卽薩貢 (Sargon)，倉頡卽圖基 (Dumuzi)，黃帝爲有熊氏，有熊卽那洪特 (Kudur-Nakhurte)，無一非巴比倫名。其說一出，附和者不乏其人。一九一三年 (民國二年) 英教士鮑爾 (C. J. Ball) 著 Chinese and Sumerian 一書，認爲中國文字源自巴比倫；其書發表雖遲，然其研究開端，固與拉古貝里同時也。日本白河次郎、國府種德亦從之，見兩人合著「中國文明發達史」，明治三十二年 (光緒二十五年) 出版。

此說最受清末民初中國學人之歡迎，以當時反滿之情緒甚高，漢族西來之說，可爲漢族不同於滿族之佐證，如丁謙之「中國人種從來考」、蔣智由之「中國人種考」、章炳麟之「種姓

編」、劉師培之「國土原始論」、「華夏篇」、「思故國篇」、黃節之「立國篇」、「種原篇」等。

(3) 有主印度說者。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法國哥皮諾（A. de Gobineau）以爲白種人實負發明文化之責任，埃及文化及中國文化均爲印度民族——即白色阿利安種之首陀羅人——所傳入。

(4) 有主中國文化必源於另一較古民族者。此爲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法國巴伊（S. Bailly）研究巴比倫、印度、中國古代天文學後之結論，彼以爲此三民族之古代科學均爲另一已消滅之民族所傳授，此古老民族似在亞洲，近北緯四十九度處，而向南北遷徙；同時法國生物學家步風（Bretton）亦宣稱人類文化乃發祥於中亞細亞北緯四十度至五十度之處。

其他尙有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英人約翰韋白（John Webb）所創中國語言爲古代人類公用語說；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英人達尼厄爾韋白（Daniel Webb）希臘語源於中國說；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英教士湛約翰（J. Chalmers）及一八七一年艾約瑟中國文字與歐洲語言同出一源說。

以上諸說，或受人之愚，或材料不足，或穿鑿附會，或富於幻想而拙於考訂，不知從人類學、音韻學、考古學着手，作精密之研究，而但憑西人自大之心理，作非非之想，加以武斷，故其結果，無不忽興忽滅，勞而無功也。近年德人里希霍芬（Richtshofen）據魏奮于闐傳而謂中

國人來自新疆；日本鳥居龍藏則主甘肅說；此外又有蒙古說及馬來半島說。英國羅素(B. Russell)及韋爾斯(H. G. Wells)則均謂中國文化爲自己發生，獨立發展，而未藉他助。德國孔好古更證實中國人即產生於黃河一帶，中國文化亦發源於本土。貝樂(Perrot)及胥比士(Chapin)著埃及、加提、亞西利亞美術史，謂中國與其他古國之關係，不啻如土星之與地球。

此外尙有包梯愛(Pauthier)，則提出完全相反之意見，主張中國文字，經西徐亞(Scythians)族之媒介，而產生楔形文字。從其說者甚少。

第二節 中國彩陶與西方彩陶之關係

所謂彩陶，即內有紅色，表面磨光，而有彩繪之土器。

中國彩陶與西方彩陶有無關係一問題，亦爲中西交通史上一會熱烈討論之問題，且有認爲至今尙未能完全解決者，爰述其概。

中國彩陶，因最初發現地爲河南渾池縣仰韶村，故所謂「彩陶文化」亦稱「仰韶文化」，又以其中多數爲紅陶，故又稱「紅陶文化」。係民國十年春，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所首先發現，著有「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書(An Early Chinese Culture)。載「地質彙報」第五卷第一期。三年後，又在甘肅、青海等處考察，加以綜合研究，遂分彩陶文化爲「齊家」

(甘肅寧定縣齊家坪)「仰韶」「馬廠」(甘肅碾伯縣馬廠沿)「辛店」(甘肅洮沙縣辛店)「寺窪」(甘肅狄道之寺窪)「沙井」(甘肅鎮番縣西三十里)等六期，前三期爲史前時代，後三者爲銅器時代，見所著「甘肅考古記」(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載「地質專報」甲種第五號。「彩陶文化」實代表新石器時代晚期，完全爲農業階段文化，其地域則由河南東部而至甘肅、青海。安氏最初置齊家期於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二千七百年。近二十年來，已屢加修正，前三期現置於公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一千三百年，後三期則置於公元前一千三百年至五百年；並認爲甘肅一帶之彩陶，半數爲商周時代遺物。安氏對於甘青彩陶文化之時間性，始終無一定見解，初以其可延展至鐵器時代，最後又以爲至銅器時代。見一九四三年出版 Museum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5 所載氏所著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此爲氏在中國之考古總報告。實則對於古物之研究，時間性與空間性爲最應注意之二點：如廣東海豐之彩陶約早於周漢；其在遼東半島者，或已遲至晚周漢初；新疆之彩陶，則晚至漢代或更後。卽同在河南西部北部之彩陶，可屬於仰韶時期，亦可能爲龍山時期，商周時代，甚或商周以後。安氏初時不知辨此。安氏又往往以爲器物愈古者必愈簡陋，愈精細者必愈晚，然手工業由盛世而演變至衰落者，亦時時可見，此之謂器物退化 (Degeneration)。安陽小屯及其附近之彩陶，與甘、青地區之彩陶，均有此例。或花紋雕

簡而製陶之技術則精，或製作與花紋同時發達，同時衰退。

在「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書中，安氏以爲「仰韶陶器中一部份或與西方文化有關聯，近則與俄屬土耳其斯坦相通，遠則或與歐洲有關。」彼舉出意大利西西里島、希臘北部之啓龍尼亞（Chalceoria）、東歐之格拉西亞（Glacia）、俄國西南部鳩城（Kiev）附近之脫黎波里亦（Tripolie）、多瑙河下游庫庫得尼（Kukuteny）等地所得陶器，與仰韶陶器均有相似之點。其後，法國摩爾甘（J. J. de Morgan）一行考察波斯故都蘇薩（Susa）附近，美國潘費里（Pamphelley）率領卡內基（Carnegie）基金團探檢隊，在中亞安諾（Anau）發掘所獲彩色土器，發見在若干細小部分，固與中國發見者不同，但就全體言，則實有其某種共同之特徵，認爲屬於一脈相承者。若干學者並以爲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三次探檢中亞時，在波斯與印度之間，帕米爾高原西南賽斯登（Seistan）地方所發見之土器，爲最接近中國彩陶之土器。

安特生以爲「花紋式樣固非不可能獨立創作，而不必彼此有所連屬，然河南與安諾之器，其圖形相似之點多而切實，令吾人不能不斷其同出一源」。安氏又以爲「巴比倫在公元前三千年即有彩陶，中國彩陶遠在其後，故必由西來，而非東傳。」

日人石田幹之助著「中西文化之交流」，則更謂「當時中國文化似尙未至於西漸，而西方文化之東漸，亦必不限於彩陶。如此，則新石器時代，歐亞大陸之間，即有交通。」石田幹之

助並推測其路線爲：（一）沿帕米爾南邊東行入新疆，再由南路或北路而至甘肅西端，以達於黃河流域；（二）由帕米爾西部高原，溯阿姆河（Amu Daria 卽古媯水，又名烏濟水）上游，出其東北隅而入新疆；（三）經帕米爾之北，由拔加那（Bokhara）盆地，而出阿賴（Alai）谷地。

安特生中國文化西來說，誤謬之處甚多。甘肅彩陶較河南彩陶爲精，此固不足完全證明彩陶文化之西移；惟安氏謂巴比倫彩陶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而安氏又曾認爲仰韶遺址可推至公元前四千年，如此，豈能謂仰韶文化遠在巴比倫之後？安氏並謂仰韶彩陶與三代鼎鬲相近似，故斷其時代較晚，但現代器物，亦有與古代器物相類似者，又豈可謂古代器物卽現代器物？況言中國文化西來，則新疆應早於甘肅，但實際又不然。

步達生（Davidson Black），曾著「奉天沙鍋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與近代華北人骨之比較」一書，所得結論爲「沙鍋屯及仰韶居民體質與現代華北居民體質同派」，並稱之爲「亞洲嫡派人種」；又證明「甘肅人骨與現在華北（現在甘肅漢人在內）人種相差較遠，而有一部分則與西藏B種人種及西藏甘姆斯人種相似」。步氏之說本可證明漢人在公元前四千年已棲息於華北大平原及附近之山陵地帶，當時甘肅尙爲羌人活動區域，漢人西移當爲周代以後之事。但步氏爲附和安氏，在「甘肅史前人種說略」一書中，反謂：「此種人東移而成爲中國古文化

之主人翁。」甘肅人骨爲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二千年間之物，如此種人爲中國古代文化主人翁，則在此輩以前之仰韶文化從何而來？

如僅就彩陶文化之起源而言，目前顯有三說：安特生等謂起於西方，或來自中亞細亞；但又可分三派：第一派謂彩陶乃隨具有彩陶文化之人種自西而來；第二派謂僅彩陶文化之技術受西方影響；第三派則謂中國人在彩陶文化前即已居住中土；彩陶文化及彩陶文化之民族，乃日後自西方而來者。第一派安特生諸人屬之；發掘安諾遺址之斯密特(Hubert Schmidt)屬第二派；並以脫黎波里亦等地爲西方群，安諾、蘇薩等地爲東方群，中國彩陶屬於西方群，即屬於真正新石器時代之西方文化，由北歐及東南歐傳入中國。瑞典語言學者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則爲第三派。日人濱田耕作偏於第三派，我國學者多以爲起源於豫北；而另一說，雖承認彩陶文化先在黃河流域發達，並向各方傳佈，但對於起源的絕對地點，則以爲非在各地皆作最精密之發掘，且有良好結果，至可以推測其絕對年代之程度，不能解決此一問題。編者以爲彩陶文化東行說較不可信，其最重要理由，即新疆彩陶之製法、文飾及形狀，均顯示其時代晚於甘肅、河南，如彩陶文化確自西來，不應有此現象也。且安特生乃採用簡單方法，推定繁雜之古器物；其本人亦未參與發掘實際工作，僅賴收買、參觀及憑他人告說，而作判斷，其說自難置信。然彩陶文化究起源於豫北？豫西？或甘肅？則爲本國考古學上及史前史上問題，

不在本書範圍以內矣。

(附言)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有「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一文，論及「甲骨文例後記」所稱商代文化頗受外來影響，且推及甲骨文字，謂最初似從索米特克(Semitic)，加以辨正。「後記」原文曰：「索米特克爲東方文字之源，巴比倫、埃及、阿利安、希伯來、阿拉伯文字，均自此來。甲骨文與索米特克相似者頗多，如鳥、人、山、水、園等均似。與甘肅辛店斯彩色陶甕花紋之鳥、人亦復相似。而上帝之帝，與甲骨文帝字，絕無二致，形誼全同，然則疑中國文字外來亦非絕無理也。」

辨正之文曰：

(上略)「甘肅考古記中之鳥、人等，又與銅器、甲骨中字形迥殊。其最顯著易見者，卽銅器、甲骨中畫鳥獸形，多作側式；兩足之鳥，皆作一足；四足之獸皆作兩足。此不但與甘肅考古記之鳥，作兩足者不同，卽求之巴比倫、埃及古物中，亦罕見此形。

卽此一端，已可證明東西風尚之不同，而甲骨文，尤不得與辛店、仰韶之文化，混爲一談。」

近人又因蘇薩彩陶有十字形，甘肅彩陶有巴形(卽太極形)文飾，而謂兩者之間必有關係，蓋巴形之中心卽係十字，而成所謂萬字(卍)。按垂直線爲健康象徵，水平線則象安定；

二線交叉，則象宇宙之起伏；從心理學的解釋，則二者正象人類活動與休息之姿勢。或解十字係象東西南北四方之義，而爲世界象徵。中國漢鏡中有所謂「四神文」，即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余謂以上各種解釋，皆人類心理所共有之概念，並無彼此受影響之必要，又有謂萬字形象鶴之飛，而有吉祥之意；或謂其象紡車之旋轉，而表示動；更有謂象太陽之形與意義者，即象太陽之運動，而天地間運動之意志，亦令人聯想神之本能。但萬字形係直線的，巴形則爲曲線，且帶圓形，而成所謂太極圖，以代表陰陽男女，說明萬物之原始。凡此，皆爲各民族，根據其對自然界之觀察，依其心理上的感覺，智慧上之瞭解，而作其自認爲最適當之解釋，並出之以圖案，不必有其他民族之傳授。

第三章 古代傳說中之中西關係

第一節 中國關於空桐崑崙等地之傳說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謂黃帝西至空桐，登雞頭。或云：空桐即在肅州東南六十里，雞頭即空桐別名；或云：大隴山異名。「莊子」在宥篇亦稱黃帝十九年，往見廣成子於空桐。

空桐之外，中國古代載籍記黃帝西巡之行踪，尙有最著名之崑崙，是爲一山名。「山海經」海內西經第十一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又西山經第二有「崑崙之丘，實惟帝王之下都」之語；「莊子」天地篇記黃帝曾登崑崙，至樂篇同；「穆天子傳」則記周穆王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列子」周穆王篇同。

若溯其源，則崑崙之名，殆首見於「尙書」禹貢。原文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意謂崑崙、析支、渠、搜等四國，其民皆穿皮，總稱西戎。「尙書正義疏」引鄭玄注，則謂渠搜與崑崙、析支，乃三山名也。

「禹貢」以後，「爾雅」釋地、釋丘、釋水，皆述及崑崙，稱爲河所自出。以上二書，學者多認爲戰國時人所作。

此外，則晉時汲縣魏安釐王塚出土之「逸周書」、「竹書紀年」及「穆天子傳」三書，亦記有崑崙。「逸周書」王會解列於正西諸國之首，借與狗國、鬼親，貫胸等相提並論，反令人疑爲同屬子虛烏有之鄉者。「四方獻令」篇以「空同」列正北之首，而以下之國名，如：大夏、莎車、姑他、且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皆有可考。或謂空同在陝西，姑他卽 *Khotsa* 于闐。其後正北方位漸移於西，「管子」稱桓公西伐大夏；而「山海經」海內東經，亦列大夏、月支在流沙外。可知當時已知在北方及西北方有民族遷徙。「竹書紀年」則記：「十七年，王（周穆王）西征崑崙，見西王母。」

「逸周書」與古本「竹書紀年」，其爲戰國時人作，殆亦無疑。至「穆天子傳」，則爲穆王見西王母行程之專書，崑崙之名，尤爲屢見不鮮；「屈原」天問、離騷等篇，亦時及崑崙；茲不贅引。「山海經」對崑崙之描寫，凡九處，「淮南子」亦有數處；「呂氏春秋」本味篇有崑崙之蹟之記述；漢人所輯緯書，崑崙之名，亦層出不窮，更不具引。

◎「前漢書」卷二十一上律曆志記：「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險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云云。」他書載此事者甚多，阮險多作崑崙，如「說苑」卷十九修文篇、「風俗通義」卷六音聲篇等。

中國西部地區，與黃帝有關者，尙有「扶伏」一名，見「太平御覽」卷七九七所引元中記，

謂黃帝之臣茄豐有罪，放於玉門關外二萬五千里，以扶伏而去，稱「扶伏民」。

以上除扶伏一名，爲宋代類書所引古書記述，出現較晚，且無旁證可資研討，阮隲、空桐（後世多作崆峒）似皆爲崑崙別名，或相去不遠者。

且中國古籍中之崑崙，爲國名，爲民族名，爲西部一大山名，已頗複雜；但其後則屢用此名者更多，或冠以大小東西之稱；時而爲南海島名，時而爲東海仙山名；又爲人名，爲黑奴名，極變幻之大觀。

中國古籍中之崑崙究爲今之何地？漢武帝之遣使西域，窮河源亦爲臨時使命之一，故「史記」大宛列傳謂：「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此所謂漢使，張騫後所遣之使也。然山名崑崙，乃天子憑古書而欽賜者，漢使未有此報告；若張騫則更加以否認，故「史記」曰：「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覩本紀（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近人或斷其爲藏新交界處之崑崙山脈，（山脈之說不合現代地質學）或謂其在于闐。國學季刊六卷二號有「崑崙所在考」一文，謂禹貢、逸周書、爾雅、莊子、管子、山海經、穆天子傳、呂氏春秋有關崑崙之記載，完全一致，僅「山海經」略帶神話色彩；漢以後，始有各種謬說出現；又云崑崙卽祁連山脈，余頗以此說爲然。蘇雪林先生著「崑崙之謎」一書，排而未印，

論究甚詳，余獲見其校樣，蓋主張中國之崑崙，與希臘之奧林比司（Olympus）、印度之蘇迷盧（Sumeru）皆為神話的崑崙，其來源則為巴比倫之仙山，此仙山之實際所在，則為阿拉伯半島西北亞美尼亞高原之阿拉拉特（Ararat）山。他說尚多，下節論西王母傳說，當再及之。

第二節 中國關於西王母之傳說

「爾雅」釋名曰：「瓠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西王母蓋為接近中夏極西部之國土或民族名。西王母之化而為居於西方日沒處之神仙，始於戰國之世。「莊子」記西王母成仙事曰：「西王母得之，座乎小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其記他人之朝西王母或西王母朝他人者，有：

「竹書紀年」周穆王條曰：「十七年西征崑崙，賓見西王母。」

「焦氏易林」卷一曰：「稷為堯使，西見王母，拜請百福，賜我嘉子。」

「竹書紀年」又記曰：「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

「風俗通義」卷六音聲篇，則記舜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記西王母獻白瑄者，尚有「大戴禮記」卷十一少間篇、「尚書大傳」等。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稱西王母居於玉山，「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

「淮南鴻烈解」卷六覽冥訓更記羿之妻姮娥，竊羿得於西王母之不死之藥而食之，遂成仙，奔於月中云云。

「史記」卷五秦本紀卷四十三趙世家，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盜驪驂騮騶而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

「列子」卷三周穆王篇記「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主車則造父爲御，……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

夏德著中國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嘗列舉西洋學者對西王母之意見，茲略譯如後：

愛得爾(E. J. Eitel)以爲西王母三字乃譯音，不能望文生義，爲部落名，而其會長亦以此爲名也。愛氏曾於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譯穆天子傳爲英文。

福爾克則謂西王母國當卽今之阿拉伯，西王母乃塞巴國(Sheba)女王。

沙腕會注「往西王母國紀程」(Le Voyage au Pays de Si-wang-mou)，認爲朝西王母者爲秦穆公，非周穆王也。

此外，拉古貝里所著「中國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謂穆王會至和闐、葉爾羌、

吐魯番等地，最遠或會至喀什噶爾云。

夏德本人則謂周穆王之行踪不至越過長城；謂崑崙及其他傳說中之西方名地，在新疆之西部，皆後人所附會。夏德並謂周穆王西遊所遇之民族，是否爲印度人？或波斯人？或土耳其斯坦人？吾人亦無法斷定；穆王東返後，固能帶回中亞一帶神秘區域之若干傳說，然與周代之文化，實無影響可言，蓋外國文化輸入之跡象，尙無所見也。

清末，研究「穆天子傳」者輩起；民國以後，丁謙著「穆天子傳地理考證」；葉浩吾撰「穆天子傳注證補」，載地學雜誌民國九年第五期；顧實撰「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中西交通史料匯篇」（以下簡稱「匯篇」）第一冊斥丁氏「多武斷」，譏顧氏爲「浮誇」。然作者之意見多與丁顧二氏同，如最重要之「崑崙之邱」，三人均謂在和闐南境，其根據卽在吾國人自昔以爲河源應在和闐南境，而崑崙爲河源也。至西王母之邦，丁謙謂卽加提（Chaldaea），顧實以爲卽波斯，「匯篇」作者則推測其在于闐西北，葱嶺稍西之印度庫斯山。但亦僅據漢桓麟「西王母傳」，並轉引「太平廣記」卷五十六所引「集仙錄」之語，加以懸揣而已。

白鳥庫吉以爲崑崙卽西王母，在黃河上流之青海，兩者皆民族名，禹貢之崑崙，卽後日之西王母。蒙古語稱今日之青海爲 Koko Nor，西藏語爲 Tso-ngo-ngo，西王母之古音爲 Si-wong-bo，卽西藏語青海之對音。至於「漢書地理志」金城郡屬縣臨羌縣注，謂：「西北至塞

外，有西王母僊海鹽池」，稱青海爲僊海，亦必爲一音之轉。故「西王母」卽爲今日青海部之歷史上人民。及漢人已譯「*So-wongdo*」爲「西王母」後，後世又以其爲「陰性日沒處」之神仙，乃同時配以扶桑國，取名「東王父」，則純爲後世之傳會。

錄白鳥之言於此，亦聊備一格而已。

第三節 波斯關於中國之傳說

波斯有關於中西交通之傳說，見於第十世紀詩人費杜西 (*Firdusi*) 所著詩史沙那美 (*Shahnameh*) 一書，譯言帝王傳也。茲據一八三八年 (道光十八年) 至一八七八年 (光緒四年) 出版莫爾法譯本 *Le Livre des Rois*，摘錄如下：

(一) 叔哈克 (*Zohak*) 遣人追踪哲姆錫特 (*Jamshid*) 於印度及中國之境。費杜西並記哲姆錫特曾娶馬秦國 (*Machin*) 王馬韓 (*Mahan*) 之女爲妻。「滙篇」作者以爲哲姆錫特卽周璧臣長季綽。穆天子傳云：「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璧臣長季綽于春山之風，妻以元女。」「滙篇」作者與丁謙、顧實均主春山卽葱嶺，並以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竭盤陁國，所記「昔波刺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一節，與此相比附，但以爲「周初時，葱嶺附近，或皆爲波斯之領土，故有是附會，以爲嫁女波斯也。」「馬秦」或以爲卽「大秦」，「馬韓」則穆王

之轉音。凡此皆不外乎假設，姑記於此，以備一說。

(一) 弗利騰 (Feridun) 以韃靼及中國之一部，賜與其次子都爾 (Tur)。

(二) 波斯王蓋各巴特 (Kaikobad) 之子夏胡胥 (Siawush) 曾逃往東方，避難於都拉尼亞國 (Turania)，國王阿弗拉夏勃 (Afrasyab) 以其女弗伶及斯 (Feringis) 下嫁於夏胡胥，並以中國及和闐二地爲妝奩。王女與婿居於和闐東北之公城 (Kumb)。按都拉尼亞爲古代西人對中國及蒙古等地之統稱。

(四) 蓋古斯魯 (Kaikhosru) 年幼時，阿弗拉夏勃曾遣其渡中國海。其勿 (Jiv) 歷盡艱辛，在中國覓獲。或云蓋古斯魯卽居魯士 (Cyrus)。

(五) 蓋古斯魯及魯斯都姆 (Rustum) 合攻阿弗拉夏勃時，中國皇帝乘象，魯斯都姆生擒之。

(六) 蓋古斯魯之繼承人羅拉思拍 (Lohrasp) 嘗命中國及韃靼國王進貢方物。

(七) 古胥答思拍 (Gushasp) 嘗與韃靼王阿爾嘉思拍 (Ariasp) 戰而窮追之，直抵其國都，俘而殺之。

以上所言，或云其爲純粹寓言，但在古代傳說中似不能一無所據；惟年久失真，以訛傳誤，或難以後世所聞，遂難究詰也。

第四章 先秦時代中國與西方之關係

第一節 春秋攘夷運動與歐亞民族之遷徙

若干言中西交通史者，謂必自漢張騫始。但謂張騫以前，缺乏明確之記載可，謂張騫以前，中西無交往之事實則不可；否則，張騫在大夏如何能見有四川出產之蜀布與邛竹杖？試略言先秦時代中國與西方之關係。

日本白鳥庫吉嘗綜其研究亞洲古今民族演變之心得，作結論曰：「南北對抗，東西交通。」蓋因南北之抗衡，則必旁逸而促進東西之交通；因東西交通之發展，又往往重復牽動南北抗爭之形勢。

公元前六〇六年（周定王元年，參見本章第二節）亞述帝國之亡，直接爲米太人（Medes）及加提人所滅，然傾覆之遠因，則爲西徐亞人與西梅里安（Cimmerians）之入侵，致國勢日益衰微；而此二族之西侵，則又受歐亞民族大遷徙之影響。蓋公元前六、七世紀之際，歐亞大陸間之民族分布，大略如下：

西梅里安人在今南俄一帶；

西徐亞人在西梅里安人稍東之地；

索羅馬太人 (Sauromathae) 在裏海之北；

馬薩及太人 (Massagetae) 居處，自黠戛斯 (Kirghiz) 草原至錫爾河 (Sir Daria 古名藥

殺水) 下流；

阿爾其貝衣人 (Argippaei) 在準噶爾及其西一帶；

以色列人 (Issedor) 在塔里木盆地之東；

阿里馬斯比亞人 (Arimaspea) 在河西一帶。

此七民族，爲當時游牧民族之較強大者，自西而東，幾於平行而列；但彼等原住地區，實較上述者，更偏於東，後以六世紀中，最東之阿里馬斯比亞人忽向西攻略，其他民族亦相繼受其影響，而先後被迫西侵，於是最西之西徐亞人與西梅里安人乃侵入亞述，而促其覆亡。

然則最先西侵之阿里馬斯比亞人，其西進原因又何在？則非歸於我國春秋時代之五霸攘夷運動不可。五霸之齊桓公（公元前六八五年至六四三年）、晉文公（公元前六三五年至六二八年）之興起，適當公元前七世紀之後半期，得管仲等爲輔，九合諸侯，高唱尊王攘夷之論，逐北狄、山戎於塞外，此諸族之遷徙，推波逐瀾，而有阿里馬斯比亞人之西移；逐步以推，亞述帝國之亡，其遠因實由於中國之攘夷運動，亦猶後日大夏與安息之滅亡，肇因於匈奴與漢代之對

抗而引起之民族遷徙；羅馬帝國之亡，其遠因亦由於中國之阻止匈奴南下，及匈奴人被迫西移，乃有 Huns（此為拉丁文複數）族之橫行歐陸，引起日耳曼諸族之大動亂，終使羅馬帝國崩潰，其情形正相類似。本書當依次加以研討焉。

第二節 伊蘭及印度文化東傳之路線與時代

中國進入有史時代後，即公元前第九世紀至第六世紀之間，中外交往之遺跡，迄無發現。在龜甲牛骨上或寫或刻之所謂甲骨文字中，亦絕無較遠之外國關係可言。殷代北方多牛，殷人已知用牛耕田。龜非古代北方所產，據書經、詩經、莊子、國語、竹書紀年等書，則龜產於楚，淮夷亦獻龜；而專家鑑定中央研究院發掘所得之大龜，知為南方種；甲骨文每言「有來自南致龜」，或「龜不其南致」，可知殷代之龜，多來自南方，來之方式，則為進貢。然甲骨文所謂南方，應指西南而言，不出今日之湖南。

自公元前第六世紀以降，即中國春秋戰國之世，就已發現之文物言，中國與西方之關係，已有可考知者。

此種關係之接觸路線，可分南北二路，北路乃由西亞直接傳於北方民族，然後傳於中國；南路則由西亞傳至中亞、印度，而入中國。

至於接觸之時代背景，亦可分南北兩路敘述：

(一)北路。公元前四千年前後，蘇末連人 (Sumerians) 開始在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之谷地，即所謂「兩河流域」，肇建其文明基礎；至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閃族人征服其地，承襲蘇末連人文化，並建立巴比倫王國。至公元前七世紀，即我國春秋初年，亞述人又先後征服兩河流域、敘利亞與埃及，造成兼跨亞非二洲之亞述帝國。公元前六〇六年 (周定王元年，亦有主在公元前六〇七年、六一二年或六二五年者。) 加提人與米太人又聯合消滅亞述，代之以加提帝國，亦稱「後巴比倫帝國」；至公元前五五八年 (周靈王十四年，一說公元前五五〇年，或云五三九年。) 加提帝國亦為波斯人所滅。

但同時，高加索與黑海之間，亦有帝國崛起，撒馬提亞 (Sarmatia) 即其中之一；此等帝國均已波斯化；而自中亞細亞以至今日新疆，其時已有用印歐語之民族，雖其中又分伊蘭語及不同之印歐土語，惟東西交通已甚便利。就中國言，則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即商末周初) 黃河流域之漢族，已征服山西、陝西北部之異族，於是東西兩方即發生接觸，而有文化上之交流。

(二)南路。中西之接觸，南路與北路實同時並進。上文所謂印歐語民族，原任於裏海以北，歐、亞兩洲之間，挾其語言，西入歐洲，東逼印度，因稱印歐語，而其人亦即稱為印歐民族，波斯人與米太人皆此族之一支。亞述亡後約半世紀，波斯人興起，首領居魯士先後征服米太

人與小亞細亞各民族，滅加提，建波斯帝國，稱亞基梅尼（Achaemenid）王朝。

亞基梅尼王朝之波斯帝國，以大流士（Darius）統治時期（公元前五二一年至四八五年，周景王二十四年至周敬王三十五年）版圖最廣，東起印度，西迄歐洲東南部，且兼有埃及。伊蘭文化自此即向四方流出，同時亦自國外輸入隣國及較遠國家之文化，蓋在此大帝國統治之範圍內，和平與秩序已能經常維持，隙商亦能繼續按時往來。當時在波斯之西，有希臘文明，東有印度文明，波斯人吸收希臘文明後，復以之輸與印度，印度乃將已混合之希臘、波斯文化再向東輸，而負媒介之任。

中國在同一時代，為抵抗北方異族之入侵，乃有武力統一運動，造成所謂春秋戰國之世，而以秦國勢力為最強大。秦據有關中之地，長城西起隴西郡之臨洮；其時新疆已有印歐系民族，之威名遂迅即傳於伊蘭高原；更因當時波斯與希臘不斷之抗爭，於是波斯所獲有關中國之知識，亦必更往西傳達於希臘，惜文獻無徵，但能懸揣耳。

第三節 北路傳入中國之伊蘭動物紋藝術

周代中葉，中國尚以戰車為軍隊主力，每一戰車有士兵三人：一射箭，一御馬，一持鎗；周末，北方趙、秦二國皆倣效匈奴，代以騎兵。史記卷四三趙世家稱趙武靈王獎勵胡服騎射。

武靈王在位爲公元前三二五年至二九九年。趙土則在今山西、河北。用騎兵，則軍隊服飾亦不能不隨之採取異族式樣，廢棄以犀牛皮製成之硬重鎧甲，而代以鐵練製成或皮製小扣串成之伊蘭式鎧甲。武器如短刀，亦改用外國式；於是箭鞘、刀鞘、刀柄、馬具亦無不染有外國色彩。茲分述之。

一 騎術之傳入中國

說文稱「騎」爲「跨馬」，與「乘坐」不同。六朝以後義疏家，均謂古不單騎，蓋經典無騎字。宋程大昌釋詩經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始發古有單騎之說；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九有騎驛兩條，以爲騎射之法，必有先趙武靈王而用之者。至段玉裁說文注「騎」字，乃謂：「古有單騎而不用之行軍，至趙武靈王始以騎射習戰耳。」但蘇秦遊說六國，云趙、楚各有騎萬匹，燕、魏各有騎六千匹；韓非子亦云：「秦穆公送重耳，疇騎二千」。則春秋及戰國中葉以後，騎兵已頗發達。

按趙最近北方，深知騎兵之可畏，車戰之不足恃，故必學騎射；學騎射，必先採用胡服，否則，不便殊甚。故史記趙世家謂：「始出胡服令」；六國表曰：「初胡服」，皆不言騎射。公子成諫胡服而不諫騎射，以騎射爲國防上所必需，改胡服，則爲舊習所難容。然騎術實自胡

傳入，蓋胡地水草豐饒，爲良好之牧馬地區；其馬又多駿逸，人亦强悍，廣漠千里，適於馳騁。中國騎術雖傳自匈奴，匈奴爲遊牧民族，固易受西方影響，然匈奴騎術與伊蘭系統文化無任何顯著關聯可言也。

二 鎧與帶鈎之傳入中國

中國騎術雖與西方無關，惟馬上馳驅，護身之鎧必以輕便爲宜；此種隨騎術傳入中國之鎧片與鎧環，則皆爲伊蘭式。按我國上古多用皮甲，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五鐵甲皮甲水犀鮫魚條曰：「國語載叔尙之言曰：康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葛洪亦曰：屠犀爲甲；賈逵曰：以兕革爲大甲也。」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又同書卷十一革甲說：「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燦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革爲甲，未用鐵也。」惟自伊蘭式之鎧傳入後，卽改用鐵製。但秦以前亦有用青銅製者，然其形式不可考見。

鎧之外又有帶鈎。高去尋先生撰「戰國墓內帶鈎用途的推測」，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冊，謂中國帶鈎用途，可能有三：一置於肩際，用以掛衣領或佩物；二置於腰部，或綴於腰帶以佩物，或綴於佩物上，而以鈎掛於腰帶；三置於膝部附近，在腰間下垂，帶末端綴帶鈎，以掛佩物，或以帶鈎綴於佩物，以鈎拘腰垂之帶。

帶鈎在周末與前後漢時，頗為盛行。淮南鴻烈說林篇曰：「滿堂之坐，視鈎各異，於裝帶也。」戰國策趙策二武靈王條云：「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飾比，以傅王子也。」「飾比」楚詞大招作鮮卑，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傳作「胥紕」，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作「犀毗」，高誘淮南注作「私鉗頭」，顯係譯音，故不拘一式。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注曰：「漢書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犀胥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帶鈎之來源，有三說：阮元與王國維以為中國革帶有鈎，由來已舊，但用「師比」作帶鈎，則始自趙武靈王之效胡服；徐中舒認為帶鈎乃中國名稱，但既始於胡服而有胡名，故其由外傳來，已無疑義，並證實春秋戰國之際，中國已有帶鈎輸入；薩爾滿尼 (A. Salmons) 以為中國之有帶鈎，約在公元前五百五十年，而歐亞草原之出見帶鈎，約在公元前四百年，故中國帶鈎並不效法西方。（參見上引高去尋文）

反對帶鈎為胡物者，謂戰國策及史漢所云「具帶」乃「貝帶」之譌，淮南子卷九主術篇即有「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之語，後漢高誘注曰：「趙武靈王以大貝飾帶。」史記卷一二五、漢書卷九五佞幸傳序亦有「冠鷓鴣貝帶，傅脂粉」之語，史記集解引漢書引義謂「鷓鴣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設帶。」顏師古注漢書，略同。但史漢稱「冠鷓鴣貝帶」，可知皆為頭部裝

飾品，此貝帶乃冠上之帶，故其下又有「傅脂粉」之語，若腰帶，則不能用冠字，亦不能與「傅脂粉」相連也。國語晉語曰：「鈎近於袪」；三國時韋昭注晉語曰：「鈎在腹，袪在手。」可證鈎在腰帶。漢趙浬撰吳越春秋卷二閩閩內傳曰：「閩廬既寶莫邪，復命于閩山作金鈎。」故「吳鈎」最爲著稱。

藤田豐八「劍峯遺草」有考證犀毗帶與廓落帶一文，爲未完稿，釋犀毗爲滿洲語 *birbi*，有祥瑞之義，廓落爲滿洲語 *borbor*，獸也。滿洲民族，二千年來，受外來之混合最多，以近代滿洲口頭語發音比附古代之漢字讀音，豈有當哉？況卽云犀毗廓落爲外來語端獸之譯音，而張晏於「鮮卑廓落帶，端獸名也」之下，接曰：「東胡好服之」，可知其仍爲東胡之服。

或以爲廓落乃譯音，故或又譯爲廓洛，鈎落，鈎絡，初稱鈎落帶，其後乃分帶鈎爲二。但此物是否爲鈎，有實物可按，宋呂大臨撰「考古圖」卷十，龍大淵撰「古玉圖譜」第五十八、五十七、元朱德潤撰「古玉圖」皆可考，日人長廣敏雄著「帶鈎之研究」，附圖亦多。

前引高去尋先生文，自云相當贊成徐中舒觀點，原因有二：一、爲近年在洛陽、濬縣、渾源、汲縣、輝縣等地所發見有帶鈎之墓葬，最早不晚在春秋戰國之際，稍早於此時之墓，卽無帶鈎出見；二、爲帶鈎在春秋戰國之際，始突然出見而發達，足示當時服裝上之突然改變與革新；其突受利用，可能係受外來文化影響。

吾人今日斷其爲外來物者，一因戰國策在「具帶黃金師比」之前，有一「胡服衣冠」四字，故「具」字卽或爲「貝」字，「師比」卽或爲祥瑞之義，亦皆胡飾也。

其次，吾人所注意者爲美術與工藝上之外來影響，此與瑞獸有關，卽所謂「動物紋」(Animal style)。「動物紋」之圖飾，入中國後而變爲中國之瑞獸，此極自然之理也，但不能謂最初不受外來影響也。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八胡服考曰：「古大帶革帶皆無飾，有飾者胡帶也。」但所謂「飾」，亦有可言者。中國古亦有動物之飾，所不同於西方者，三代古銅器上所表現者，線條硬直，姿態靜止，至秦式銅器出，始變爲寫實的動物紋，至漢代則更近於實物，虎虎有生氣，且在銅、漆、陶諸器及絹布上均有表現。此等動物紋以騎射狩獵爲主，可見其必淵源於遊牧民族，而此等藝術之與騎術同於周末傳入中國，亦可必也。

最初之「動物型」飾品之所以與中西交通史有關，實因其直接傳自東胡，間接則受西徐亞風格之動物紋影響。西徐亞位於南俄，以前爲西徐亞人所居，故稱西徐亞式，動物紋卽其地所流行之一種裝飾，亦稱撒馬提亞式，蓋西徐亞之地曾爲撒馬提亞帝國所統治也。

戰國時代之圖案，以西域之「靈鳥」「靈獸」爲多，所謂「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眞爲此寫照。「靈獸」似卽「海獸葡萄鏡」之獸，或卽獅子。周末秦初，中國盛行鳥類藻

飾，而所謂瑞鳥，則以鳳凰爲主，淮南子稱之爲「天雞」；莊子秋水篇之鴻鵠，亦卽鳳凰之一種，詩疏謂「鳳凰有五：多赤色者乃鳳，多黃色者雛。」秦寶廟闕畫像石文多孔雀，本產於中國南部，惟姿勢之活躍，則爲西域式。

西徐亞紋飾之特色有四：一爲所有圖案，幾全以動物爲題材；二爲僅以巧小物件爲限；蓋在較大之壁畫及雕刻上，以受希臘、埃及之影響爲多，且亦經伊蘭之媒介；但幾經融和，改變遂多，希臘藝術之理想爲安靜，至西徐亞則已崇尚生動；三爲小物件上之每一小空隙，亦必充滿動物紋，動物身體中再有空隙，始加植物以彌補之；四爲動物之姿態多屬於爭鬪、馳驅、互噬，或反首自噬，或稍加變化，反復摩施。甚或在動物之耳、鼻、尾、軀體上，生長另一動物之頭或鳥類之嘴。有時奇怪而不自然，大膽而不實際，此類形態尤以在壺或其他器物之握柄上爲多。

西徐亞藝術傳入中國漢族手中，大受歡迎；在西方原限於小物件者，竟亦應用於壁畫及大規模之雕刻，蓋其時適值中國古代宗法社會崩潰，以儀禮爲主體，專重調和整齊之藝術口趨衰微，受此自由奔放之刺激，單調莊重之風格遂不能不起變化，綏遠出土之青銅器，皆屬此類，卽所謂綏遠式之匈奴文化，其種類則有短劍、鉸具、刀、斧及車馬裝飾。然以此種文化，自西徂東，中途歷經民族甚多，故染有各地特色，在造成綏遠式匈奴文化之前，先有西伯利亞米奴新

斯克 (Minusinsk) 文化，亦不可不知。惟帶鈎最初雖自外傳入，但傳入後不久，即染有極濃厚之我國色彩，此亦有人不以其受有外來變化影響之一大原因也。

第四節 南路傳入中國之學術思想

一 南北路傳入西方文化之不同點

此所謂南路，與上述北路相對而言也，實則皆傳自西方。

北路傳入者為藝術，為軍制、有遺物可資研究，線索甚明，文獻材料亦不乏可供引證者；南路傳入者有異於是：

- (1) 南路輸入者為思想與科學知識，往往無遺物可憑；
- (2) 傳佈者與接受者俱為知識較淺之商人與冒險家，本身之瞭解已感不足；
- (3) 最初東來之商人，阻於黃河，未能深入中國本土；中國溯黃河而西去之商人，阻於沙漠，亦不克出國門，故雙方之接觸僅限於甘肅蘭州附近一帶；
- (4) 雕刻類藝術之欣賞在視覺，易於表現，亦易於模倣；知識與思想須藉語言文字，始能表達傳佈，困難遂多，且易於變質而失真。

由於上述四點，故本節所叙多近於推測，在學術上爲假設而非定論，讀者不可不知。

二 南路傳入之地理與天文

(1) 竊有神話之地理知識。如禹貢首先以印度 *Zora* 山附會於中國之崑崙山；又由尋求印度之四河，而終于誤認即係中國之黃河、黑水及弱水三河。然山海經西山經仍作四水，曰：「(崑崙之丘) 漢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逢；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杆。所不同者，印度之傳說本爲理想，故四水向四方面流，極爲平整；傳說傳入中國後，一變而爲東、西、東南及西南。至於崑崙山或指天山，爲印度人東來必經之路，遂啓中國人河源在崑崙之說，至於「西海」觀念，或由配合東海而發生，非指地中海。此外，鄒衍有大九州之說，其書已不傳，而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曰：「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呂氏春秋有始覽，則有大四極之想像曰：「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近代西人或謂除莊子、孟子、山海經、淮南子、穆天子傳等書各受有西方影響外，中國古代原或有若干部專書，乃完全

記錄西方知識者，書中或尙有圖；不幸此等書久已失傳，但片斷記述尙保存於上引各書中。此則完全爲揣測之詞。

(2) 天文知識。我國古代之天文學，有爲我國自己所發現，而與其他民族不謀而合者；有與其他民族確有相互交流者，故不能謂中國古代天文學全受外來影響，而毫無貢獻也。如中國古曆以十九年之章及七十六年之部爲骨幹，而此兩種週期之存在，亦見於西方，且西方發現時期亦相等於我國戰國時代，此殆不謀而合者。（巴比倫始用十九年章法，在公元前三三三年；雅典在公元前四三二年）若必謂由中國西傳，或自西東漸，皆非短時期所能到達，亦無痕迹可尋也。

惟我國古代天文學中之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爲一年之說；立木於地，以懸垂線確定其正直位置；其應用則有上下午等長日影測定南北線或東西線，用正午日晷最短之日以定冬至，爲一切曆法之基，周禮已測表高八尺，夏至影一尺五寸，冬至影一丈三尺；（見考工記玉人）水星每十二年一週期之運行，及由此一發現而發展爲占星術之周期觀念；戰國時楚人甘公、魏人石申所著星經中之許多恒星位置及其名稱；火星金星之運行；以春分爲首之新曆法；以閏月訂正與實際曆不合之差誤；四季中分配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天分九分野或十二分野，與地上分野相等，人事反映天象，天上十二分野支配地上十二分野等，無不在此時由西方傳

人。

(3) 日晷與漏刻。以上爲天文學說之可能傳自西方者；在事物方面，日晷與漏刻之製造法，亦傳自西方。近人高魯著有「日晷通考」一書：「創用日晷，爲歷史記載中可考者，惟有魯達國王，在西曆紀元前七百四十年。希臘最古之日晷，建在雅典，建設者曰默冬，時爲紀元前四百三十三年。意大利之最古日晷，建在羅馬，建設者曰古梭，時爲紀元前三百〇六年。古有天文家曰埃羅多，謂希臘人以一日之長分爲十二時，用巴比倫人之舊法，創爲有極之日晷，自是而制度定。」亞里士多德，希臘之哲學名家也，生於紀元前二百七十六年，製一日晷，有特殊之點，不用平面，採用球體而空其內部；設置圭表於球之中心，投其影於球之內面，並於此凹面之上刻有圓周，分割度數，可以直接測定光線與圓周所成之角度。」（觀象叢報五卷二冊）按魯達國王，或即指猶太分裂後之猶大王，因以賽亞書第三十八章第八節是及日晷與日影下降度數，時爲公元前七百年左右，但未述及構造。加提天文學家俄勞蘇斯（Eratosthenes），於公元前三四〇年發明半球形而中空之日晷，爲後人所沿用，阿拉伯人至第十世紀猶在做製。至我國古書中則不見有日晷。古代之日影測驗，其目的皆在定方向與節氣，而非時刻。如詩定之方中云：「揆之以日」，傳云：「度日出口入以知東西，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又公劉云：「既景迺岡」，箋曰：「既以日景定其疆界於山之脊。」周禮大司徒、大宗伯與瑞及考工記玉

人、匠人所記「土圭」及「臬」，周髀算經、淮南子天文訓、續漢志律曆志所記「表」或「儀表」。史記天官書所記「土炭」法，均無測驗時刻之作用。中國西漢以前測驗時刻之唯一工具，愛水澆，而非日晷。今日中國保存之古測時日晷有三，但皆為西漢物，故遠在西方之後。一為端方所舊藏，符之於歸綬，今不知其所在，「洵齋藏石記」稱為「測景日晷」；二為前開封聖公會主教懷顯所藏 (Rev. Rev. Bishop William C. White) 藏，民國二十一年出土於洛陽金村；三為周蓮所藏，出土山西右玉，周氏所著「居貞草堂石影」中有拓本，與秦瓦同時出土，然製作與前二者相同。(見劉復著「西漢時代的日晷」，國學季刊三卷四號)

此三日晷，形製相似，方法頗精，必同出一源；而洛陽與右玉、歸綬相去甚遠，劉復雖承認日晷之制傳自西方，但謂歸綬之物，必係商人得自中原。余以其製作之精，推其傳入中國必已久，或在西漢之前，幾經改良而後成也；以出土地相去之遠，斷其流行必廣，故傳入亦必早；至於出土之少，則以其刻畫不深，或易漫漶，或不為人所察覺，而多遭遺棄也。

至於漢簡中所見「夜漏上水」等字句，足證漢簡時代，即西漢下半期，塞上用漏定時，則漏聲之制，當亦從中亞經西域傳入。蓋日晷與漏同為巴比倫人所發明也。

(4) 中西天文學關係總論。中國上古曆法，究與西方有關否？余非天算學專家，姑節錄「中國算學史」上卷第一章之引論曰：「晚近外國人研究中國古代天文學者頗衆，大都不為中

國史家所蔽，於中國天文學之起源建白甚多。然有兩說對峙，未能一致。一爲自發的開展說，一爲西方影響說。爲西方影響說者，謂春秋以前，巴比倫天文學已傳入中國。戰國時希臘及印度曆法又漸至東方，爲秦漢曆法所取用。一該書作者以爲「自發的開展說較有理由」，日人新城新藏撰東洋天文學史大綱，亦抱同一主張；而飯島忠夫支那古代史論，則異乎是。

按東西民族，既有接觸，文化亦發生交流，有來者，亦必有往者；東漸西被，往往難定。但亦不能謂雙方之全部文化，均曾相互發生影響。若孔子所修春秋，在二四〇年紀錄中，有日食三十六次，其中合於現代推算者凡三十三次。甲骨文中之，亦有一次月食紀錄。可知中國天文學發達之早。故如謂六十甲子、二十八宿等，亦非中國所固有，則又失之太過。高平子「中國古代天文學鳥瞰」謂：「一般浮泛的尊古派果然基礎薄弱，……或者中國古代的發現，有和其他民族不謀而合，甚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確有相互的交流，但說中國古代在天文學上全沒有貢獻，則又是另一種很大的錯誤。」（大陸雜誌一卷二期）可謂持平之論，不僅天文學爲然，卽其他學術、思想、習俗等，亦莫不可作如是觀也。

三 南路傳入之寓言及神話

孔丘古曾謂戰國策所載若干動物寓言，完全源於印度，僅動物名稱加以更易。見所著「中國

所受之印度影響」(Indischer Einfluss in China)。茲不錄。

又西方有流傳極古極廣之故事，名曰「尼姆落德(Nimrod)之箭」，尼姆落德爲一獵者，見於聖經，但故事來源，或云出於猶太，或云出於伊蘭。略謂：國王某不信上天有神，一日，向天發矢，矢竟入天傷神，矢沾血，又復落地；國王覩狀，卽曰：朕應受罰，應使箭刺朕。此後，復顯神異數次，國王遂崩。此故事與我國下列二書所載者極相類似：

(1) 史記殷本紀卷三：「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爲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2) 戰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矚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代韓，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

下列四故事，在印度亦有極類似者：

(一)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察今：「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處，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二) 韓非子卷七說林上第二十二：「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3) 戰國策卷十七楚四曰：「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一作喜）而爲之，愛甚於王。王曰：「婦人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性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君王之鼻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此事並見韓非子卷十。

(4) 左傳卷四十四：「（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威社之宮。」

除上述四節外，戰國諸家書中與印度傳說相同者，尚有山海經海內南經巴蛇食象說，楚辭天問亦有「靈蛇吞象，其大如何」之說，希臘人傳印度有吞牛之大蛇；楚辭天問又有鉅鯨戴山說，莊子逍遙遊鵬背幾千里及升空九千里之說，及前引史記孟軻傳所記鄒衍天下九州說。

本節一部分材料爲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日，馬伯樂在前東京帝大之演講，松本信廣譯。日文稿發表於史學雜誌第四十卷第三期；此據法文修正稿，載一九五〇年出版馬氏卒後遺著彙訂本第三冊歷史之研究 (*Études Historiques*)。本文不僅增刪甚多，次序亦不盡同。

第五章 漢以前中國知識之西傳

第一節 希羅多德與克對希亞斯之稱述中國

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約生於公元前四八四年？卒於四二四年，當周敬王三十六年至周威烈王二年，正春秋之世，世稱其為西洋史學家之祖，著有史記九卷。法人德經及海倫（Meleir）均信其為首先述及遠東人民者。德經以為希氏書中之可爾其貝衣人即中國人；海倫以為其書中之加爾摩克人（Kalmouks）為現在中國之鄰人，中間僅隔以色列人。法國賽特（George Coedès）所著「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後十四世紀希臘拉丁作家關於遠東之記述」[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認為希羅多德之知識，殆不可能達於如此之遠也。又云：直至公元前一世紀止，所有西方作家之地理知識，如梅加斯得（Megasthenus）、愛拉篤斯得（Eratosthenus）等，均不至越過土耳其斯坦，其所知且極模糊；彼等所稱述者，不過謂其地為撒且（Sagae）人所居，後為多加里（Togarith）人所逐云云。至於較此更遠之東方，似茫然不知矣。

據希羅多德書，公元前七世紀時，自今黑海東北臨頓河（Don）河口附近，經伏爾加河流

域，北越烏拉爾嶺，自伊爾的什（Hirsh）而入阿爾泰、天山兩山間之商路，已爲希臘人所探悉。公元前三世紀至二世紀之地理學者，反多以裏海（Caspian）爲海灣，而希氏則早知其爲陸地所包圍。希氏嘗赴波斯，故亦知有印度、知有印度河，知印度人口爲其他民族所不及；又以爲印度河流域之東有沙漠地帶，人類所住區域卽止於此。希氏之前，希臘人已分世界爲亞細亞（Asia）、與歐羅巴（Europa），希氏雖知兩洲乃以地中海爲界，但亦不詳其由來，起源之早，可想而知。

希臘文獻之述及中國者，希羅多得以後有克對希亞斯（Ctesias），公元前四世紀人。現有一八八四年穆勒（Müller）刊本，及賽特法譯本。文曰：

「克對希亞斯論世界有人類居住地方之奇觀。

據云：賽來斯人（Seres 卽絲國人）與北方印度人，身軀魁梧，男高十三骨尺（由中指之端至肘爲一骨尺）；壽逾二百歲。在蓋脫落斯（Gairros）河之某一地區，有人與獸相若，皮如河馬，箭不能入。印度海中有島，據云島上深處，居民有長尾，與半人半羊神像（Satyres）上所畫者同。」

此記顯多無稽之談，惟出現「賽來斯」之名，爲可貴耳。

第二節 支那名稱之起源

歐洲人稱中國，英文作 China，法文作 Chine，意文作 Cina……其源皆起於拉丁文之 Sina，尋常用複數，作 Sinae，初作 Thina，見公元八十年至八十九年之間完成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作者佚名。Sina 或 Sinae 一字之 a 或 ae 爲語尾，Sin 爲語根，讀若「星」；合讀則單數爲「希那」，複數爲「希內」。十七世紀以後，拉丁文偶亦有寫作 China 者，但不多見。希臘文之最早者，當爲公元一五〇年之際，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 (Ptolemaeus) 之地理書，有 Sinae 及 Seres 兩名。公元五三〇年，希臘教士科斯麻斯 (Cosmas Indicopleustes) 著「基督教世界風土記」Topographia Christiana Universalis，則稱爲 Tziniza 及 Tzinista，實與拉丁文同出一源。

此後，則亞美尼亞、敘利亞、阿拉伯、波斯無不以之稱中國。

支那一名之爲「秦」之譯音，且由公元前二四九年至二〇七年之秦國而起，經秦始皇傳佈於遠地，此乃衛匡國 (Martin Martini) 於明永曆九年 (一六五五)，在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刊印其中華新圖 (Novus atlas Sinenais) 時，首先發表者。近人仍多主此說，伯希和亦主張必爲「秦」之譯音。其理由爲……

(一) 漢時匈奴乃仍稱中國人爲「秦人」。第一例，前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曰：「單于（壺衍）年少初立，習賊民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此事當在公元前八三年或八二年，即秦亡後一百二十餘年，可見漢時匈奴人仍稱中國人爲「秦人」，朝代變而已成爲中國民族之名則不變。顏師古釋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令其子孫尚號秦人。」此說不爲伯希和所取。伯氏蓋以爲秦亡後一百二十餘年，尙有秦人子孫存在，匈奴人且仍稱之爲秦人爲不可信。

(二) 第二例見於前漢書卷六六西域傳，漢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九〇年）李廣利以軍降匈奴，武帝頗悔遠征，時有人上言屯田中亞，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有云：「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包君馬。」此處所言秦人，顯指漢朝中國人，故顏師古亦注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則已推翻前說。

(三) 第三例見於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但前漢書卷六一李廣利傳同一記述，竟妄改爲漢人，伯希和以爲此可證史記之稱爲原始的，而前漢書則爲適應時代而強改。

(四) 袁海通鑑胡注曰：「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爲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從前而言。」可見中國人自稱漢人，而外國人（如匈奴）則稱中國人爲秦人。

白鳥庫吉「見於大秦傳中的中國思想」，譯文載「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二輯」，以爲漢代匈奴人稱中國人必另有名稱，中國人譯爲秦人；中國人之所以譯爲秦人，蓋漢代中國人自稱，實並用漢人與秦人也。

洛弗爾則以爲支那名稱，乃公元前四世紀時馬來羣島航海家對廣東沿海一帶之稱謂，故原爲馬來語。伯氏與洛氏之文均發表於一九一二年通報。

洛弗爾反對支那一名由秦朝名稱變化而來，其根據爲印度學專家雅各比 (Herman Jacobi) 證明公元前三二〇年至三一五年，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羅笈多 (Tchandragupta 希臘史家作 Sandrocotos) 王在位時，大臣高底里雅 (Mandilpa) 所撰書中曾述及支那地出產之絹云云；雅各比因謂：「可見中國之稱爲支那，公元前三百年時已見於著錄，故不可能從秦朝演變而成。」但伯希和則由文體而謂此記錄之年代當慎重討論；雅各比以爲公元前數世紀，印度婆羅門教與梵文雅語已大行於越南半島，故中國之名稱及中國之絹能傳於印度；伯希和則根據中國古籍，以爲越南半島（東部）之印度化，不能上溯於公元前。且「秦」之名，不始於秦始皇接位以後之秦朝，秦之建國，實始於周平王時代，在公元前凡七百餘年，至秦穆公時，已極強大，高底里雅之言，後於秦穆公者約三百五十年，「秦」之名蓋早已遠揚於印度矣。

伯希和更謂歐洲人所稱支那，與印度人所稱，實出一源。且以爲印度從未用支那以外之名

以稱中國。（按中國載籍中有「至那」「斯那」「贈那」或「莫訶至那」「摩訶支那」等，皆 Mahachinahana（梵文）之譯音），亦作「震旦」，「震」仍爲秦之異譯。

至於支那一名在印度，究有何義，各家意見不一，伯希和未加斷定；但據辨機「大唐西域記」可略見之。玄奘答問「大唐國」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又曰：「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伯希和對於支那一名如何傳至印度，則採陸道說，而否認洛弗爾之海道說，蓋中國國力抵達廣東，僅始於公元前三世紀之後半期，且在此時期，未見中國南部與印度交往之迹，至漢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張騫初通西域，在大夏獲見由印度輸入之中國物產，蜀布與邛竹杖，蓋皆從陸路由四川輸往印度者。

伯氏雖堅決主張支那一名之源於「秦」，且偏於「秦朝」說，以爲中國與印度最初交通，實受秦始皇統一之影響，而印度之所以知有支那之名，亦即由於此一爲本國人所痛恨，然能使中國民族與國民之聲威遠達西北與南方之秦始皇朝代之名也。但伯氏認爲亦可能源於公元前七世紀之秦國國名；並謂當時之秦國，似非華夏民族，而爲華夏化民族。按中國上古紀功，多用銅器，至秦乃有石刻，而埃及則公元前四世紀至三世紀即已流行石刻；波斯、巴比倫亦早於中國。而秦以白馬祭天，似皆受有西方之影響也。

至於里希魯芬之「日南」說、拉古貝里之「滇國」說，雖初倡時頗有附和者，但非的解，故

未能持久。蓋「日南」之古音爲 *Zi-nan* 而非 *Ti-nan*；且交趾重於日南，故公元一六六年大秦安敦之使，僅曰來自日南海外，不曰日南，其登陸必在交趾。「麻」古音雖讀若「*fen*」然其地交通閉塞，開發遲晚，實不可能以其名名中國。或又謂 *ser* 爲「蠶」之譯音，見後。

第三節 中國絲絹之西傳

當公元前後，歐洲之中國名稱有二：一爲海路系統，稱中國曰支那，已見上述；一爲陸路系統，曰賽來斯，指中國人；賽里古姆 (*Serica*)，則指中國，學者以爲卽絲國。蓋 *Seres* 及 *Sericum* 之語源爲 *Ser*，卽「繅兒」譯音，漢書灌嬰傳師古注所謂繅者，帛之總名。或云爲中國讀音絲 (*Ssu*, See *Sser*) 或朝鮮諺文 (*Sir*) 之譯音。亦有主張 *Sin* 爲「蠶」之譯音，或云 *Serica* 爲綿布而非絲，因拉丁語另有 *Bombycina* 一字稱絲絹；又有主張其爲「絹」之譯音者，蓋生絲微黃者稱絹，最初稱之者爲絹之貿易人阿爾泰族，蒙古語曰 *Sirkek*，滿洲語曰 *Sirsh*，古波斯語稱爲 *Sarakh*，土耳其語爲 *Sarık*，今俄文稱絹曰 *Shilka*，亦借自阿爾泰語。余則以第一說爲是。現在所應研究者，爲絲之西傳年代及路線。

我國蠶絲之發明，當爲極早之事。李濟之先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夏代遺址掘獲半個蠶繭，曾經人工破裂，其時必在殷商之前。甲骨文中，有絲字及絲旁之字甚多；相傳黃帝之妃螺祖，始

教民育蠶。尚書禹貢謂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厥篚絜絲；徐州厥篚元纈縞；揚州厥篚織貝，可見我國古代產絲地之廣。詩經中關於蠶桑之記載尤多。春秋時，吳、楚兩國村女，且爲爭桑而發生戰事。實我國古代文明產物之一，其人工之精與應用之廣，遠勝於同時代西方各地之任何出產品。

中國絲在漢武帝以前必已輸出，在克里米半島克特齊附近，古希臘人殖民地遺跡中，曾有絲發現。斯文赫定於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在樓蘭發現絲之殘片；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及民國三年，斯坦因亦在該處發現大量殘絹；此後，法國考古團在波斯，科達洛夫在北蒙古，貝爾格曼（F. Bergman）在額濟納河，均有發現。故在公元前五世紀時，中國之絹或已越帕米爾，而至印度、波斯。及亞力山大大王東征以後，乃又經敘利亞人手，輸入歐洲。

絲入歐洲後，歐洲人甚爲愛好，羅馬人愛浮華，尤嗜絲綢，詩人維奇里烏斯（Virgilius）及亞里斯多德、不里尼烏斯（Plinius）等均提及絲，詳後。

據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可知羅馬帝國極欲與中國直接發生關係，作絲綢貿易，但其時東方之絲，皆由波斯人展轉運往西方，因此波斯人對於中國與羅馬之通使，竭力加以破壞。原文曰：「……其王（大秦）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絹綵與之交市，故遮闔不得自達。」

至於華絲傳入歐洲之路線，即里希靈芬所首倡之「絲路」名詞，在中國境內，必沿斯坦因發現之西域大道，由敦煌出發，經沙漠而至羅布諾爾湖，湖之北岸即古城樓蘭所在，光緒二十六年斯文赫定首先發現其爲古代軍事要塞，且亦爲貿易重要市場，蓋樓蘭爲塔里木盆地第一富饒之地；自此而經于闐，更西乃往印度、波斯、歐洲。斯文赫定並在樓蘭一古室內，發現大量黃、綠、暗青色絲綢殘片；另有一件翻譯信稿，大意謂樓蘭居民委託購買四三二六(?)捆絲，足證其時樓蘭人口亦不在少。南宋理宗三年，(一二三〇)塔里木河下游改道，樓蘭終於荒廢。故馬可波羅於南宋慶元九年(一二七三)道經羅布諾爾時，已不復知有此城之存在。

中國絲之由于闐傳入西方，斯坦因曾在其地檀檀，維利格(Wiliger)寺院壁畫上獲得證明，圖中有繭籠及織機，有侍女及王妃；似爲表示由蠶至繭，以至織絹之過程。斯坦因並探得蠶種傳入于闐之故事，曰：昔于闐國不知蠶桑術，欲至東方(指中國某地)訪求蠶桑種；東國王不許。于闐王乃用計向東國王女求婚，並遣使告王女，謂于闐無桑蠶，不能以衣服餽送。王女知國法禁雉桑蠶出境，乃私藏桑蠶種於帽中，帶至于闐，于闐始有蠶絲。

此事並見「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瞿薩旦那國下記「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敕關防，無令蠶桑種出也。瞿薩旦那王於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

且那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棉，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爲衣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過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遂入罽薩且那國，止麻射伽陀故地。方備禮儀，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尙以雜葉飼之，自是厥後，桑樹連陰，王妃乃刻爲制，不令傷煞。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爲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蠶種傳入羅馬之經過，則有歐洲史家之記述，當另譯之。

一九一〇年，海爾曼 (Albert Herrmann) 著「中國與敘利亞間之古絲路」(Die Alten Seiden traf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對於敦煌以西之絲路，考證甚詳。

東方之絲，及香料、寶石之類，或由大食、安息，或由印度洋測紅海，皆可達於敘利亞人範圍以內之貿易中心地，如：·安底奧基亞 (Antiochia)、大馬斯古 (Damascus)、彼脫拉 (Petra) 等。羅馬人爲免安息人操縱，故別由高加索渡紅海，向北而行。但在第一世紀，中西通道，實以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爲樞紐。

金石文字中，頗有關於古代東西通商之史料；查爾士華次 (M. P. Charlesworth) 著「羅馬帝國之商路及商業」(Trade Routes and Commerce of the Roman Empire) 第六章頗加引

用。謂敘利亞之底爾 (Tyre) 及貝里都 (Berytus) 爲敘利亞盛行絲服之兩大地；羅馬人之絲，亦在上述二地織成。故各地絲商皆雲集其地。埃及王后格婁奧巴脫拉 (Cleopatra) 之赴宴盛服，即織於底爾者。

絲路實可稱謂得世界最長交通大動脈，爲大陸國家文化交流之空前最大聯絡線。惜當時口安、洛陽之中國商人，並不知出售之絲將遠至何地；即居中爲媒介者，如吐火羅人、大夏人、安息人、米太人、敘利亞人，亦不知最後享受者爲何人；惟有底爾或其他地中海海口之腓尼基水手，方知羅馬爲其主要市場。故此漫長之交通線，實分數段同時並進也。

第四節 亞力山大東征與中西文化交流之關係

中國知識之西傳，或西方知識之東漸，往往非直接的；人與人之間，通常爲先聞名，而後書翰相通，漸至晤對一堂；國與國之間亦如此。而距離較遠之大國，其情形尤如此。與大國爲隣，或介乎兩大國或若干大國之間之小國，或其它大國，其商人或旅客必向雙方傳遞消息；研究東西關係者，必須注意此中之間接關係。如東方與更東方國家間之關係。西方與更西方國家間之關係。故中國與印度或波斯之關係中，可以發現中國與希臘或埃及之關係；而希臘與波斯或印度之關係，亦能影響希臘與中國之關係。亞力山大王之東征，其一例也。

此一軍事行動發生於公元前三三四年至三二六年，即周顯王三十五年至四十三年。希臘人對地理之認識，乃大為擴大。軍隊中且有史家隨營出發，記錄戰功及進軍路線，並有蒐集地理學及自然科學新資料之專家。蓋亞力山大不僅為軍事專家，且帥辜亞里士多德，從其求學。然彼所遣派之史家之記述既不可靠，而學者所獲，尚不足以媲美希羅多德。亞力山大征服之地必有關於中國之傳聞，惜因史家疏忽，竟鮮稱述；而關於此次東征後留居亞洲之希臘人民，並無文字記載，足資研討。

東征後所得地理資料，則在埃及之亞力山大城自成一體系，而以希臘為中心；最值得注意者，為地蓋阿爾古斯(Dicaearchus)說，謂有東西相貫之大山脈，使整個亞細亞大陸，劃為南北二部。

亞力山大部將中，有塞琉古斯(Selencus)，公元前三二二年(周赧王三年)據敘利亞，建塞琉啓亞(Seleucia)王朝，迄公元前六五年(漢宣帝元康元年)始滅。塞琉古斯在位三十三年，征服巴比倫、米太、帕提亞(Parthia)等，國勢甚強。

塞琉古斯一世曾遣巴脫落格羅斯(Patrolus)調查裏海一帶地理，實則希羅多德對於該地區情形早已瞭解，巴氏抵達後，僅踏查其南岸，乃謂其北岸與大洋相連，一時地理學說反見退步；而此一謬誤見解，竟支配整個希臘時代之學術界，迄羅馬人興起後，始漸改正。

塞琉古斯一世曾企圖拓境至印度，因而與旃陀羅笈多發生齟齬，旋又修好，乃遣柏加斯得爲駐巴達里布脫拉 (Pataliputra) 使節，凡五年，詳記風俗、政治組織及文化事業，現存希臘古文獻中關於印度之記載，當以此最爲翔實可靠。

近法國學者格魯賽著「從希臘到中國」(De la Grèce à la Chine) 一書，雖僅以藝術觀點，附以豐富圖片，闡述希臘文化東漸經過，但其導言則所述頗廣，茲爲節譯於後。

古代文化之最重要者爲三大人文主義，卽希臘人文主義、印度人文主義及中國人文主義。由三大人文主義所產生之三大文化，其完備程度，足使其無限發展，其流澤且被及其他各國。三大人文主義之接觸，乃使世界文化更趨光明。希臘發現印度，印度又挾其佛教，而以希臘文物傳於中國，其所經路線正昔日中國之絲綢往於西方之舊道。但希臘文化之所以能東傳，當上溯其歷史於亞力山大時代。此一好學而有軍事天才之英雄，其征服亞洲之好夢，雖未持久，但所造成之新希臘，卽亞洲之希臘，竟使「希臘色彩」長留其地，達千年之久。希臘式之地名與深埋地下之希臘錢幣，在小亞細亞幾於觸處皆是。可知「希臘風」已自亞細亞邊緣深入大陸腹地，樹其穩固之基礎。尤可驚奇者，卽西方之希臘殖民地，如在意大利半島內地，始終保持其「意大利風」，而無法使之希臘化，在亞洲腹地則適與此反。

「從希臘到中國」，其經過頗爲曲折。亞力山大城之建立，於希臘精神傳佈於東方，實有

極大貢獻；而亞力山大城之建立，則爲敘利亞與埃及受希臘化之結果。

希臘文化隨亞力山大經伊蘭、阿富汗，而終與印度佛教相遇。亞力山大在亞洲之主要繼承人爲塞琉古斯一世，上文曾述及其與旃陀羅笈多之關係。旃陀羅笈多乃使佛教傳播於印度境外之最有力者；但佛教自身，在藝術上既已深受希臘影響，於是佛教所到之地，亦成爲希臘式國家，或再度成爲希臘式國家。時在公元前三世紀。

在東方之希臘化國家，似常以大夏爲最重要。其地南迄信度庫斯山，北至古代所稱烏濟河 (Oxus)，即今之阿姆河，公元前二五〇年（東周惠公六年），大夏王第奧道脫一世 (Diodote I) 脫離由亞力山大在東方之真正繼承人塞琉古斯國人之統治，宣告獨立。

及自亞洲北部南下之西徐亞人侵入大夏，取希臘人之勢力而代之，此印、希（印度希臘）(Indo-grec) 化之古國，乃一變而爲印、西（印度西徐亞）(Indo-scythe) 化之新帝國，其時已在公元後三十年（後漢光武帝六年）至二四一年（蜀後主延熙四年），此後乃出現希臘之佛像，而羅馬帝國與希臘佛教 (Greco-Boudhistic) 世界之關係，中國與印度之關係，及希臘化佛教美術之輸入山國等，當另列專章，加以鈔述。

第六章 漢代西域之經略(上)

第一節 西域地勢與古代人種

中西交通之開展，至漢武帝通西域，而造成一新局面，影響於後世者至重且大。

漢之西域有狹狹二義：廣義西域，包括天山南北及葱嶺以外中亞細亞、印度、高加索、黑海之北一帶地方。狹義之西域，僅爲今新疆天山南路之全部。

狹義之西域，其西爲帕米爾，北爲天山，南爲崑崙山，三面高山環繞，中部爲塔里木盆地。盆地中復橫亘塔克拉馬干 (Takla-Makan) 大沙漠，自西徂東，長達九百公里左右，寬達三百數十公里。盆地東頭有羅布泊，爲鹽塊堆積之海床，乃史前時代鹹水湖乾涸後所成。我國史書稱爲「鹽澤」、「坳澤」，又名「蒲昌海」、「牢蘭海」，或譯蒙古音 Lop-Nor 爲「羅布諾爾」及「羅布淖爾」，淖爾或諾爾是海。惟沙漠有狹小地帶，略有出產，可以居人；蓋有發源於崑崙雪山之河流，灌注其間，故亦爲旅行者必由之路，而與中西交通史之關係亦最大。此一地區之生活雖甚艱苦，然棲息其間，互爲消長之民族，則頗爲複雜。近年中外學者，自語文構造之研究，人體頭蓋骨之測量，並與發掘所獲之繪畫雕刻相印證，對塔里木盆地之人

種問題，已獲得相當程度之解決。蓋文獻上並無關於此一地區古代人種之記載，有之，當自魏代始。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條曰：「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深目高鼻，固可視為亞利安人種特徵之一也。

漢代西域民族之語言，大略有三：第一以龜茲或焉耆，即今之庫車或哈喇沙爾為中心，通行吐火羅語 (Tocharian)；第二乃以于闐即今和闐 (Khotan) 為中心之和闐語；第三則粟特 (Sogd) 語，或窰利語。第三種語言屬伊蘭語系，在當時流通最廣，粟特即今俄屬土耳其斯坦之撒馬爾干地方之古名。吐火羅語中又有分焉耆語與龜茲語者，或以為焉耆語乃外來語，伯希和則主張焉耆語仍應名為吐火羅語；惟據伯希和以後國人之考察，焉耆語之所在地，實為焉耆，故無改名必要；國人又有創第四種佉沙語說者，似尚未有專文發表。據已經專家研究之三種語言而加以推測，可知其地之古代民族為亞利安族，蓋皆為印歐語系，而和闐語之屬於印歐語系之東方系統，更為顯著，幾與伊蘭波斯語完全相同；惟吐火羅語，則僅在外形上，與希臘語相似，而仍屬於印歐語系之西方系統；再加以人骨之研究，可證當時居住於羅布泊及吐魯蕃諸地者，確為亞利安族。若輩何時進入西域，雖難斷言，但對中西交通曾負媒介之任，則無可置疑。至今日在西域之民族，則為土耳其族，亦即所謂突厥族，其來西域當在公元六世紀時，則蹙乎其後矣。

茲錄漢書西域傳中一段如下，以略窺當時所記地理情形。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旁南山北，波河（顏師古曰：波河，循河也。）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但研究西域地理，所不可不知者，卽因風沙之阻塞，河身不能不改道，故今日塔里木河，已重復東流，回復其兩千年前之故道；而羅布泊亦往南徙，不在舊址矣。

第二節 張騫出使西域之經過

張騫出使西域，號曰鑿空，爲中外關係史上空前大事，茲略言其與中西交通史直接有關者，蓋在海道未通前，無論中國文明西傳，或西方文明東傳，均非先經西域不可也。

張騫出使西域之真正動機及其經過，見於史記大宛列傳及前漢書張騫傳，茲以史記爲本，錄原文如下；其與前漢書歧異太甚者，則爲之互勘，以「」爲記。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公元前一四〇——一三五）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逃遁而常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

可知張騫之出使，卽爲與月氏同盟，以夾擊匈奴；同時亦可使匈奴不與氏人連繫；加以其時征服南越，耗費太多，征西域則可轉移目標；而西域亦頗富庶，雖因沙漠，缺乏水源，但其時已有井渠，可資灌溉。

「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居（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字重出）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

「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脫此句〕國內亂，竊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竊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一竊爲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竊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竊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略）

竊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竊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著〕頗與中國同業〔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遠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竊言爲然，乃令竊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出犍，出冉〔柁〕，出徙〔徙邛〕，出邛〔邛〕，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柁，南方閉犍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能通。然聞其西可千餘

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脫此句〕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以上記張騫第一次出使，及其出使後之報告。以下史記原文記騫從軍出征，常列於下章，茲續錄其第二次出使之經過曰：〕

「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嗙肉糞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旁攻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復以云云以下缺，別有文曰：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強。〕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以上兩句脫〕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罷屬之不大攻。』〔末句缺〕

「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而昆莫地空」戀夷「戀故地」俗實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道可使遣之旁國。」

「騫既至烏孫，「以下見前漢書西域傳烏孫條」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慚，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

（略）

「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焉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以下前漢書仍入張騫傳」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真、扞來及諸旁國。

「無安息以下十二字 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規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

「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本節不見前漢書」

據史記及前漢書所記，張騫第一次出使情形，大略如下：

張騫爲城固人，今其地尙有博望侯墓；前西北大學發掘時獲有漢磚，可資證明。故比較熟悉西域情形。

漢武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張騫率百餘人出發，時距月氏西遷已二三十年，初駐足於伊犁，匈奴則佔今日甘肅之大部，如大宛傳所言：「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隴西長城，即臨洮長城，在岷州附近，易言之：河西尙在匈奴手中，故欲自中國至大月氏，必經匈奴領土。張騫往返歷時十三年，去時在匈奴被扣十年餘（建元二年即公元前一三九年，至元光六年即公元前一二九年），娶匈奴婦，且生子，匈奴戒稍弛，逃抵大月氏，時大月氏因又遭烏孫攻擊，乃再往中亞細亞移動，故張騫之行程亦較預料者爲遠。後再至大夏，一年後，因不得結果，欲從羌中歸國，又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始逃回祖國，時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同去百餘人中，僅二人同歸。

張騫西行之途徑，即漢代所謂北道，沿天山南麓西進，經疏勒，即今之喀什噶爾（Kashgar），然後越葱嶺而至今之費爾干那（Fergana），即當時大宛所在。由大宛而康居，而大月氏。

張騫歸國，乃取所謂南道，即由中亞細亞，溯今阿姆河，越帕米爾高原，出莎車、于闐，經玉門或陽關，而回河西。

第二次出使，如史漢所記，不另釋。另列張騫事蹟年表如後：

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出使大月氏，爲匈奴所囚。

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大約以是歲正月抵大月氏。

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留大月氏歲餘，歸國，復爲匈奴所俘。

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匈奴軍臣單于死，國內亂，亡歸，拜大中大夫。

元朔六年（公元前一二三）從征匈奴有功，三月封博望侯。

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獻策通西南夷。

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隨討匈奴後，期贖爲庶人。

元狩四十五年（公元前一一九—一一八）武帝問大夏等國情形，又奉使烏孫，副使使大宛、康

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等國。

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由烏孫使還。

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卒。

第三節 匈奴在東西文化交流上之貢獻

吾人今假定匈奴即西史上之 *Yueh*；至其種屬則有主土耳其種者，有主蒙古種者，有主芬

族者，俄國學者則主斯拉夫種說；除第四說全無根據外，餘皆可取，而以前二說爲最近似。或據比較語言學而定其爲土耳其系，今從之。

匈奴行踪及於歐亞二洲，其文化之成分以西伯利亞及西徐亞爲主，參以中國、希臘及伊蘭諸系，而成爲世界性文化。

民國十三年，科茲洛夫蒙藏探險隊，在庫倫北七十公里，位於庫倫、恰克圖大道東七公里之地，發掘古墓三群，凡二百二十一座。由所發現之織物及花絹，知與斯坦因在樓蘭發掘者，時代相同；由掘獲之五銖錢、漢鏡及漢通行隸字，乃更證明其爲漢墓。其時，匈奴正佔據漠北，故可證爲匈奴墓；其繡織物中所見之藝術型，有中國、波斯及希臘式。

民國二十四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研究員江上波夫及水野清一，亦就實地探查之結果，撰爲「內蒙古長城地帶」一書，第二篇「綏遠青銅器」，亦謂綏遠之青銅文化，含有中國式及西徐亞式，故稱之爲「北方歐亞文化」。

近年在唐努烏梁海發掘之墓內，有匈奴人之瓦及陶器，考其形式，知受中國之影響甚深。

自匈奴活躍之時代及遷徙之路線觀之，匈奴最初之文化，應爲純西伯利亞式，其後受秦漢之影響，乃加入中國文化；及西侵月氏，西域諸國皆歸所屬，則又加入西徐亞文化。於是公元前一世紀，盛行於黑海以北之青銅器文化，即所謂西徐亞文化，乃隨匈奴之勢力而流入蒙古

與西伯利亞。其後，匈奴裂南北爲二，南匈奴徙中國內地，完全漢化；北匈奴則遷往歐洲，而同化於希臘、羅馬。故匈奴本身無獨特文化，然於東西文化之傳播，則自有其貢獻也。

第四節 月氏西遷之影響及其種屬問題

月氏或作月氏、月支；新羅人崔致遠撰「法藏和尚傳」曰月又音燕；或云當作肉，非。逸周書王會篇有「禺氏」名，此名凡三見於管子，似卽月氏；王會篇附錄「湯四方獻令」有月氏名，恐非後世所謂月氏。

秦時，中國北方爲三大族所分據：在今熱河、察哈爾者爲東胡；在今綏遠者爲匈奴；在今甘肅、寧夏者爲月氏。史記匈奴列傳稱「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介乎其中，故東西皆臣事惟謹。但自月氏爲匈奴冒頓單于所破後，乃西遷至中亞細亞，建立一大王國；未遷者，與青海之氏、羌混合，史稱小月氏，在歷史上無關重輕。

兩漢經營西域，其目的卽爲對抗匈奴，而最初動機，則在與大月氏聯盟；讀漢書張騫傳載騫至大宛，「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可知張騫西使之最後目的地爲大月氏，故至大宛、康居，皆不足以使其滿足；且當時漢人亦僅知有月氏，而不知西域尙有三十五國也。惜大月氏之當時情形爲「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見同

上」而以大月氏彼時所有之武力估計，恐亦未能大有助於漢。故張騫回國後，乃建議武帝與烏孫聯盟。

然月氏對東西文化之媒介，實與有力也。月氏故墟出土之貨幣，不用 *Pentacoin* 文，而用希臘字，以及其最小而質高，可見其目的不在國內行使，而在與東亞各國往來貿易。漢書大月氏傳謂「所有民俗與安息同」，安息傳則曰：「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獨為夫人面。王死，掘更鑄錢。」南宋洪遵「泉志」引「張騫出關志」曰：「凡諸國幣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準於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女人交易，則用王后之面，王死則更鑄。」月氏出土之貨幣，亦正與此合。

佛教之傳入中國，及佛經翻譯，亦多由大月氏之介紹，觀三國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云：「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即可想見。學者所聚訟紛紜者，為大月氏之種屬問題。多數則公認其為伊蘭系，蓋就語言學及人類學之研究而斷定者。漢書西域傳曰：「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依循、批志之屬，皆故塞種也。塞種即斯脫拉波 (Strabo) 書中之 *Sacae* 或 *Saka*，今作 *Scythia* (西徐亞)。」勒維與洛弗爾定大月氏為伊蘭系，斯登科諾 *Sten Konow* 則又別其為伊蘭系之塞種。

月氏似與氏羌有關，故氏羌或亦為西徐亞種。蓋大月氏滅大夏後，又遷至印度河流域，建

貴霜 (Kushan) 王朝，至隋唐時，有傳謂「昭武九姓」出現。「昭武」之名乃由於河西走廊之昭武城，原爲大月氏國都，其八國遷，國都之名亦西移。昭武之本義卽京城，而氏人所建前秦，稱苻堅爲苻詔，今暹羅語系仍稱帝爲「詔」(Chao)，緬甸王都亦曰 Chaohwa；唐在雲南立國之南詔，似皆與氏族有關。貴霜王朝之名王迦基色迦 (Kanischka)，其錢幣上亦有希臘字曰 S. Iohannashoa，意卽「王中之王」，Shoa 與 Choa 同，故可推定大月氏與氏羌有關。

然月氏爲行國，逐水草而徙，不能強指其原居某地。蓋匈奴人之活動地域，乃因地下掘獲之寶物而得證明；大月氏遺物僅在印度河流域有發現，中國方面尙無所見。史漢謂其居住祁連、敦煌間，當不出今甘肅西北，但此爲後世事。蓋漢前，其活動地域必跨今甘、寧二省，屢爲匈奴所逼，乃踰居甘肅甘州間，及再爲冒頓所破，乃西遷祁連敦煌間。其後乃一擊烏孫王難兜靡而滅之，益徙以西。一則以上各地，必能發現其寶物，此則有待於異日之發掘也。其西徙路線，近人已考定其第一次爲由敦煌至伊犁，第二次則由伊犁至阿姆河，而各在其地停若干年。至西徙之年代，則有數說：

福蘭閣等以爲在公元前一六〇年；

桑原鷲藏以爲在公元前一三九至一二九年之間；

白鳥庫吉定第一次在公元前一七四至一五八年之間；第二次在公元前一五八年；

藤田豐八定前者在公元前一七四至一六一年之間；後者在公元前一六一年或一六〇年。

藤田之說，蓋據史記大宛列傳「及冒頓立，攻破月氏」，斷爲月氏由敦煌西走伊犁之事實；又據其下文「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斷爲由伊犁再西遷之事實，更由此而推測其年代，其說頗當。

月氏之西遷，其影響且及於大夏、安息之滅亡。蓋自月氏西移至天山之北，阿爾泰山以南，盤據其地之塞族，乃不得不更向西移，迄於今之土耳其斯坦。其後，月氏再受天山北部烏孫之壓迫，進據阿姆河中流一帶之大夏領土，塞族亦更南徙於印度北部之犍陀羅(Gandhara)。大夏與安息，在公元前三世紀間，爲中亞之強國，卒因異族之西侵而遭滅亡；若追溯其遠因，實民族遷徙之所致；民族之遷徙，則又由於漢族與匈奴之對抗，其脈絡固甚顯明也。

第七章 漢代西域之經略（下）

第一節 中西交通線之開闢

漢武帝時，中國既已探悉西域形勢，而匈奴對邊境之侵擾，並不因和親政策而稍見和緩，乃有若干次大規模征伐之舉；匈奴勢力，不得不退出漠南，對漢之威脅，亦遂減低；雖完全肅清，須遲至宣帝時，但對外之交往，則已不如以前之困難矣。

漢武對匈奴之第一次用兵，在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三年）：

「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關市饒給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奸關出物，與匈奴交，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單于既入漢塞，……見畜布野，而無人牧之，怪之。……時雁門尉史……知漢兵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自是匈奴絕和親。」

漢武第一次出擊，可謂失敗，然六年後，即發動第二次攻勢，由大將軍衛青爲統帥，時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二百餘萬。」

此次勝利，對漢武帝此後開疆拓土之雄心，影響甚大。衛青曾奉命二次出師；衛青之後，又有驃騎將軍之深入匈奴境內，過焉支山數千里。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夏，霍去病又率數萬騎出隴西地數千里，此次戰果最大，蓋匈奴渾邪王竟被逼以其領地降漢，於是河西及隴西北之地，不復有匈奴騎兵出沒。二年後，乃有最後一次之大規模攻伐：

「漢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圍單于。單于……遂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以上皆據史記武帝本紀）

中西交通之要道，至此乃益趨於穩固；蓋匈奴之勢，至此而始完全疲憊，不復為中國之患矣。

第二節 中西交通線之保護

武帝既竭力經營西域，乃置金城郡於今蘭州，為最初之基地。匈奴渾邪王投降之年，即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中國在政治上之設施，乃更進一步，設置酒泉、武威二郡，並派軍隊屯戍；十年後，增設張掖、敦煌二郡。（此據漢書卷六武帝紀；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則謂張掖、酒泉二郡之置，俱在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武威在太初四年，敦煌在後元元年，

公元前八十八年；又據史紀卷一百十匈奴列傳，則元封六年，公元前一〇五年，酒泉、敦煌已置郡；近人或以爲敦煌設郡，約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左右，敦煌係從酒泉分出，故酒泉設郡，當更在敦煌之前。）四郡之設立，不僅爲消極的佈防性質，或爲保護國際貿易，且有積極西進之意。

四郡之外，又建造長城，其地點在敦煌西北。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斯坦因發現其遺址，綿亘達二五〇里。自古以爲長城僅止於酒泉者，得此而舊說必須修正。王國維流沙墜簡序言之甚詳，茲節錄於後：（據上虞羅氏宸翰樓原印本）

「漢代簡牘出於敦煌西北，其地當北緯四十度，自東經九十三度十分至九十四度三十分之間；出土之地，東西綿亘一度二十分，斯氏以此爲漢之長城，其說是也。案秦之長城，西訖臨洮，及漢武帝時，匈奴渾邪王降漢，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元狩三年），後又分置張掖、敦煌郡（元鼎六年），始築合居以西，列四郡據兩關焉。此漢代築城事之見於史者，不言其訖於何地也。其見於後人記載者，則法顯佛國記云「敦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晉書涼武昭王傳云：「玄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東西疑東北之訛）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案唐沙州圖經則沙州有古塞城古長城二址，古長城則在州北六十六里，東至階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樂縣界，西至曲深烽二

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磧接石城界云云。」李暉所修有東西南北四圍，當即圖經之古塞城；法顯所見，僅有縱橫二圍，其東西行者或即圖經之古長城，而里數頗短，蓋城在東晉之末，當已頽圮，而圖經所紀東西三百九十里者，則窮其廢址者也。此城遺址，圖經謂在州北六十二（上文作六字）里，今木簡出土之地，在北緯四十度稍北，準其地望，正唐沙州圖經所謂古長城也。……今斯氏所探得者，敦煌迤北之長城，當漢志敦煌龍勒二縣之北境，尙未東及廣至界，漢代簡牘，即出於此，實漢代屯戍之所，又自邊境通西域之孔道也。」

此長城之位置，則利用天然形勢，使匈奴騎兵，不易長驅直入。且所有水草地，均在長城以內，故匈奴即被摒於水草地之外，漢之大患，得以稍減。斯氏又曾考察其工程與材料，知城牆係用葦桿及泥土相間版築而成，約每三層間蘆葦一層，泥中有木棍，因其地土壤與水均含鹽質，遂呈半化石狀態，較磚石尤爲堅固，故能歷二千年而不廢。

勞貞一先生「釋漢代之亭障與烽燧」文中，（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分城垣爲（一）大城圍，即郡城與縣城；（二）小城圍，即障，有戍官或障尉，（詳後）；（三）長城；（四）塙，在障或烽臺之外者；其他工事，尙有（一）木柵，又稱虎落或疆落；（二）天田，即敷沙於木柵外，以窺敵人足印者。工事中之交通關口則爲「關」，有都尉處所始設關。

烽火制度，爲極嚴密之國防工事。按漢時縣以下之行政單位，爲鄉、亭、里。據續漢書百

官志注引漢官儀：「設十里一亭」；漢書百官表亦謂「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此所謂「里」，或以路程「里」字計，或以「二十五家爲里」之「里」字計，可知其並非以人口爲標準，而以地位之需要或重要爲標準。

亭之功用在防守，故必多便於瞭望及據守，彷彿今日之堡壘，爲一高土墩而有樓，爲四方形，或六角形，且有旗竿，是爲通信設備。三亭以上，卽三十里以上時，且有特爲公務人員食宿用之傳舍，卽設於亭之附近，而成爲擴大之亭，此等亭乃稱「都亭」，帶有供應站性質。

亭之主要建築爲墩，卽土臺，故漢簡常以亭稱烽臺，烽臺時亦稱爲墩；烽臺有圍牆曰塢，烽臺與塢合稱爲燧，今作燧。（參見勞貞一先生著「漢代的亭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本）亦稱烽火亭。

亭燧之種類有四：（一）獨立而無所依賴者；（二）與長城相連者；（三）作城或障之外圍者；（四）若干亭燧互爲犄角者。

大於亭者爲「障」，可容一二百人，亦可放烽火，長城沿線多爲障，長城以外則多亭；皆利用天然形勢，建築非常鞏固。亭塢高一丈四尺，合市尺九尺八寸；長七丈七尺，合市尺五丈三尺七寸；障則有長至八丈，牆厚三丈者。

烽火有四：一曰積薪，卽蘆柴，日夜兼用，蓋以其有強烈之光與烟；二曰表；三曰烟，卽

以狼糞燒烟，用於白晝；四口苣，用於夜。較完備之烽火臺，臺頂且有灶，灶上有烟齒，便烟直升也。表爲赤色與白色之布，烟以示遠，表以示人數多寡。吾人目力可達四十里，故烽火之設置，皆在人目力可達之範圍以內。

有亭燧卽有郵傳，從漢簡中可考見其制度之嚴密、文書之性質、受文人與發文人之姓名、發文收文之時刻等。

邊塞之行政長官，亦與亭障有密切關係：障有障尉，隧有隧長，隧長凡三級。最高者爲四都尉，卽：宜禾都尉、中部都尉、玉門都尉及陽關都尉；都尉之下有侯官及侯長，其職掌皆在保護交通線之安全。

漢簡中不見有戍卒怨恨之詞，西夏之簡則不然，可知漢時戍守長城，必較西夏爲積極；漢所用戍兵，多爲罪犯，或亦一原因。

第三節 中西交通線之門戶

史記大宛傳有句曰：「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此蓋指趙破奴、王恢伐樓蘭以後之情形；及白貳師將軍擊敗大宛，史記大宛傳更曰：「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輪臺渠犂有田卒數百人」漢由酒泉列亭障至玉門，尙有史料二則：一爲漢書張騫傳曰：「於

是天子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一爲漢書西域傳曰：「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趙）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恢爲浩侯，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破奴封侯在元封三年，次年恢封侯，故列亭障至玉門，當在元封四五年間。

亭與障已見上述，實爲邊地之堡壘；軍事組織之西移，足證政治勢力亦必有擴展，故伐大宛之後，國防工事已進至羅布泊；觀其逐步推進，亦足證漢代之籌邊，不僅爲禦侮，且有積極之企圖。

但可進一步研究者，卽史記與漢書皆有「列亭障至玉門」之語，故必須知玉門之所在；而玉門又有所謂「西移」問題。

玉門關之方位，前人迄未能確指，自斯坦因在西域發現古關二所遺址後，法國學者沙畹與吾國羅振玉、王國維先後加以考定，茲錄王氏「流沙墜簡序」之言曰：

「玉門一關，漢志繫於敦煌郡龍勒縣下，嗣是則續漢書郡國志、括地志、元和郡縣志、兩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以至近代官私著述，無不以漢之玉門關爲在今敦煌西北……竊疑玉門一縣，正當酒泉出敦煌之孔道，太初以前之玉關當置於此……近日

秀水陶氏辛卯侍行記，記漢玉門陽關道路，謂自敦煌西北行百六十里之大方盤城爲漢玉門關故地。又謂其西七十里右地名西湖，有遺廟遺址及烽墩數十所。斯氏於此發見關城遺址二所……然則當九十四度稍西者，殆卽陶記之大方盤城；當九十三度三十分者，殆卽陶氏所謂西湖耶？沙畹博士疑九十四度稍西之廢址爲太初以前之玉門關，而在其西者，爲後日之玉門關。余則謂太初以前之玉門關，當卽酒泉之玉門縣，如在東經九十四度北緯四十四度間，則仍在敦煌西北，與史記大宛傳之文不合。而太初以後之玉門關，以括地志所記方向道里言之，則在壽昌縣西北百一十八里。今自敦煌西南行一百四十里，有巴彥布喇汛，陶氏以爲唐壽昌縣遺址，自此西北百一十八里，訖於塞上，則適在東經九十四度北緯四十四度之間，則當九十四度之廢址，疑爲漢太初後之玉門關，而當九十三度三十分者，當爲玉門以西之他障塞。蓋漢武伐宛之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又據沙州圖經，則古長城且西入磧中，則玉門以西亦當爲漢時屯戍之所，未足證爲關城之證也。故博士二說之中，余取前一說，但其地爲漢志龍勒縣之玉門關，而非史記大宛傳之玉門則可信也。其西徙之年，史書不紀，今據斯氏所得木簡，則武帝太（原作大）始三年，已有玉門都尉護衆文書，其時關城當已西徙於此，是歲距太初二年，不過十歲，是其西徙必在李廣利克大宛之後（太初四年）西起亭至鹽澤之時也。可知斯氏長城玉門關之說，確非臆造，吾儕得由斯氏之探

索，沙氏之考證，以定玉門關之方位與其西徙之時，則二氏之功鉅矣。」

據王氏之考定，則太初以前之玉門關猶在敦煌之東，太初以後，則移於其西。玉門關乃爲中國極西之門戶，有長城毗連。故伐樓蘭之後，酒泉玉門之間，雖已遍設亭障，但此所謂玉門，尙在敦煌之東；大宛降順後，玉門西移，故可曰：「西至鹽水，往往有亭」，可見要塞之建造，亦隨玉門而西進。王國維此序有數誤，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新獲之敦煌漢簡」文中已一一指出，今不具論。

按談玉門，則不能不談陽關，卽舊稱「兩關」，漢書西域傳所謂「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據漢書地理志，敦煌龍勒縣有玉門、陽關，皆治以都尉，其地俱在今敦煌縣境內。

據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正義引括地志，謂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記邊州入四夷道，第五安西入西域道云：「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

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殘沙州圖經，亦云：「右在縣西十里，今見毀壞，其跡見存。西通石門澗，□□□□，在玉門關南，因號陽關。」

以上唐人記陽關故址與壽昌城之距離，有六里及十里二說，但壽昌城西僅有西壽昌城，今名古董灘，此外別無其他遺址，當卽陽關故址。

玉門關在今小方盤城，此說似已成爲定論，蓋斯坦因曾在其地得漢代玉門都尉等版籍；在斯氏地圖上爲東經九十四度稍西，北緯四十度三十分稍南。巴黎藏石室文一殘沙州圖經，記玉門關僅一周迴一百廿步，高三丈」九字，以下全泐。或謂此所云步，乃步測之步，非計里開方之步；今小方盤城周一百二十公尺，亦合。（見「玉門關陽關雜考」，載真理雜誌一卷四期）學者所爭之問題，爲太初二年以前玉門關是否在敦煌以東？問題之起，乃由於史記大宛列傳記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後命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大宛，文曰：

「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

漢書卷六十一李廣利傳文與史記同，唯「而使使遮玉門」下，多一「關」字。沙畹在其所著「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沙漠所獲中國文書考釋」，序論第六至第七頁，即主張太初以前之玉門關應在敦煌之東，故漢武帝可以使使遮玉門，而貳師將軍亦遂不得留敦煌，不敢東向入關。敦煌西北之玉門關，則爲太初以後所遷置。王國維序流沙墜簡，亦贊成沙畹之說。近年頗有人懷疑此說，以爲漢代玉門關並未易地。

按史記大宛列傳記趙破奴、王恢擊敗樓蘭後，封破奴爲浞野侯，封恢爲浩侯，在此以下

始有「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之語。破奴封侯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核封侯在後一年，皆在太初二年前四五年，故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縣下，班氏本注，謂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魚澤障尉，魚澤卽效穀之舊名；如上文所言，玉門當在敦煌以東，則元封六年，魚澤障何能有尉？

泥史記漢書對於若干次要障塞，均記其興築年代，若玉門關有遷徙，何以兩史家均不著一字？故或認爲河西之立四郡，俱在太初以前；史記大宛傳「使使遮玉門」一語，乃指玉門縣而言。太初二年，貳師將軍自大宛敗歸，已入玉門關，且更東退而抵敦煌，漢時玉門縣卽在今玉門縣之赤金附近，處敦煌與酒泉之中，故武帝使使在玉門縣阻其退入酒泉。漢書在「玉門」下增一「關」字，遂啓後人之疑。蓋玉門關在敦煌之西北，玉門縣則在敦煌之東也。

敦煌爲通西域之門戶，漢代有事於西域，必先集結軍隊及給養於敦煌；匈奴欲絕漢通西域之道，亦必先攻敦煌。敦煌地位之重要既如此，故元鼎六年，析酒泉而置敦煌郡，同年並置玉門關。是以元鼎六年時，中國之政治與軍事已達於敦煌西北之玉門關；元封三四年時，自酒泉至玉門關之亭障亦已完成；太初三年更增築張掖、酒泉以北之障塞，然後，貳師將軍伐大宛，乃無後顧之憂。太初四年，貳師凱旋，漢乃「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則對西域之經營，又進一步矣。

勞貞一先生著有「兩關遺址考」，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則仍贊成王國維之說；惟王國維以爲太初以前之玉門關卽今酒泉玉門縣城，勞氏則修正爲卽今縣東赤金所。

玉門關之設於敦煌以西，不在貳師破宛歲餘以後。史記大宛傳叙貳師初次伐大宛失敗而返，曰：「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叙第二次伐大宛，又曰：「出敦煌者六萬人，……馬三萬餘匹。」及克大宛歸來，則曰：「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玉門關隸屬敦煌，故入玉門關卽可云至敦煌；苟玉門關遠在敦煌縣城東六百餘里之赤金峽，卽不能如此措辭。

史記及漢書，在太初二年前已屢言敦煌，卽使其地暫時尙未設郡，而附屬於酒泉，但邊境重要關隘則必在敦煌以西，否則，失其作用矣。

上文引漢書地理志注，云濟南崔不意元封六年爲魚澤障尉；魚澤障在敦煌之北，則列亭障所至之玉門，應更在敦煌之西，而不應於太初年間尙在敦煌之東也。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有「新獲之敦煌漢簡」一文，簡有「酒泉玉門都尉」字樣，酒泉設郡旣在敦煌之前，此簡「玉門」前加「酒泉」二字，故亦必在敦煌設郡前，而此簡乃民國三十三年冬在小方盤城掘獲者，更可證敦煌未建郡前，卽太初二年前，玉門關已在敦煌以西之小方盤建立矣。

說者或以爲史記大宛傳「使使還玉門」一語，如假定當時武帝已知貳師退抵敦煌，則不論

其爲關名爲縣名，必在敦煌以東，使使阻其後退；若假定貳師東退時，立卽奏請罷兵，武帝以爲其軍隊或尙未退入敦煌以西之玉門關，故下令不許退入玉門，則「使使遮玉門」一語，或不一定作懸解，卽作關解，亦無不可。

所謂玉門關在敦煌以東，乃六朝以後事。從今日玉門陽關之遺址考之，商業性或重於軍事性，蓋其地土硬，駱駝便於行走。六朝後，西域空虛，商旅皆趨伊吾（今哈密）一路，因伊吾一線僅需八日，而玉門陽關則需十二日；敦煌以西之玉門關，乃不得不撤至敦煌之東矣。

第四節 班超之重振漢威

班超之事實，可作年表說明如後：

光武帝建武六年（三〇）班超生（班固弟）。

明帝永平五年（六二）固被召爲校書郎，與弟超同館洛陽，爲蘭台令史。

明帝永平六年（七三）竇固遣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到鄯善，夜奔匈奴營，斬其使，鄯人震怖。彼莎車；于闐殺匈奴使以降。

明帝永平七年（七四）超平疏勒，諸國皆遣子質於漢。

明帝永平八年（七五）明帝崩，西域復叛，焉耆攻西域都護陳睦。

章帝建初三年（七八）超攻姑墨石城，破之。

章帝建初九年（八四）罷都護。命超還；斬疏勒之叛者，帝准留西域。

和帝永元二年（九〇）超破大月氏副將，大月氏遣使入貢，時閻膏珍在位。

和帝永元三年（九一）竇憲大破匈奴，死，單于西走康居。

和帝永元六年（九四）西域五十餘國悉內附。

和帝永元七年（九五）封超定遠侯。

和帝永元九年（九七）超遣甘英使大秦，至安息西界而返。

和帝永元十四年（一〇二）八月，超返至洛陽，九月卒，年七十一，留西域凡三十年。

伊吾當今哈密，爲漢代中西交通線中國境外之第一站；處南北道之交會點，故極重要。以控制西域言：伊吾爲前門，疏勒則後門也。班超既歸，任尙爲西域都護，乃一變舊制，於是西域復叛，至安帝永初元年（一〇七），竟棄西域，不復置都護。

西域既與漢絕，北匈奴復使諸國攻漢，寇河西。永寧元年（一二〇）邊郡守請擊之。鄧太后問計於班超子勇，勇去恢復敦煌舊有營兵，並遣西域長史出屯樓蘭西。太后從之，安帝以勇爲西域長史。順帝永建元年（一二六）擊退匈奴，西域再服於漢。明年，焉耆亦降。及勇去，漢之威令，遂又不復行於西域！

第八章 漢擊退匈奴後之中西交通

第一節 漢與中亞各國之關係

匈奴雖敗，漢爲鞏固其與西方之通道，除設四郡、築長城、建亭障之外，更進而謀與中亞各國聯盟，以加強國際關係。故漢武帝在北逐匈奴之後，即屢向當時之「中亞通」張騫探詢大夏等國情形，並派其出使烏孫，與之聯盟，其經過如下：（史記大宛傳）

「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曰：……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張騫之第二次出使，其任務圓滿完成；與烏孫成立同盟，並在中亞一帶宣揚中國國威，帶回外國觀光團，使知中國幅員之廣，物產之富，而不得不與中國親善。史記大宛傳記如下：

「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犂婁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

歲餘，竊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

漢與匈奴時或交惡，絕和親，然通商如故也。史記匈奴傳曰：「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往往入寇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但在中國往中亞交通線上，有一地勢極重要之小部落國家，名曰樓蘭，爲西域小國領袖，原屬匈奴，匈奴失敗後，仍不時勾引此等國家，爲其耳目，甚或進殺漢使者，誠如史記大宛傳所云：

「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樓蘭之所以重要，蓋因其地位於塔里木盆地之極東，漢使度過艱險萬狀之鹽澤後，必須休息；而樓蘭「國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漢書西域傳）爲最理想之息足地。

漢爲保護此國際通商路線，則非除樓蘭、姑師不可；爲樹立漢朝在中亞之威信，使烏孫、康居、大宛等，完全脫離匈奴之控制，則非擇其中之一，加以征伐不可。試先讀破樓蘭、姑師之記述：

「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因烏孫、大宛之屬。」（史記大宛列傳）

至於對大宛之軍事行動，則不能如此順利。良以其地遠在帕米爾高原以外，須經羅布泊，沿沙漠，給養缺乏，又無經驗，故第一次遠征，竟致慘敗而回：（史記大宛傳）

「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導軍。……是歲太初元年也。……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

但漢朝之聲譽，必須挽救；否則，匈奴亦不難捲土重來，乃有第二次貳師之西征。因有第一次之經驗，特別注意於給養上之困難，罄全國之力，（所謂「天下騷動」）終於獲得大勝，使大宛訂城下之盟：（同上）

「赦囚徒材官，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騾驢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二十餘校尉。……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糴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與盟而罷兵。」

大宛降後，中亞情勢爲之大變，各國皆向中國入貢。

後漢時，中西通商益繁盛，往來商賈車牛，動輒以千計，後漢書烏桓傳曰：「順帝陽嘉四年（一三五）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胡商且深入內地，後漢書梁冀傳曰：「冀起菟園於河南城西，嘗有西域賈胡，誤殺一菟。」可爲明證。

自漢以後，歷朝對於經營西域，皆有所貢獻，惟其地之華化，不如朝鮮、越南等地之深者，實因對於西域經營，向不澈底，而原住西域之西方系統人種，其文明程度，頗爲發達，尤以在宗教及美術方面，中國反受其影響；惟唐元兩代，西域人之華化，頗有可言者。

漢代與西域之關係，略言之，武帝時，西域各國皆能誓爲歸順，昭帝時，亦有發展；宣帝時更爲顯著。神爵二年（公元前六〇年）鄭吉爲西域都護，駐今庫車附近烏壘城，全境皆在漢統治之下；自是西域都護凡十八任，至王莽時代，始發生叛變，然亦未完全喪失其統治權。王莽天鳳三年（一六），李崇等出西域，西域諸國尙郊迎送兵穀。光武建武十四年（三八），莎車、鄯善皆遣使奉獻。永平三年（六〇），休莫霸與漢入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闐王，則永平間，西域與漢人猶有交通。永平十七年（七四）再設都護，章帝時絕，至和帝時，得班超之力，使西域五十餘國，悉入質而內屬於漢；及超歸國，和帝薨，西域又叛。安帝永初元年（一〇七）西域屢攻都護，於是漢再棄西域。延光二年（一二三）用敦煌太守張璠之策，以班勇爲長史，十七國內屬；王桓帝元嘉二年（一五二），中國在西域之政治勢力，遂告廢絕。

第二節 前後漢中西通道之變遷

中西交通史有明確之記載，自當以張騫始。騫以其身至之國，及所傳聞之附近鄰國，報告於武帝，而司馬遷即將此報告，錄入其所撰史記大宛傳。中國人對於漢初西域各國之認識，實始於此時。但張騫親身所到之地，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國；其所傳聞之國，在葱嶺以西者，僅奄蔡、安息、條支、黎軒、身毒五國，在葱嶺以東者，亦僅烏孫、扞婁、于闐、樓蘭、姑師五國，綜共十四國。然各國間之遠近距離，記述欠詳，僅能使吾人獲得一輪廓而已。及匈奴降伏，各國信使不絕於途，關於西域之知識，中國人所知亦漸多，故班固修漢書，已有西域專傳，西域之國，見記錄者凡五十有三，而在葱嶺以東者即有四十八國。及范曄作後漢書西域傳，乃又增七國。於是玉門關以西，地中海以東，印度以北，裏海以南，所有各國之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無不有確實之記載。

有兩漢書詳細之地理敘述，則漢代中西交通之路線亦更易明瞭。尋常謂有南北兩道，皆始於漢初，並均須經羅布泊低地而西行，僅一傍南山，一沿北山而已。至後漢則別有新道，不經羅布泊。樓蘭與鄯善在羅布泊北岸，適當兩道之衝，故漢初必與匈奴爭樓蘭；後漢時，樓蘭已南遷，鄯善轉強，南道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更形重要；而當時之政策，已一變而為北攻伊吾，

南服鄯善；可見兩漢通西域之路線，頗有變遷，更不必言魏唐以後矣。

漢初之南北道，史或言出陽關爲南道，出玉門關爲北道，史學集刊五期有「古樓蘭國歷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上之地位」一文，作者以實地考察及研究文獻所得，謂：「余疑漢時玉門、陽關相距不遠，自此西行，原祇一路，出玉門關者由之，出陽關者由之；至沙西井後，再分南北兩路進行。」斯坦因之東土爾其斯坦與甘肅地圖稱沙西井爲 *Kumukuk*，意卽沙井；而陶保廉辛卯侍行紀卷六，所附漢玉門陽關路考，係根據清同治間郝永剛、賀煥湘、劉清和等實地考察，則稱爲沙溝。

所謂「新道」者，乃由玉門關卽今大方盤城起，卽折向西北行，經橫坑，避三隴沙及龍河或曰龍堆，出五船北而達車師，卽高昌，當今吐魯番阿斯塔拉。自玉門關至車師，必取道羅布涸海之東北，直達魯克沁南之得格爾。

按魚豢魏略，尙有所謂「中道」者：「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廻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中道亦開於漢初，惟西漢末年，一度封閉，至魏晉又恢復，故見於魏略；實則此「中道」，卽西漢初年之北道也。中道亦稱徑道，蓋北道行於噶順戈壁之東邊轉西，行於庫魯克山之北麓；須繞庫木什山，取道焉者，方至尉犁，不若中道之直至尉犁也。據海爾曼著「中國與古敘利亞間之古絲

路」原書一一五頁，中道七星期行程，一千七百公里；南道八星期行程，一千九百公里；北道九星期行程，二千一百公里。

以上所謂「北道」「中道」「新道」，時有混淆，茲說明如下：

後漢明帝時，重開新道，以新道爲北道，中道廢。

自魏至晉，重開徑道，以徑道爲中道；至其所謂新道，則卽唐之銀山道，亦卽後漢班固所記北道。

第三節 漢代傳入之中亞地理風土等知識

本節材料，取自史記大宛傳，僅錄原文，詮釋及考證，則散見於各章各節：

「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罕、于闐，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

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高漢道焉。……

康居在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破，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竊曰：「臣在大夏時，見卍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

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漢時並已有西域圖。漢書西域傳渠犛條，述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條奏輪臺屯田事，有「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之言。屯田有圖，則軍事上必更有圖。三國志烏桓東夷傳注引魏略云：「又西域舊圖云：崩賓、條支諸國出琦石。」所謂舊圖，當指漢代之西域圖，魚豢尙能目覩。又細味「出琦石」三字，可知圖上尙注有各國物產，則當時之地圖，已頗完備矣。觀漢書淮南王傳曰：「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又嚴助傳載淮南王上書諫誅閼越曰：「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李陵傳稱陵「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趙充國傳謂：「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則張騫、班超、甘英等自亦能憑其經歷，而繪成西亞及中亞之地圖也。

第四節 漢代傳入之西域植物與音樂

明李時珍之本草綱目載張騫傳入之西域植物甚多，勃萊脫胥納特 (Bretschneider) 譯入其

中國植物志(Botanicum Siniicum)。但據桑原隲藏之研究，(見所撰張騫西征考)認爲張騫歸途，曾被匈奴幽囚一年，故輸入植物爲不可能。世傳張騫携入之植物，多冠以胡字，如胡豆、胡瓜，胡葵、胡桃、胡麻、胡葱，其爲外國產物，毫無疑義；其爲漢代已傳入中國，似亦可信，但謂係張騫傳入，則不可能。桑原嘗舉若干最著名之植物而加以考證：

(一) 葡萄非張騫 (北宋蘇頌之圖經本草及李時珍本草綱目) 或李廣利 (西晉張華博物志) 傳來，而爲張騫死後，由無名使者輸入。史記大宛傳曰：「有蒲陶酒」，漢書亦謂「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是漢時傳入之葡萄，多從大宛來。

(二) 苜蓿亦非張騫 (同上博物志及傳爲梁代任昉所作述異記) 傳來，輸入情形當與葡萄同。

(三) 石榴亦非張騫 (唐李冗獨異志及太平御覽卷九九〇、大觀本草卷二三所引西晉陸機與弟書與博物志) 傳入，石榴之原名應爲安石榴，原由安息輸入。

(四) 胡桃 (異物志)、胡麻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及北宋沈括夢溪筆談)、紅藍卽紅花 (南宋趙彥衛雲麓漫抄)、胡葵 (北宋釋文瑩湘山野錄)、胡葱 (太平御覽卷九九六引博物志) 皆非張騫傳入。

(五) 芫荽 (明羅欣物原)、胡瓜 (本草綱目) 皆言張騫傳入，俱不見於古書，不知所本。

古今注卷下引張騫出關志，有酒杯類者，更屬虛構之物。

印度自阿育王朝以後，其文化即遠傳於中亞；據史記大宛傳，張騫使西域時，大夏與身毒（印度）之交通似甚頻繁，則印度音樂之傳於西域，又藉張騫或其他漢使者而傳入中國，爲極可能之事。借記述張騫傳來西域音樂者，僅晉書卷二三樂志中有一節，文曰：

「胡樂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博望（騫封博望侯）入西域，傳其法西京（長安），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中略）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

桑原疑爲六朝時傳入，對「摩訶兜勒」四字，則展轉解釋爲「大伎樂」。最後則謂「本問題之完全解決，不得不期以他日。」誠吾人應取之審慎態度也。

按東漢明帝分樂爲四品，軍中馬上所奏者爲「橫吹」，其始又名「鼓吹」。魏晉以後，則「短簫饒歌」（四品之一）亦列於「鼓吹」，蓋同爲軍樂也。後漢書卷一〇〇班固敘傳曰：「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於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漢初既未禁民間用鼓吹，可見其在秦時必已流行。然其所用樂器，多出胡中，傳入時代，當亦與張騫相去不遠也。

後漢書列傳三十七班超傳注引古今樂云：「橫吹，胡樂也。」

第九章 漢通西域之其他效果

第一節 求仙思想之幻滅

漢代經營西域，最大成就爲匈奴受阻，不能東進南下，及中西交通線之開闢，與中國在西亞威信之樹立。但此外附帶亦產生若干效果，求仙思想之幻滅，卽其一也。

或謂武帝之伐大宛，乃爲求仙，一若求仙乃其發兵之動機。實則斷匈奴之右臂，以防匈奴之入侵，爲武帝最早之計劃，亦卽其派使張騫之最大目的，方士借此機會以蠱惑之，結果乃造成爲絕有效之鼓勵，並促成此空前偉業。故求仙非最早最要之動機與目的；及求仙不成，而良馬已得，於是乃得改良馬政，是改良馬政亦爲結果，而非動機；至於因交通線之開闢，並聞羅馬人樂用中國之綢，於是絲綢乃獲大量輸出，是亦武帝經營西域效果之一，乃亦有謂張騫西使實係考察經濟之說者，寧非倒果爲因乎？

試先言求仙思想之幻滅

武帝時，方士之潛勢力頗大，可由封禪一事見之。史記封禪書曰：「天子旣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致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臣

采僞術以文之。封禪，盛典也，乃以僞術爲文飾，而內心之真正企圖，則爲作僞，固甚明也。求仙之最初地點爲東海，故若爲求仙而經營西域，則應先通西域而不先作東海求仙之嘗試也。不幸，東海求仙竟告失敗。封禪書曰：「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入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五利卽當時之著名方士樂大，其被誅在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

東海求仙之第二次及第三次失敗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及次年。封禪書曰：「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記第三次失敗曰：「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三數日，無所見。」公孫卿亦爲大方士。武帝求仙之心，至此乃大爲失望。

戰國末年以後，中國卽盛行一種神話，卽西方有神怪之水曰弱水，有神怪之山曰崑崙，有神怪之仙曰西王母。已見上述。漢書地理志並述及西王母石室、崑崙山祠等。但史記大宛傳謂：「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窶，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可知武帝取名崑崙，尙係根據古圖書而定者。足見遣使之動機，不在尋崑崙，亦卽不爲求仙。司馬遷以史家審慎態度，在大宛傳贊中言張騫未見崑崙，然亦極注意與崑崙有關之故事與傳說。且知安息人亦傳聞西王母事，大宛傳曰：「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

見。」故白鳥庫吉於其「見於大秦傳中之中國思想」文中，曾判斷張騫西征之隨行人中，必有深信可見西王母者。白鳥之揣測極是。然見西王母乃附帶之希望，而非張騫等西使之真正目的。

武帝求仙之心甚切，封禪書記元鼎四年六月，在汾陰有寶鼎出土，方士公孫卿僞造一故事，謂黃帝鑄鼎荆山，鼎成，乘龍昇天。武帝聞之，大爲感動，曰：「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自是看破榮華富貴，日望昇天成仙，作黃帝第二。惟神龍不可見，帝嘆曰：「昔黃其何不徠下？」（見漢書禮樂志日出入歌）及得西域良馬，乃又迷於方士之說，以爲神馬，可以代龍。故漢書禮樂志有「天馬歌」二首，一爲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〇）馬生渥洼水中作，詞曰：「今安匹，龍爲友」；一爲太初四年（公元前一〇一）誅宛王，獲宛馬作，詞曰：「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可知武帝輩皆信天馬可比於龍也。

武帝既信天馬可以代龍，乃百方求之。大宛傳曰：「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可知武帝初並不知大宛有更好之馬，故伐大宛並不爲求馬，得馬實爲伐大宛之結果。

武帝以易經有「神馬」之語，而名之曰天馬，可見天馬卽神馬。神馬之說源出吐火羅國，獨異錄：「吐羅國城北有顯梁山，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

馬。」史記大宛傳亦曰：「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天馬雖到，元鼎四年且有僞造馬生澠涇水之說者，而武帝之並未成仙，依然如故，西方仙之思想，至此乃告幻滅，實不能不謂爲伐大宛之一大結果也。

第二節 戰馬之補充與馬種之改良

中國古代之馬，本極優良，河南洛陽金村出土之戰國時代之銅馬，其軀體雄偉，應爲富有踴躍力之良馬。但其後卽逐漸退步。至漢代，則先求匈奴馬補充，然後繼之以大宛及烏孫之馬。

武帝得大宛良馬，雖未能乘以昇天，然中國之馬種，乃以此而得改良，實爲意外之收穫。吾人當首知汗血馬是否確係良馬？東觀漢記曰：「聞武帝歌天馬鬣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按此語並見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遺宛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鬣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可證漢人已知有發汗時流血之馬。按 Turkman 馬中亦往往有汗血者，乃自較皮膚約長 0.5mm 之細脈管中流出。蓋有一種寄生蟲，名 *Parafilaria multipapillosa*，寄生於馬之前肩膊與項背皮下組織中。寄生處皮膚隆起，馬疾走時，血管張大，寄生處之創口張開，血卽流出，幼蟲卽棲息於流血處。見于景讓先生著

「汗血馬與苜蓿」、載大陸雜誌五卷九期。匈牙利亦早有汗血馬之記錄，大宛馬即 Turkman 馬，雖不及阿拉伯馬，但持久力頗強。新唐書西域傳記吐火羅亦產此馬。而中國東北部與蒙古、蘇聯、匈牙利及法國等處皆在其分布範圍之內。

又「貳師」二字古音讀若 Ni-Sze，乃費爾干那（即大宛）西部 Nisa 城之譯音。且據托勒密及阿拉伯地理學家巴多瓦 Parthava，則名爲 Nisaiza, Nisai 之地名尙多，假如此等城皆因產良馬而得名，則「貳師」或即因馬而著稱也。

按波斯語稱馬曰 *asp*，或 *aspa*，故續博物志記大宛汗血馬六匹之名曰紅叱撥、紫叱撥及青、黃、丁香，桃花叱撥，即紅馬，紫馬……之義也。白鳥庫吉有專文論大宛汗血馬，見「東亞之光」一卷四號。（明治三十九年八月）

大宛馬之確爲良馬，司馬遷亦深知之。大宛傳爲遷手筆，遷史家也，故本人不迷信，惟對於武帝之思想則不能不記，故崑崙也，神馬也，天馬也，無不述及，至其自言，則僅稱善馬。曰：「宛貴人……共殺其王毋寡，……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與盟而罷兵。」

此數十匹善馬與三千餘匹中馬，對於中國戰馬之改良，貢獻不大，而李廣利之奉命伐大宛，更不爲此。

(一) 或云：漢出馬三萬餘匹，易三千餘匹，不爲改良馬種，武帝不致出此。但三萬餘匹易三千餘匹，並非武帝預定之計劃；況史記但記漢出馬三萬餘匹，並未謂三萬餘匹盡死於西域。故此說不能成立。

(二) 或又云武帝雖多欲，不失爲英明之主，不致發兵十八萬，以求數十匹善馬，貴畜賤人，一至於此也。此說可以證明武帝非爲求天馬而伐大宛，亦非爲改良馬種而出兵西域。與中亞若干國同盟，（初爲大宛，後爲烏孫）以除匈奴，始爲其遠征之最早最大之動機。史言甚明，固不必旁求其他也。

(三) 漢書武帝紀稱「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帝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威震匈奴。」足見彼時中國之騎兵，已在匈奴之上；且如專爲改良馬種，數十匹亦不足用，實因死亡羸瘠者多，不能不求補充耳。求補充，故能取若干，即取若干，史書亦不詳記也。

(四) 漢書西域傳大宛國條謂：「宛自憚封（憚乃毋寡弟）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二匹更何足以言改良全國馬政？而親到大宛之將士，明知天馬非龍，故亦不致以此欺上，可知近世學人或以爲武帝伐大宛，目的在求仙，或以爲旨在改良馬種，皆不過爲標新立異而已。

(五) 上已言元封元年時，中國之騎兵已使匈奴膽寒，但說者謂此係一時一地之現象，以全體言，匈奴之騎實精於漢，故非改良馬種不可。但漢書卷四十九羸錯傳言匈奴長技有三，中

國有五：平原作戰，匈奴易亂，一也；匈奴之弓不及漢弓之勁，匈奴之戟不及漢戟之長，二也；堅甲利刃，漢軍使用自如，三也；漢軍倍利，非匈奴之革術所能支，四也；下馬而鬪，非匈奴所能敵，五也。中國有五技之長，故改良馬種，亦非急需。

(六) 如所得之馬，係為改良馬種，或為備戰之用，則應置之厩中；然據漢舊儀及漢書西域傳贊，宛馬皆被著於黃門，可知皆備天子御駕之用；讀武帝所作西極天馬歌，知其時有乘往崑崙之思。足見其求仙之心甚切，（以後必感失望），改良馬種，恐無暇及此也。

故武帝有求仙之心，但非出兵之動機；得天馬後而猶存短時期之幻想，或亦可能，但此等迷信思想，不久必告幻滅。武帝非為改良馬種而伐大宛，但既得良馬，必發生作用，此項作用，以常理度之，蓋即為戰馬之補充與改良。或引唐六典卷十七引漢舊儀之言，謂當時有苑三十六所，分設於北邊及西邊，官奴婢三萬人，分看馬三十萬頭，為數不少，故無需補充；但西北苑制乃景帝所置，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已罷廢，可知太初年間中國馬或已不多，再加作戰損失，故第一步先求補充，然後始能言改良，否則，三千餘匹皆「中馬以下」者，亦何足以言改良？

第三節 絲絹之大量西銷

張騫之通西域或謂其目的在推廣當時生產過剩之絲，故張騫之一再出使，等於率領經濟考察團。實爲倒果爲因之錯誤論斷。西人之贊成此說者，有洛威爾多瑪斯 (Lowell Thomas) 等。主此說者，謂漢之經營西域，非爲對付匈奴，其目的實在通商。故漢之制服匈奴，乃欲開西域，並非開西域以制服匈奴也。所據理由爲後漢書卷七十七班超傳所云：「臣竊見先帝（明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但後漢書成書較晚，不能證較早之史實。

或又據漢書西域傳贊曰：「孝武之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踰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威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而謂漢世經營西域，其目的在通商。古人撰書，往往因果不分，雖司馬遷、班固亦不能免；即如此文，一望而知爲倒果爲因。且卽就倒果爲因而言，亦僅爲外貨之輸入，而非國貨之輸出。

又或以張騫能獲悉大夏之蜀布，係來自身毒云云，謂爲市場之調查；不知原文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可知張騫乃在獲見中國貨後，始作調查；未出國前，不知外國有中國貨，故亦決未作調查準備。是以謂張騫能善盡其出國之使節，善用出國之機會，而獲得意外之收穫則可，謂此乃其出國之動機及目的則不可。

然漢通西域後，中國之絲卽大量向西方傾銷，要爲事實。蓋因絲之爲物，人工既精，應用尤廣，遠勝於西來之天馬、葡萄、夜光、明珠之類，故東西交通未開之前，必已有展轉潛運至中亞、西南亞，甚或遠至歐洲者。試言其一二。

印度方面，前引公元三三〇年至三二一五年旃陀羅笈多王在位時，巨著高底里雅中不僅有「支那」之名，且謂公元前四世紀時，絲已販運印度。又馬努法典(Laws of Manu)及馬勃拉大(Mhabrata)書，亦均有「支那斯」之名；而「支那斯」最著名之產物爲絲，故知有「支那斯」，卽不能不知「支那斯」有絲。

亞里斯多德及公元前三五〇年之自然科學家不里尼烏斯謂絲乃毛虫所出者。羅馬詩人維奇里烏斯(公元前七〇年至公元後十九年)謂絲乃樹皮上膜流出之物。判斷雖誤，但歐人早知有絲，則爲事實。

中國絲之聞名於國外，應在漢以前。史記貨殖列傳曰：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問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意謂「烏氏」地方商人之名「倮」者，以畜牧起家；畜既多，乃以之出售，而以所得收購精製之絲貨，從間道運銷外國，獲利十倍，卽購中國所最需之牛馬。如此輾轉貿易，「烏氏

深」竟成巨富，所擁牛馬，不知其數，秦以封君視之，並請其常來朝中，參與國家大事。

當漢進西域時，中國之絲不僅已聞名於西方各國，且生產量已足供行銷國外。故欲知漢絲何以能暢銷於西方各國，必須先知其在國內之生產情形。

漢代產絲有國營及民營機構。國營機構見於漢書元帝紀，齊三服官注：「在齊及襄邑置有『服官』二處，在齊者專製春、冬、夏三服；在襄邑者專刺衣繡。元帝曾一度下詔停辦，旋又恢復。至章帝建初二年（七七）又廢。此外又有東織西織，專為承辦郊廟之服。齊三服有工各數千人，一年所費鉅萬。東西兩大織工廠亦然（東織廢後，僅留西織，稱織室。）（參見前漢書卷五七二貢禹傳）可知國營機構工人常在一萬以上，故太史公曰：「齊冠帶衣履天下。」李斯諫逐客書，所謂「阿綳之飾，錦繡之衣」亦為齊之名產。民間絲織業之發達，自更可想而知。「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可知當時實無家不從事於產絲。即富貴人家，亦均參加此項生產事業，如霍光妻、陳寶光妻，皆能織：「六日成一匹，匹直萬錢。」此「西京雜記」之語也。全國織絲者以百萬計，六日百萬匹，兩月一千萬匹，一年即六千萬匹。

漢書張陽傳張安世夫人，自織外，又率七百家僮共織，乃成大富，過於霍光。

產絲以成都為最發達，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蜀字即指蠶叢，可知絲雖不一定發源於四川，但漢以前之四川，必已為絲業最興盛之地。三國志

張飛傳，謂取益州後，諸葛亮、張飛、關羽等，各賜錦千匹。

東漢一代，絲之產量更有增加。光武帝賜盧芳縉二萬匹、樊宏布萬匹、單于縉采四千匹；明帝賜鄧皇后布三萬匹、東平憲王蒼布十萬匹，又二十五萬匹，又四萬匹，又九萬匹；章帝賜昆明夷鹵家帛萬匹，帛卽絲也。故鹽鐵論賢良曰：「今富者緝繡羅紵，中者素縹錦永。常民而被后妃之服，愛人而居婚姻之飾。」

中國之絲，在漢代實有過剩之勢，張騫出使，其主要目的，雖在外交，亦頗善利用。如在火夏見有叩竹杖及蜀布，立即探詢其來源，此臨時之調查也；又曾對大宛王曰：「王使人送導我，……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所謂漢之財物，豈有不包括絲在內之理？此又臨時之絕好宣傳也。及大宛使者既到中國，「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謂漢使，實皆商人，可知彼等赴西方，卽以絲爲旅資也。

第四節 中國灌溉法之西傳

新疆有所謂「坎井」，乃一種地下渠道，以分布於吐魯番、托克遜、鄯善及哈密四縣爲最廣。伯希和、斯坦因、亨廷敦（E. Huntington 美國地學家）及拉鐵摩爾（O. Latimore）均

主張其法傳自波斯。王國維著「西域井渠考」（載觀堂集林卷十三）則以其爲本於我國舊法，曰：「今新疆南北路通鑿井取水，吐魯番有所謂卡兒井者。……伯希和教授疑此法自波斯傳來。余謂此中國舊法也。史記河渠書，武帝初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此事史家不記其年，然記於塞瓠子（元封二年）之前，時西域尙未通也。又大宛列傳云：「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又云：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是穿井爲秦人所教。西域本無此法，及漢通西域，以塞外乏水，沙土善崩，故以井渠法施之塞下。」漢書烏孫傳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至敦煌，遣使按行卑鞞侯井。孟康曰：「卑鞞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井名通渠，又有上下流，則確是井渠。是漢時井渠或自敦煌城北直至龍堆矣。劉郁西使記言穆錫地無水，土人隔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言與漢井渠之法無異。蓋東來胡賈以此土之法傳之彼國者，非由彼土傳來也。」或謂井渠乃地表水，坎井則用地下水；方法雖異，但漢時我國灌溉技術，已傳於中亞，則無可疑也。

另一灌溉工程，見於水經注：「敦煌索勣，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賓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勣躬禱祀，水猶未滅。乃列陣被杖，鼓譟歡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滅，沃衍灌浸，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按注賓河卽今卡騰河，源出崑崙山。亦中國水利工事之西傳者。

第十章 漢代中印間之交通(上)

第一節 印度通於中國之始

言中國與印度交通之起源者，多以為印度產象，則中國古代之象，必來自印度，於是或以舜有異母弟名象，王充論衡卷四書虛篇有「舜葬于蒼梧，象爲之耕」之語，又以孟子卷八離婁下稱舜爲東夷之人，而謂舜象之傳說，必含有南方的，亦即印度文化之色彩。此外，呂氏春秋有「商人服象，爲庾於東夷」之語，而斷爲中印交通必始於彼時。實則以地下之化石考之，則中國荒古時代卽有象。中國之象字，亦早見於周易繫辭，曰：「象也者，像也。」且王充論衡曾駁斥象爲舜耕之傳說曰：「實者蒼梧多象之地」。甲骨文中象字屢見不一。而紂有象箸，（見史記宋世家及韓非子卷七喻老篇），周有象牙之櫛（見毛詩卷四邶風君子偕老篇及卷九魏風葛屨篇）名曰象播；又有象笄；戰國策卷十齊策，載有象牀；周時治象器者曰磬，見毛詩及爾雅卷四；可見商周之世，象非中國希有物，不必遠求於印度也。

妄引史料之外，又有僞造之史料，亦不可不辨。蓋漢末魏晉以後，佛教大行，於是晉道士王孚乃造爲「老子化胡經」，以爲佛乃老子之化身。魏志卷三十引魚豢魏略云：「浮屠所載，

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是以浮屠爲老子之弟子也。此說後漢時或已有之，詳後，然其非事實，則至顯然。

魏晉時僞造之列子，則有「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佛徒亦借孔子口吻而爲佛作宣傳，以爲西方聖者卽佛。

朱士行「經錄」（宋志磐撰佛祖統紀第三十四引）謂：「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齎佛經來化，帝以其異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戶出之。帝驚，稽首稱謝，以厚禮遣出境。」士行乃於魏甘露五年（二六〇）赴于闐求經者，其言亦無所據，純爲虛構。

隋時，費長房著歷代三寶記第一曰：「又始皇時，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齎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此文顯爲脫胎於前書者。

但中印交通之開始，必早於張騫。史記大宛列傳記騫報告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筲，南方閉嶺昆明。昆明之屬

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此報告所叙之見聞當在公元前一二九、一二八年間，在此之前。四川商賈已能設法運銷其絲於印度，復由印度而輸入大夏；然漢政府欲正式開道，則爲昆明夷所阻矣。

繼又曰：「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漢越，而蜀買姦出物者咸至焉。」可見當時走私商人必有至印緬者，惟規模小，故於政治及文化無甚刺激。

至印度人之入居中國，華陽國志卷四有記曰：「明帝乃置郡（按指永昌郡），以蜀郡鄭純爲太守，……有閩濮、鳩獠、漂越、髡濮、身毒之民。」是後漢時，雲南邊境，已有印度人居住；而華陽國志同卷叙永昌之物產，除豐富之勳、植、礦物外，手工業有「蠶桑綿絹、采帛文繡、桐華布、蘭干細布、屬旄帛疊」等，則哀牢夷或受有印度文化影響，蓋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謂揮國通大秦，而揮卽在哀老夷附近，能通大秦，必更能通印度也。

中印之發生正式政治關係，當在公元前一一七至一一六年之間，其時張騫二次出使。史記大宛傳曰：「騫既至烏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窰、扞婁、及諸旁國。……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

第二節 秦代佛教傳入說之商榷

吾人由漢書地理志而知漢時有由合浦、徐聞直通印度之路線，（詳後）然此線之交通僅限於貿易及納貢，文化之影響不大。至印度佛教傳入，中印兩國間，始發生純本國文化之關係。然佛教最初傳入中國之途徑，乃由陸道。

或謂佛教傳入中國，始於秦始皇時，其根據：一為上節所引隋時費長房著歷代三寶記。然其書晚出，欲以證秦代之事，殆不可能。二為民國十六年，日本藤田豐八在東洋學報第十六卷第二號，發表「中國石刻之由來附不得辭」一文，謂史記秦始皇本紀「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不得」為 Buddha（佛陀）之音譯。當在祠字下點斷，讀為二句。民國三十三年有撰「秦史綱要」者，自序謂史記此語乃彼在民國三十年所發見，事非奇事？

藤田之說既出，學者反對者多。民國三十三年二月重慶出版真理雜誌一卷一期有「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討論」，以為「不得」為「吠陀」（Veda）之音譯，而非「佛陀」。時則「秦史綱要」之撰人亦已有「秦時佛教已流行中國考」一文，油印問世。

「秦史綱要」自序曰：「抑予因之而有感矣！讀書之道真不易言。予治秦史，其最基本根據，即為史記。史記者，乃幼而習之之書也。即以發心治秦史之年起計之，至今亦已有十

二年。鑽研於史記之中者，何止百千萬遍！乃逾十年，至三十年秋，始識「禁不得祠」之「不得」卽爲「浮屠」。又逾二年，至本年（按卽民國三十三年），始識「羨門」卽「沙門」，「安期」卽「阿耨尼」。

然此後反對者仍大有人在。蓋明星卽太白星或金星，俗謂此星出，天下當有大變，故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陳槃庵先生有「禁不得辭舉例」載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日天津民國日報「史與地」第十期，在先秦及漢代戴籍中鉤稽「禁不得」三字，證明其爲兩漢三國間，詔令書史所習用；如漢書王莽傳、呂氏春秋淫辭、御覽九一八引魏武帝令及史記張蒼傳。此外以「毋」代「不」者及以「無」代「毋」者各一例；又有在「禁」字下置一賓位然後再加「不得」二字者四則；更有止言「禁無」者。

在語言學上，「不」字個性非濁聲、濁調，與「浮」「佛」不相類；自上古音資料至古音資料主要元音非「u」，亦非「吠」之韻類。

「得」字個性爲入聲，而非「濁調」，自非「濁聲」，主要元音無對讀開口「a」之史實，與「屠」「圖」「陀」不相類。

至伊藤田論文發表後十四年，而始言「不得」爲「浮屠」，謬陋已極。又按「沙門」之梵文原文爲 *Sramana*，巴利文作 *Samma*，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八曰：「沙門，梵語訛

也。正梵音云室囉末拏。」（大正大藏經卷五十四，頁四二〇上）但據今人梵文專家研究，「沙門」並不「訛」，蓋「沙門」一名並非直接譯自梵文，而係從吐火羅語翻譯而成者。在吐火羅文甲（即焉耆語）梵文 *Sramana* 變為 *Samam*，而在吐火羅文乙（即龜茲語）變為 *Samane*，中文「沙門」，即由吐火羅語而來，絕不能譯為「羨門」。

「阿耨尼」之梵文原文作 *Agni*，為火神，在印度古代極受尊崇，中譯「阿耨尼」，頗合梵音，「安期」則不然。據高本漢著「中國文法」(*Grammatica Sinica*)，「安」字發音為 *an/an*，「期」字發音為 *Kiag/Kji/Ki*，與 *Agni*，完全不符。

此外，亦有謂秦始皇遣徐福求仙及求不死之藥，可能受佛教影響；又其時阿育王在位，教化大行，設傳舍及醫藥救濟，後因戰事中殺人過多而皈依佛教，並大加宣揚，不遺餘力；曾派人至埃及、緬甸，歷代三寶記遂謂其曾到中國，皆佛家渲染之詞，不足置信。

大藏經謂阿育王之子曾至秦中，然大藏經原本已失傳，是否有此事實，亦不可考。

第三節 漢代佛教之始傳中國

中國之有佛教，或謂始於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〇）獲匈奴休屠王金人，並燒香禮拜。但此為匈奴之祭天金人，非印度之佛。且其時亦無造佛像之事，可資佐證。然其時知有佛

教，則實可能。蓋張騫回國，即在武帝獲金人前二年，故魏書釋老志載：「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然後漢書西域傳曰：「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知不知爲一事，有否稱述，又爲一事，述而不傳，則更可能也。

較爲可信者，應自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伊存授經始。魏略云：「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守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意謂月氏王使伊存來漢，景盧乃從其習經。

其次則爲漢明帝求經說，略如下。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翌晨問群臣，太史傅毅對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遣蔡愔、秦景等十餘人往求，至西域，得沙門若干人及佛像經卷，載以白馬，共還洛陽。帝爲造白馬寺。來華之沙門譯出四十二章經。

此說見於後漢書西域傳第七十八等，佛教史籍傳會甚多，岐異亦甚；如年代有永平三年、七年、十年、十三年諸說；派往人數有十八、十四、十二等說；到達地或云天竺，或謂月氏；事蹟則有云問其道術、圖其形像、奉迎沙門、傳寫佛經等。

四十二章經序且云：「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國。」弘明集卷一所載「牟子理惑論」「出三藏記集」等皆同。以張騫爲漢明帝時所遣，其爲附會，不言而喻。明胡應麟「筆叢」卷四六曰：「前言張騫，蓋漢武帝時者；漢明帝時，又有張騫，使西域取佛經而返。二張騫同漢人，同使西域，絕奇事。」其爲憑空妄測，不待言也。

然張騫既能在大夏見有蜀布等，且知來自印度，印度又來自中國；蜀布等可以由四川至印度，由印度而大夏，則印度、大夏之宗教，亦必可能在張騫之前，傳至中國。張騫雖非爲求經而出使西域，但在大夏既調查日用品，對宗教亦必不能毫無所聞；故張騫回國，同時亦傳入若干大夏及印度之宗教知識，事極可能，已見前述。

後漢書卷七十二楚王英傳，有「爲浮屠齋戒祭祀」之語，楚王英似亦崇尚浮屠祠者；嘗爲桑門（卽沙門）伊蒲塞（卽優婆塞）設盛宴；則明帝夢見神人之傳說，非偶然也。

然最謹慎之推斷，佛教初傳中國當在永平十年後八九十年之間，卽東漢末桓靈二帝時，後漢書襄楷傳載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楷上書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可爲佛教傳入宮禁之證。四十二章經之於後漢時傳入中國，亦無可疑。

袁宏漢紀謂明帝之後「西域沙門之齋經像來中國者益衆。」實則譯經漸多，當在桓帝元年（一四一）以後，如支讖（卽支婁迦讖，月支人）善通華言，譯經三十九部，傳大乘佛教；安息（卽安世昌，安息國人）傳小乘佛教；竺佛朔（天竺人）等，雖非盡皆印度人，但於印度文化均有介紹之功。

至於造像立寺，最確實之年代，似當在靈帝中平五年至獻帝初平四年（一八八至一九五）時，管融造大佛及佛寺，禮佛者每次五千餘人。其地似在江蘇北部，洛陽、許昌等地，當時亦

已有佛寺建立。

總之：確定佛教傳入之年代為不可能，蓋最初傳入者或不為人知，故無紀載；有紀載者未必即為最初之年；且最先傳入者或為最皮毛最膚淺之佛教儀式，如膜拜佛像，而非重要之教義。

然佛教入中國後，確使中國思想界發生變化。良以秦漢以前，中國四周之文化均為遠遜於我國者，漢武罷黜百家，推重儒學，限人民於訓詁傳注之內；新莽、曹魏，亦依託儒教；正直之士又多受外戚宦官之禍；漢末，又戰禍不已，佛教適於此時傳入，遂大受國人歡迎；且知域外尚有學問，其玄理視老莊尤為深邃而神秘；三世之說，更予痛苦中人民以無限安慰。

惟佛教初來時，實與老子同列，故後漢書楚王英傳謂「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永平八年（六五）明帝報楚王英之詔書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而前引後漢書襄楷傳謂：「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可見桓帝亦佛老同敬。且襄楷傳又云：「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可知當時或已有「老子化胡」之說。藤田豐八以為老子或亦受有印度影響，（見所撰「象」一文，載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余以為此必初期佛教徒欲依附於老子，而成為後世道教譏佛教之口實。

然初期佛教，乃間接傳來，且多為二三流之僧侶，故其後乃有國人親往印度，直接求經學

道之壯舉。

佛經之最早譯入中土者，曰四十二章經，譯經者或曰攝摩騰，亦作竺摩騰、迦葉摩騰。高僧傳謂漢明帝夢金人飛空而至，通人傅毅告以卽西域之佛；帝乃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訪佛法，遇摩騰，乃邀其來華，至於洛陽。曰「漢地沙門之始也」。或曰出國者尙有博士王遵，共十八人；而被邀來華者尙有竺法蘭。

按明帝夢金人及遣人赴天竺之說，固見於後漢紀卷十及後漢書西域傳第七十八，然未記摩騰及竺法蘭也。亦未言及四十二章經也。後世佛教典籍乃多加傅會，或云摩騰譯寫於月支，或謂摩騰在白馬寺譯出，或云摩騰與竺法蘭同譯，或云法蘭所譯。譯主與譯地不一，其可疑一也；經爲魏晉以後文體，且模擬孝經、道德經，其可疑二也；佛教經錄之最早者，當推道安「綜理衆經目錄」，而道安書不載此經，其可疑三也。故此經必中國人所作，而非譯自印度，蓋其內容多爲節自當時已譯之經典，而改以簡潔之文筆。其僞造年代，則必在東晉道安以後，僧祐撰出三藏記集之前，以出三藏記集卷二爲首記摩騰譯此經之始末者，時在齊梁間。

摩騰與法蘭二僧所著者爲譯經，譯經之事既爲後世所僞託，則二人之事蹟，亦不易言矣。已故馮承鈞著「歷代求法翻經錄」，以爲龜茲在紀元前二世紀時已與中國接觸，漢成哀帝時（公元前三二年至一年）往來尤數，不特可以介紹梵僧來中國；且易迎送漢使赴印度。故「魏

略」博士弟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佛經之說，亦不能視爲僞造。據此假定，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既有漢使西去，則六十九年後摩騰與法蘭之東來，似亦不能否認云云。按其時西僧東來，事有可能，請即騰蘭，則難證實也。

第四節 佛教入華與歐亞交通之關係

亞歷山大率軍進入印度，爲東西交通史上一大事；然亞歷山大僅征服彭甲勃（Pendschab）一省，因士卒抗命，乃西歸，卒於公元前三二三年（周顯王四十六年），國土離析，摩揭陀國（Magadha）人旃陀羅笈多在短時期內征服北印度全境，因其母之名而名其朝毛里耶朝（Maurya Dynasty），譯言孔雀朝也。公元前二九七年，周赧王十八年）旃陀羅笈多卒，二十五年後，其子頻陀沙拉（Bindusara）亦卒，孫阿輸迦（Asoka 或譯阿育王、無憂王）立，爲佛教保護人，遣僧人至敘利亞、埃及、馬其頓、錫蘭、西藏及印度全境，傳佈佛教慈悲宗旨。其國境西至印度庫士山，今俾路支全部及阿富汗一部，均在轄境內。北抵喜馬拉雅山。雖提倡佛教，而於其他宗教仍一視同仁；嘉獎科學及藝術，而與希臘之交往，最爲密切。惜其子孫懦弱無能，至公元前一八二年（漢呂后稱制六年）而松喀（Sunga）朝起而代之；公元前六六年（漢宣帝地節四年）改康瓦（Kanva）朝，未幾，爲月氏所滅。阿輸迦卒後，南印度羯陵伽（Kalinga）

及安達拉 (Andhra) 卽自立；公元前七十年（漢文帝十年）滅松喀朝者卽安達拉也。安達拉王朝亡於公元後二一八年（漢獻帝建安二三年）。

在印度有所謂希臘王朝者，前後凡八十二年，歷八君主，亡於公元前九十三年（漢武帝太始四年），希臘、印度文明卽由是而接觸，雙方之美術，混合而成犍陀羅派之「希臘佛教美術」，蓋內爲印度佛教精神，而外型則爲希臘式；希臘之戲曲及舞台布景法，亦同時傳入印度。希臘人所稱爲拔克脫利亞 (Bactria) 卽吾國所謂大夏，斯脫拉波地理書曾記侵入其地之民族有四，卽 Asü, Persini, Tokhari, Sakarne，其中 Tokhari 卽大夏，蓋「大」之古音爲 to，「夏」之古音爲 ha。大夏爲月氏所敗，西漢時，尙爲五翎侯 (Shapsu)，西漢末，貴霜翎侯丘就却 (Kujura Kadphises) 攻滅其他四部而自立爲月氏王，安息、罽賓高附皆爲所破。丘就却卒，子閻膏珍 (Hema Kadphises) 且取印度西北部，建都憐陀羅，爲西域大國。時漢章帝建初三年（七八），又稱迦膩色迦王。崇佛法，召開第四次大會，規定以梵文編訂佛經；然南印度之僧人不與會，佛教遂分南北爲二：南派以錫蘭爲根據地，行於後印度及南洋群島諸國；北派則以北印度爲根據地，傳入中國者，卽此派也。

第五節 中印曆算關係及佛教藝術之東傳

後漢及三國時，天竺、安息、月氏僧衆，頗多來華宣揚佛法者，且能與吾國之「道家者流」或「陰陽家者流」相融和。如漢安帝時，安息僧人安世高，史稱其「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以及鳥獸之聲，無不綜達。」三國時，天竺僧曇柯迦羅「向善星術」，康僧會「亦知圖讖」。安世高以外，漢季劉洪有「七曜術」、晉末徐廣有「既往七曜曆」；南北朝時，七曜曆尤爲盛行，隋書經籍志曆數類載七曜曆書二十三種，凡六十卷，著撰人七。七曜之名見於「摩登伽經」，吳沙門竺律炎與大月氏優婆塞支謙譯，曰：「今當爲汝復說七曜：日、月、熒惑、歲星、鎮星、太白、辰星，是名爲七；時在孫權黃龍二年（二三〇）。安世高亦譯有「摩鄢女經」。晉書天文志有「七曜」一目；陳自天嘉（五六〇）迄禎明（五八七）並用七曜曆。

南北朝時，中國算學所受印度之影響有「三等數法」，卽萬以上之十進、萬萬進及倍進三法。晉時所譯「華嚴經」，所舉數法爲「倍倍變之」；陳時所譯「俱舍論」，則爲「十十變之，百百變之」。東晉佛跋跋陀羅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有拘梨（Kūṣa 唐譯俱胝）、不變（Ayuta 唐譯阿庾多）、那由他（Kayaṭa 唐譯同）等，據唐譯「一百洛叉（Lakṣa）爲一俱胝；俱胝俱胝爲一阿庾多；阿庾多阿庾多爲一那由他……。」天竺小數記法，亦元魏以後輸入中國。「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大波羅密多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大寶積經」等皆可見之。北魏、周間著名天文曆算家甄鸞，字叔遵，通七曜曆，精釋典，校注算經甚多，亦頗受印度影響。

佛教藝術亦即所謂印度希臘藝術，實由大月氏傳入中國。蓋大月氏崇信佛教，而大月氏其時受希臘文化之影響已深，故傳入大月氏之佛教藝術，遂染濃厚之希臘色彩。大月氏王迦膩色迦之貨幣，近年出土者頗多，雕刻之人像及紋飾，無一非希臘型。蓋迦膩色迦之全盛時代，南至印度，東越葱嶺而達于閩，建所謂犍陀羅國，稱雄一時。

大夏亦希臘殖民地，有希臘工匠建造廟塔，雕刻佛像，故造形藝術非常發達，即世所謂「犍陀羅藝術」，亦稱「佛陀藝術」，以其幾乎全部為佛教作品也；故初期佛像，衣飾面貌無不具有希臘風格，作宙斯 (Zeus)、阿波羅 (Apollo) 式。且因受希臘裸體像影響，佛像亦著薄衫，以表現人身之肌肉美。捲髮，即所謂「螺髻」。佛像以外，則有少數工藝品及貨幣。

及婆羅門教在南方得勢，佛教北移，大月氏遂成爲佛教之中心地，迦膩色迦王更努力於佛教統一運動，大月氏之藝術遂伴同佛教，東越葱嶺，傳於中國，南則傳於印度，乃產生印度希臘藝術，在東方藝術史上爲一大變化，不僅在佛教藝術史上爲然也。其後則更由中國而傳至朝鮮、日本。

犍陀羅，法顯佛國記作犍陀衛國；洛陽伽藍記作乾陀羅城；三輔黃圖作于塗國；大唐西域記作健駄邏；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作健陀羅或建駄羅；慈恩傳與吳船錄皆作健陀羅；魏書西域傳作乾陀；拾遺記作舍塗國；又有作乾陀衛或健陀越者，皆梵語 Gandhara 之異譯，Ganda 香

也，故唐高僧傳卷一作香行國；慧苑一切經行義作香遍國；其他尚有作香風國或香潔國者。

犍陀羅藝術以外，又有薩山朝伊蘭藝術，或稱波斯化藝術。波斯即古稱安息，為希臘亞歷山大王征服之地，故有希臘、羅馬系之藝術。古波斯至公元二二六年而絕，代之者為薩山朝新波斯國，但藝術上仍保留古波斯之風格，即在歐羅巴系統以外，再加其它民族藝術而成，尤以薩山朝初期之藝術為然。此種藝術作品，見之於經典中之插畫、大建築物之藻飾、象牙雕刻、貨幣、繡品、織物及氈毯等。

以上兩種藝術遺物，經英、德、法、俄及日本人發掘研究後，已大顯於世；在中國則後漢、三國、西晉時代，皆有流傳。至公元三世紀後半，佛教自大月氏傳入後，寺、塔及千佛洞已漸次建立。千佛洞為中印度作風。

上言大夏有犍陀羅藝術，今庫車亦在其範圍，庫車前石洞中壁畫及佛像，即帶犍陀羅作風。在基色爾(Kizil)成排石洞中，一洞因有壁畫，乃名「畫像洞」。畫上空白處，作畫者畫其本人肖像，深目高鼻而穿短衣，著長靴，手持畫板，下簽印度文名曰Mithradatta，但此名應原為羅馬名Mithradates，想因久住印度，已為印度化，乃改印度式名。斯坦因又在羅布泊之南彌蘭(Milan)發現一塔，作印度式，其外有廊，可迴旋而上；廊亦有壁畫，其中即有長翅之小孩，作基督教天使狀，其下簽名曰Mithra，亦應為羅馬名Mithras之變體。故天山南路一帶，已

有羅馬派畫家之活動。斯氏記天使之特徵爲有大眼，全張，生氣勃勃；唇小，作波浪形；翼短而富曲線美。又同一區域所發現之貨幣，有阿波羅、海拉格來斯（Hieracles）、愛洛斯（Eros）等希臘神話中之神像。此後中國畫中有所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之畫派，實係曹仲達，其作風在表現人身線條，故衣裳皆緊貼於身；吳指吳道子，其畫飄逸，衣帶如迎風而舞。此種風格以涼州爲中心，然後傳入中原。故敦煌壁畫及六朝佛像，無不長頭高鼻，足證其時中國但知輸入西方藝術，而未加改造。魏都大同，故涼州藝術家亦移至大同，而有雲岡造像；及遷都洛陽，洛陽遂亦有石窟，且有同樣風格之佛像，皆漢代外來藝術之餘波也。

佛教藝術之外，西域亦傳入其他藝術。漢與六朝，神獸之圖案畫最多，皆呈不可思議之像。郭璞註靈獸爲「獅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疎勒王來獻犍牛及獅子」。然在「海獸葡萄鏡」或「舞鳳狻猊鏡」之鈕上所見者，僅能名之曰怪獸，或稱爲麒麟，似鹿，獅子頭，角在鼻上。

佛教傳入中國後，本書四章三節所謂鳥類藝術，亦一變而爲印度系之「妙音鳥」，名爲「迦陵頻伽」（Kala Vinka），傳說爲極樂淨土鳥名，或作迦陵頻，或作頻迦鳥，亦爲鳳形。漢代孝堂山祠堂及六朝漢式鏡上之孔雀，線條甚美，生動之姿態，完全爲西徐亞式，但亦夾有漢代樸素雄偉與印度怪異之興味。漢代輸入「天馬」後，馬形之藝術遂多；後漢光武帝建安二十年（四四）馬援即鑄有馬式銅鼓；樂浪亦發現有漢代銅馬及綠釉陶馬。漢代瓦當文又有兔，但亦帶翼，

成爲西域理想化動物，樂浪出土之鏡背及漆杯上亦可見兔子搗藥圖案，牛羊之爲漢代藻飾，並作西方型之姿態，尤爲多見。東京大學工學部藏有漢山東齊寧晉陽山慈雲寺畫像石，有犬，野性洋溢，耳目四足，無不表現其敏捷與強悍；但亦有作獅子姿態者。

上言內國佛教造像立寺之確切年代，當在後漢靈帝中平五年至獻帝初平四年之間，其原因之一，則爲靈帝特好「胡化」，如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而尤愛賞玩胡笙、胡笛、胡舞；貴族亦競效之，故西方各國之服飾與樂器，遂大量傳入。

至於漢鏡，則有純粹中國式者，有在花紋中雜以西方意味者，如刻有葡萄等外來植物。蓋自西域大通後，希臘羅馬商人，必有將工藝品輸來我國者，我國工匠遂亦參用西方圖案。

至於波斯藝術之最可代表者，爲後漢獻帝建安十四年（二〇九）所立高顯墓前之石獅，墓在四川雅安縣。（據立碑年代而假定石獅與其爲同時代物）胸之兩側，刻有翼形，爲純粹之西方藝術，乃希臘藝術之受有安息影響者。或稱之爲虺龍形；殷周時代之銅器上固已有夔，但加以翼形，則爲西域產物。至烏孫與大宛馬輸入後，龍之見於圖案中者，乃作龍馬之狀。見山東嘉祥武氏祠堂畫像石刻。

外來織物中之氍毹，爲匈奴所有。太平御覽卷七〇八引後漢初杜篤之「邊論」，有「匈奴青羊，氍毹、罽褥、帳幔、氍毹，積如丘山。」所謂「匈奴請降」，殆指前漢宣帝時呼韓邪單

于之降。故前漢末，後漢初，中國上流階層中已多有採用者。北堂書鈔卷一三四班超與弟班固書，卽有云：「月支氍毹，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太平御覽卷七〇八載馬融奏文，云：「馬賢於軍中，帳內施氍毹，士卒飄於風雪。」班超謂此物出於月支，但北堂書鈔卷一三四，引「吳時外國傳」，則謂「天竺出細靡氍毹、氍毹；氍毹細者，謂之氍毹。」而魏志卷三〇引魏略，則謂其爲大秦產，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引文中，云石勒建平二年（三三一東晉成帝咸和六年）大宛貢獻物中有珊瑚、琉璃及氍毹。（氍毹常係氍毹之誤）北魏書及隋書西域傳則稱其爲波斯出產品之一。綜合以上諸文獻，可知其必爲葱嶺以西，印度北部諸國所產織物，惟大秦國所產者，色彩最爲鮮明。北堂書鈔卷一三四引魏略曰：「大秦國以野繭織成氍毹，非獨以羊毛。」又「大秦國以羊毛、木皮作氍毹之屬，有五色九色。」同書同卷又引魏略曰：「爲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萬變，唯意所作，上有鸞鷟，遠望，軒軒如飛。」讀此，卽令人聯想薩山朝波斯與東羅馬藝術之作風也。

第十一章 漢代中印間之交通(下)

第一節 漢代南方之海外交通

秦時，南海已設有官吏，二世卽位，南海尉任囂死，龍川令趙佗繼之，遂與秦絕。漢高祖復冊立爲王，呂氏時又自稱南越武帝；文帝時，再去帝號。武帝元鼎六年（一一一）伏波將軍路博德與樓船將軍楊僕入越，遂分其地，立南海（治番禺）蒼梧（治廣信）鬱林（治布山）合浦（治徐聞）珠崖（治潭都）儋耳（治義倫）交趾（治羸陵安南國地）九真（治胥浦安南國地）及日南（治朱吾安南國地）等九郡。

自南越可通海外，前漢書地理志言之甚詳：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烹食爲耦，蠻夷買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

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遠（還）矣。」

南方之海外交通，全程竟達二十月，而陸程僅十日。所經六國中，以黃支爲最大，其地卽印度東岸之 *Kanchipura*，唐玄奘稱爲建志補羅國。已程不國或考爲阿比西尼亞國，舊稱 *Aethiopia*，音頗近似。漢時赴西方之海道，蓋以印度爲最遠也。

此南方之對外交通線，自漢至唐，爲外國貢使及商賈所必由，故唐書地理志曰：「交州都護制諸蠻，其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自漢武以來，朝貢必由交趾之道。」末二句最重要，而交州爲唐以前中國最重要之對外貿易港，亦可由此見之也。

至其他國名，據費郟考證，夫甘都盧國似爲緬甸之蒲甘（*Pagan*）古城，其遺跡在今伊拉瓦底（*Irrawaddy*）江左岸；皮宗卽蒲牢皮散（*Pulaw Pisan*）島，在馬來半島西南沿岸，北緯一度三十分之間。見馮承鈞譯「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後漢之海道交通尤臻便利。後漢書卷六三鄭弘傳卽謂章帝時，交趾七郡之貢獻，皆遵海道。同書卷一一六南蠻條曰：「順帝永建六年（一三一）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

便金印紫綬。」後漢書註：「劉攽曰：『按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字也。』」葉調國名並見後漢書卷六順帝永建六年條，曰：「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揮國，遣使貢獻。」

又晉時與史記、漢書併稱為「三史」之「東觀記」（即東觀漢記），章懷注云：「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為漢歸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又揮國王雍由，亦賜金印紫綬。」伯希和以其為爪哇島，或以其在錫蘭，費瑯有「葉調斯調與爪哇」一文，見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藤田豐八亦有「葉調斯調及私訶條考」一文，見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

按托勒密地理書稱秦尼（即中國）有海口曰加底加拉（Cattigara）（詳見後）。拉古貝里曰：「中國古代交趾之讀音為交梯，故托勒密之加底加拉即交趾國。」而在未到加底加拉前，又有柴巴（Zaba）港，則為占婆之轉音，即今占城。可見交趾海口，在東漢時已為中國對外交通之重要港口。

第二節 漢代西南方之對印交通

古代中國與印度之交通線有三：一為由四川經雲南，入緬甸，然後至印度；一為由新疆，

出葱嶺而南下；一爲由海道而往，多在錫蘭登陸，然後北上。

由今日新疆往西方之路線，前已詳論；茲言雲南、緬甸一線。但欲知此一線之淵源，又必先知秦漢時代中國西南之交通情形。

秦漢間，西南交通以四川爲集中點，則以四川出產最多，銀、銅、鐵、鹽、蜀布、枸醬，皆各地所需，故四川亦最富。史記貨殖列傳謂「蜀卓氏居臨邛，鐵山鼓鑄，運籌策，傾瀛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按當時之交通線有三：一曰五尺道，在今貴州遵義；二曰夜郎道，自犍爲（今四川宜賓）直指夜郎（今貴州盤縣及雲南平夷）；三曰靈關道，自成都附近至今之昆明。

三道中，夜郎一道最爲重要。此道始於漢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〇），自今宜賓東南行，經赤水、畢節，而至雲南之宣威、曲靖，但通印度之道，當爲第三道，過大渡河、安寧河，經今之會理，又過金沙江及瀘水，然後東至昆明，西至緬甸。

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張騫出使大夏歸來，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思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前漢書西南夷傳）

帝派人至滇，滇人爲之求道，久之，皆爲昆明夷所阻，不能通。

身毒卽今印度，大夏爲希臘所建國之一，已見前述，當今阿富汗境，卽拔克脫利亞，或曰巴爾克(Balkh)。張騫在大夏得見四川產物，可知印度與大夏間，印度與中國四川間，必有商業上往來。

但據史籍所記，則當時中印之交通未能直達，中有昆明夷阻隔，其目的或在壟斷商務，亦猶甘英欲出使大秦，安息人爲希望專擅綽綣之利，亦從中加以阻止。

漢武帝爲打通此中印通道，乃決計征昆明夷；探知昆明有池，善水戰，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鑿大池，周四十里，練習海軍。

滇之昆明，當今保山大理之間。蓋據史記西南夷傳，謂自滇以北，君長以千數，邛都最大；其外西自同師（在今永昌境）以東，北至樸榆（今大理境），名爲僇昆明。

此外則勞深、靡莫二部，亦嘗阻塞中印交通。此二部在今大姚、姚安二縣境。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武帝使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之，以兵臨滇，滇王請降，上於其原轄區，設益州郡，賜王印，仍令長其民。然昆明在其西，屢阻漢使，斬首數十萬，竟不能通。

至前漢末年，則在今川、滇、黔、康諸省間，已設有四郡六十八縣。四郡爲犍爲郡，領有

潯四川東南及雲南東北諸府；越嶲郡，領有前建昌道所屬及雲南西北諸府；益州郡，領有前滇中道及大理、永昌等府；牂牁郡，領有貴州全省及滇東、滇南諸府，於是交通益便，商旅亦逐漸發達；至後漢初，則中國之政治與軍事力量已達於滇西邊隅，設置永昌郡，其時威震緬甸，乃得與印度直接交往，有關於印度之知識，亦自此輸入，而永寧元年，揮國王雍由調之獻樂及幻人，亦卽由此道而來；幻人自稱海西人，又云海西卽大秦；後漢書作者且加按語曰：揮國南通大秦，則失之遠矣。凡此皆已見上述。

第三節 漢代之中印貿易

漢代之中印貿易史料，首可求諸前引漢書地理志。其時由中國而往者爲黃金與雜繒，卽各種絲織品；中國購進者則爲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但張騫在大夏所見之蜀布及邛竹杖，既係印度販自中國，轉販於大夏，大夏有此需要，印度自必更有其需要；甚或可謂印度輸出者，乃印度之剩餘品。亦猶中國與羅馬間有絲絹貿易，安息爲經紀人，則中國與安息間亦必有絲絹之貿易；故漢代中印間之貿易品，應包括蜀布與邛竹杖在內。蜀布其時名黃潤細布或筒布，用麻製，或麻葛混合製造，非棉製，棉至六朝始輸入我國也。

明珠又稱眞珠，或作麻尼珠。麻尼爲 *Mani* 之對音，義爲「無垢」。通典黃支條，明珠

下加玉字，蓋以爲乃玉之一種。

璧流離後漢書南蠻傳哀牢條作瑠璃，爲梵文 *vaḍḍirya* 之對音，阿拉伯、波斯語作 *billaur*，拉丁語作 *beryllos*，（希臘字不便印刷，從略）今英文作 *beryl*，其源實出梵言。隋、唐以後稱玻璃，此本漢時寶石名，非一物也。

徐松「西域傳補註」屬賓條璧流離之補註，解釋甚詳，曰：

「璧流離，梵書作吠瑠璃。一切經音義，舊言鞞稠梨夜，亦言鞞頭梨，或云毗瑠璃，亦作鞞瑠璃，皆梵音訛轉，從山爲名，鞞頭梨山出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烟焰所能鎔鑄。……說文云：瑠璧，瑠石之有光者也。段氏謂璧瑠卽此傳之璧流離。漢武梁祠堂畫及吳國山碑，皆有璧流離。今本漢書注脫璧字，讀者誤以璧與流離爲二物矣。璧與吠音相近。」

三國以後，中國自西南海上諸國運入者，以香料爲大宗，而漢代未之見也，則以香料與佛教有極深之關係，佛教傳入前，中國對香料之需要固不甚大也。

從漢書地理志所記，亦可見漢代中國商人從事海外貿易之情形，如云：「所至國皆稟食爲稱」，「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似須改乘外國商船，始可達於印度南端。

至所謂「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云云」，可知漢武

帝不僅曾募出使西域者，同時亦募出使南海者；由當時譯員之需要，亦可窺見中國與南海貿易發達之一斑。黃門隸少府，證以唐宋市舶多由中官兼領，可以推想漢代通南海者亦爲中官。

第十一章 漢對黎軒之認識

第一節 黎軒之考證

漢時中國所得關於歐洲之各種知識必不少，傳入之來源不一，而張騫之報告爲最詳最確，似無可疑。張騫傳聞之西方古國有安息、條枝、黎軒、大秦、身毒等。安息卽古波斯，條枝在今敘利亞，大致已無問題；身毒更可確定其爲印度；所當研究者爲黎軒與大秦。

黎軒亦作鞞軒，見史記、魏書、北史；或作鞞軒，見前漢書及魏略；又作黎鞞，見後漢書及晉書。軒今讀該、看、度、建四音，但實與軒同。

吾人欲知黎軒究爲何國，可助考證之資料有三：

(一) 黎軒地在何處？黎軒一名，最早見於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傳，曰：「安息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爲敘利亞，奄蔡卽 *Aorsi*，則黎軒當爲大夏。

(二) 黎軒之人如何？前漢書卷九十六上云：「初漢使至安息，……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鞞軒善眩人獻於漢。」眩人亦曰幻人，卽魔術家，古代西亞及地中海附近各國，皆有魔術家，而亞歷山大城之魔術家最爲著名。魏略大秦條云：「俗多奇

幻、口中吐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魏略之大秦，蓋泛指羅馬帝國等處而言也。

(三) 黎軒有何別名？據後漢書卷一一六哀牢夷傳：「永寧元年（一二〇）罽國王……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罽國西南通大秦。」據此，則幻人爲海西人，海西即大秦。魏略亦云：「大秦國亦號黎軒。」大秦之考證，見下，茲先假定其爲羅馬，則所謂「大秦國亦號黎軒」，易言之，黎軒即羅馬。然大秦一名，載籍中常單獨引稱，此必爲後漢書與魏略作者混淆不清之所致也。

漢以後之史家，所以混黎軒（或犁鞮）與大秦（羅馬）爲一，其另一原因，蓋以希臘大帝國、白亞歷山大卒後，卽分爲：非洲之埃及王國、亞洲之條枝王國及跨歐亞二洲之馬其頓王國，或稱希臘王國。公元前一六七年，馬其頓亡於羅馬，於是在小亞細亞之領土亦爲羅馬所有，包括條枝即敘利亞在內，其時尚早於張騫西征數十年。羅馬既繼承希臘在歐亞之主權，中國史家乃認二者爲一，言黎軒有時卽指大秦，言大秦有時亦指黎軒。

(四) 黎軒之對音爲何？夏德所著「中國與東羅馬」，以爲軒或軒當讀若干，故爲 Reken 種族之對音，此族住於 Petra，其地居敘利亞、埃及、阿拉伯三地之中，羅馬人名之曰 Aradia Petraeca，轉變而爲 Reken, Rekan, Rokom, Arekeme, Arkem，此城在二世紀時極繁

榮，夏氏以爲張騫在大夏必能聞知其名也。然軒軒均屬 *h* 音，而非 *g* 音，與 *Reken* 不合。或以爲乃拉丁 *Latium* 之對音，或以爲乃拉丁文希臘 *Græcia* 之對音，亦均不合。蓋 *Latium* 固羅馬人之發祥地，讀若「拉啓烏姆」，而軒軒之古音爲干，與「啓烏姆」之連讀並不合；其民族名之讀音爲拉丁，尤不合黎軒或黎軒。至拉丁人稱希臘爲 *Græcia*，以時代言，且在漢武帝之後，故不可能爲黎軒之對音。

藤田豐八以爲卽「幻人」之原名，*Rahta* 或 *Rhaga* 之對音；然觀上引各文，常與其它國名並列，不指職業也。

馮承鈞以爲其含義相等於梵文中之 *Yavana*，蓋泛指希臘殖民地也；至於其讀音則爲亞歷山之簡譯。此說本創自白鳥庫吉，伯希和贊同其說。兩氏皆引巴利藏「那先比丘經」(*Milinda Parha*) 之漢譯本，彌蘭王吉那先 (*Nagasena*) 曰：「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巴利本阿荔散原名作 *Alasanda* 島，*Kalasi* 聚落。*Alasanda* 應卽爲今日亞歷山大城之對音。伯氏且以爲卽埃及之亞歷山大；蓋古代以亞歷山大爲名之城頗不在少也。

此外，唐道宣法苑珠林卷六一云：「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幻術，能斷舌、續筋、吐火。」此僅足證西方幻術曾傳於印度，而不能據以定黎軒之在何地。

或云其在條枝，因史記大宛傳條枝下有「國善眩」之語，但條枝有魔術家，當無可疑；謂

條枝卽黎軒，則不合。蓋條枝乃 *Trachin* 之對音，原爲阿拉伯一海口名，後以稱敘利亞。

黎軒一名之所指，據以上所有材料，加以綜合研究，似含有下列三種含義：

- (一) 指地中海東部，希臘殖民之所在地；
- (二) 指中亞及西亞，因亞歷山大遠征，而曾爲希臘人足跡所到之地；
- (三) 指羅馬帝國，以其亦曾有希臘人也。

第二節 漢及後世對黎軒之認識

漢代知西方有黎軒一國，但頗模糊。就上節所採史料，可知：

- (一) 史記則混黎軒與奄蔡爲一，謂在安息北；
- (二) 史記似又混黎軒與條枝爲一，謂前者有善眩人，後者國善眩；
- (三) 前漢書混黎軒與條枝爲一，同在烏戈山離西；
- (四) 魏略混黎軒與大秦爲一，曰：「大秦一號黎軒。」

中國史家對黎軒之知識固不甚清晰，但爲張騫第一次出使大月氏後卽已覆命於武帝者，史記大宛傳所云：「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黎軒卽五六大國之一也。時已在亞歷山大征印度後二百年，中亞國家，對西亞及歐洲情

形，所知自較中國爲多。

史記大宛傳記武帝在張騫二次出使時，卽另派使節出使上所云「大國五六」。故曰：「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但實際並未到也。漢朝使節之到達條枝，亦常在後漢時甘英奉班超之命而往；故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曰：「和帝永元六年，……其條枝、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椽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據甘英之報告，西海以東諸國，若條枝，若安息，皆爲「前世所不至」，且未提及黎軒，故當時人已能證實安息與條枝之間，及烏弋山離與條枝之間，並無所謂黎軒。

甘英雖至黑海，但對於黎軒，並未作何研究，蓋彼心目中但知有大秦，卽班超心目中亦但知有大秦，故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曰：「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枝，臨大海欲度云云。」

乃後人竟誤黎軒、大秦爲一，最先致誤者爲何人，今不易言；魚豢撰魏略曰：「大秦國一號黎軒，在安息條枝之西，大海之西，……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

吳謝朓後漢書曰：「大秦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

晉司馬彪續漢書曰：「大秦國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國」字下疑脫「一」字，「鞞」

字衍。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一「八西域傳」：「大秦國一名黎犍，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

此種誤會，純爲後世之傳誤，班超、甘英諸人對黎軒固忽略，但未以之與大秦誤爲一談。

班固撰漢書西域傳，雖多抄襲史記，但已加入其所新獲得之資料，故對於安息曰：「西與條枝接」，（史記作「其西則條枝」），「北與康居接」，（史記作「北有奄蔡黎軒」）。

可見漢書西域傳安息條，已將黎軒刪去；但在烏弋山離條，又有「西與黎軒條枝接」之語，蓋因條枝與黎軒皆多善眩人，故有此錯誤推測。

漢書對條枝及奄蔡解釋甚詳，但對黎軒則付闕如，蓋班固對黎軒之方位，尙未十分明瞭，至其與條枝之關係，則更茫然。試讀其康居條：

「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試再讀安息條：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黎軒眩人獻於漢。」

讀以上兩則，可知班固對條枝及奄蔡之知識已較司馬遷爲多，而對於黎軒（黎軒）則無任

何進步。

且前引「西與黎軒條枝接」一語，一若黎軒條枝卽爲一國；黎軒地點之歷久不明，此語之影響最深。

第三節 希臘文化之東漸與漢代之希臘譯名

一 希臘文化在東方之影響

與漢代關係較多之中亞國家，爲大宛、大夏及條枝，三國皆亞歷山大所建，謂爲希臘殖民地，實非過甚；此等國家之希臘化亦極濃厚，且在希臘亡後，仍能歷久不衰。在中國及中國載籍中之所以殘存不少希臘式名字，亦可以想見希臘文化之高及其影響之大。

亞歷山大之不得已而西返，且英年早逝，在希臘言，實爲希臘之慘劫，當然亦波及隨武力以東漸之希臘文化。

然一種高度文化，雖在政治力消逝後，無法可以使其完全消滅，必將留下若干種子，在後世萌芽。

希臘人本爲一對生命極度樂觀之民族，但到空卽是色，色卽是空，盛行悲觀厭世思想之印

度，不惟不覺格格不入，反有滿足之感。希臘人乃稱印度爲 *India*，意謂「心之和平」。其他歐洲人，須自基督教傳入，始覺心靈有所依託，希臘人則早三百年，已在印度獲得矣。

以此之故，希臘文化乃能在印度發生影響，且能保存於武力退出以後，故希臘勢力所到地之印度王貨幣，均刻希臘神廟像；而西徐亞勢力所及地之印度王貨幣，則未受西徐亞影響，所鑄仍爲佛像。至若印度西北部，高級異教主義竟能取佛教而代之，實亦接受希臘文化遺產之所致然。

二 漢譯希臘地名

一爲大宛。大宛與西歷山大之關係，前已言之。西域人稱希臘曰 *Yaspa*，大宛猶言大希臘也。

一爲驪軒。舊縣名，漢置。在今甘肅永昌縣南，處張掖（甘州）武威（肅州）之間。漢書地理志注：「李奇曰：『音遲虔』；如淳曰：『音弓軒』；師古曰：『驪音力遲反；軒音虔，今其俗土人，呼驪軒疾言之曰力虔』。相傳漢時以其降人置縣於此，因以爲縣名。」

三 漢譯希臘植物名

〔苜蓿〕亦作日宿、牧宿、木粟。俗稱金花菜、盤歧頭、草頭。有紫花、黃花及同開白、

黃、青、紫花者三種。原產高加索南部、波斯及喀什米爾等地，爲飼料，亦可作蔬菜。果有刺，生三、柔小黃花。史記大宛傳謂漢使取苜蓿、蒲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不一定爲張騫或李廣利傳入。

肯斯彌爾 (T. W. Kingsmill) 認苜蓿爲希臘文 *Medice* 譯音，翟理斯字典同。拉丁文作 *Medica*。按此草名曾見於斯脫拉波地理書中。或以爲乃 *Buso* 譯音，裏海附近土人呼以此名。伊朗語作 *Musu*，音更近。其原產地即在高加索山南部，伊朗、阿富汗、俾路支等，公元前四七〇年即傳入希臘、羅馬。

〔葡萄〕史記作蒲陶，漢書作蒲桃，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三，望音生義，曰：「人酹飲之則醜然而醉，故有是名。」不足信。多馬旭克 (Tomschek)、肯斯彌爾及夏德，皆以爲是希臘文 *Botrus* 譯音。洛弗爾更窮其源，知葡萄原產伊蘭北部及中亞，西傳希臘、羅馬、高盧一帶，東傳大宛及中國，故其語源當爲伊蘭語 *Budawa*。此說甚是，但中國譯名，似直據希臘語，蓋彼時希臘語隨希臘人之足跡，已遍傳於中亞也。

〔胡葵〕希臘文作 *Kusbavas*，波斯、阿拉伯、土耳其、阿爾馬意 (Armaic) 及梵文俱同。

第十三章 漢與大秦之關係

第一節 大秦之考證

三國志卷三〇註引魏略，稱大秦人曰：「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

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曰：「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

後漢書顯係抄襲魏略，惟魏略並未謂以其類似中國人，而稱之曰「大秦」。至後漢書，則「大秦」與其民之貌似中國人，已由作者爲之確定關係，以「有類中國」爲因，以「謂之大秦」爲果，而以「故」字聯繫其因果關係。

二百餘年來，中西學者，多以大秦爲指羅馬而言，然羅馬人與吾國人，相去甚遠；羅馬人必不能較康居、月氏、條枝、安息等國人更肖似吾國人；果羅馬人以其類似中國而被稱爲「大秦」，則康居等國人，早應稱爲「大秦」或「小秦」。況若日本人，決不致較羅馬人更不類吾國人，然吾國人仍以其所自稱之「委」「倭」「倭奴」「邪馬臺」等稱之；反之，後世日人則稱自中國而去之中國人爲「秦人」。

卽以其有似吾國人而名之曰「秦」，何以又冠以「大」字？余疑「大」字亦爲譯音。漢代外國地名之有「大」字者頗多，雖有人以爲「大夏」之「夏」，亦猶「大秦」之「秦」，乃指中國而言，但其說無據，晉張華撰博物志「異人」條曰：「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一望而知爲無稽之談，不足以徵「大秦」之「大」字，爲「中」「小」之對稱。而「大夏」爲吐火羅之異譯說，則已爲多數學者所接受。藤田豐八亦主「大秦」二字皆爲譯音，見「東西交涉史之研究」西域篇「黎軒與大秦」一文。

藤田以爲乃古波斯語 *Dasina* 之譯音，義爲「右」，右卽西。中古波斯語去 *o* 而爲 *Dasin*，故魏略云：「在安息、條枝之西，大海之西」，「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凡四言「西」；後漢書曰：「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故後人稱羅馬帝國曰大秦，實猶明末人之稱歐洲爲「遠西」「極西」「大西」，亦猶今人稱歐洲爲「泰西」或「西洋」。藤田又指出在美索不達米亞，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之間，一片沃土，其時卽稱 *Dakaina*，中國聞知此名後，卽以之稱羅馬帝國東境之全部地域。古印度語作 *Dakaina*，可知古波斯語實與古印度語同源，而爲印歐語中之波斯系。

「大秦」一名既指「西方」而言，故其地域不定，遠近難分；遠則稱歐洲，稱羅馬帝國，近則稱印度，稱印度附近諸國，皆曰「大秦」。如後漢安帝永寧年（一一〇）罽國使者帶幻人來

朝，曰：「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見後漢書卷一一六南蠻西南夷傳。此幻人固可能來自地中海一帶，但後漢書明言大秦卽在揮國西南。且北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悅般國」條固明言其國亦有魔術家，曰：「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其地在緬甸之西，印度東南，則揮國所帶之幻人，其爲悅般產，可能性或更大。如此，則「大秦」卽在印度或印度之附近矣。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一章謂揮國所獻大秦幻人，疑是南天竺幻人，蓋南天竺一名 *Dalsina-Panja*，卽「法顯傳」之「達攏」。其人亦自昔以幻術著名，「法苑珠林」卷七六記唐貞觀十二年（六四六）西國有五婆羅門來京師，善能音樂、咒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之類。

然中國史籍所有外國地名，往往同一名稱，而前後所指不一，故藤田等以「大秦」一名一概歸之於印度人，亦非吾人所能同意。卽如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所記「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此所謂安敦王，近人已考定其爲公元一二一年至一八〇年在位之羅馬王 *Marcus Aurelius Antonius*，安敦卽 *Antonius* 之譯音，今作安多尼。蓋安敦之部將伽西烏斯 (*Avidius Cassius*) 曾於公元一六二年至一六五年之間征安息，奠定小亞細亞一帶。故當時在安息一帶，羅馬人必不在少，此來華使節容或爲商人所僞託，而非羅馬王所派遣，然其爲羅馬人卽歐洲人，則讀後漢書原書上下文，

實無可疑。

關於「大秦」之各種解釋，可附述如後：

西人最早介紹此名者，當爲基爾旭，一六三六年（明崇禎九年）出版氏所著「哥薩多語埃及語就先論」(Prodrornus Coptus sive Aegyptiacus)，卽曾譯景教碑文中之「大秦」。

主「大秦」卽羅馬帝國說者爲劉應、德經、格拉勃洛德、勃萊脫胥納寶、里希霍芬等。

夏德初亦主羅馬說，後改主敘利亞說，並專爲此著「中國與東羅馬」一書。

亞倫 (Allen) (疑卽林樂知) 則痛駁夏德主張，而代以亞爾美尼亞說。

包梯愛謂指亞歷山大王部將賽留古斯在敘利亞之後裔而言。

艾約瑟於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撰「羅馬及拜占庭之訴說」(Aplea for Rome and Byzantium)，發表於 Chinese Recorder，謂大秦或拂菻，實指羅馬帝國，及東羅馬帝國，而非專指敘利亞。蓋敘利亞不在任何大海之西也。

白鳥庫吉作有「大秦國及拂菻國考」，譯文載「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一輯」，主爲埃及，而犂軒爲埃及之亞歷山大城，故大秦古稱犂軒。解釋魏略中「有河出其國」，「其國」卽「埃及」。文甚長，但不足以服衆論。

綜上所言，「大秦」有廣義狹義，狹義之大秦，或遠或近，所指不一，當按每一文獻，爲

之考證；廣義之大秦，則爲「西方」卽「海西」之通稱，猶今日所言「西洋」，所指極廣。中西交通史料滙篇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作者發表其個人之意見，頗爲適當，曰：「後漢書之大秦，似指羅馬帝國全部而言，其國都在意大利羅馬京城；魏書之大秦，似乃專指敘利亞，國都爲安都城 (Antiochia)。」

白鳥庫吉「見於大秦傳中的中國思想」文，以爲漢代華人決不以爲世界別有國家，優於中國；後聞西極有一國家，與中國不相上下，於是乃目之爲本國之流裔，稱之爲「大秦」，同時以深信極東有仙境，極西亦有西王母，於是大秦傳謂其國近西王母；更推想此國人亦必長大，且必較常人爲長大，乃名之曰大秦。故此後記述大秦之文物制度，亦極力以本國之文物制度符合之。白鳥文中有詳論，亦不無見地。

第二節 公元第一二世紀羅馬印度間之交通

後漢書之「大秦」，雖指羅馬帝國而言，然中國與羅馬間實鮮直接交通可言。而羅馬與安息之戰爭，更予東西交通以絕大之障礙。惟自羅馬強盛後，中國之絲、印度之寶石與香料，皆羅馬人所好者，故海上之交通，自羅馬帝國初期，卽日趨繁榮，而自奧古斯多 (Augustus) 至尼祿 (Nero) 帝，一段時期，達於最高峯。自公元四七年，引水家依巴羅斯 (Hi. palus) 發見

印度洋上有極規則之定期西南風 (Monsoon)，對於航海之便利更大。此一發見，載於不里尼烏斯書中，不里尼烏斯且述及當時自埃及至印度之航海情形，已知利用此定期風。

當時印度輸出之貨物：一為藥味及香料，其中胡椒尤為重要，產於馬拉巴 (Malabar)；一為真珠及寶石，真珠產於錫蘭，寶石中尤以璧流離為最受重視，產於南印度之哥因巴多 (Coringhore) 及薩倫 (Salem)；三為絲帛、棉布及毛斯綸。絲乃中國自海道運至印度者；棉布及毛斯綸，則為印度東岸之產物。

西方載籍之記西方各國與印度東岸通商者，在公元第一世紀後半期之作品「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書中有「所謂 Thin 之土地」一語，當指中國；又述及其都城 Thinae，蓋指長安。

又一世紀，托勒密地理志出，則其對東方之知識，已及於中印半島；蓋其書中之加底加拉，里希霍芬考為東京灣上，河內或其附近；夏德亦贊成此說；藤田豐八則主為占城之盧容浦口，一因梵文 Kuthi-grha 及古文 Kati-gaha 乃指石舍或石柱，而占人在海口常置石柱為標記，盧容浦口亦必有此物；二因盧容浦口為當時對外港口，即今大長沙海口。水經注卷三六溫水條引康泰扶南記，即有云：「從林邑，至口南盧容浦口……」意謂至日南郡盧容縣之浦口。

東西海上交通之重要樞紐為錫蘭，不里尼烏斯書中稱之曰 Taprobane，「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稱之曰 Palaesimundu，托勒密名之為 Salike。第六世紀之科斯麻斯則稱其印度名曰

Selectiba、藤田豐八以爲乃 Sihalahdipa 之訛，卽華言獅子國也。

第三節 後漢書等對大秦之記述

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記「永寧元年（一二〇），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此節已見上引，據此，大秦又名海西，有幻人，從揮國西南可至其國。

同書卷八八西域傳曰：

「和帝永元九年（九七），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枝，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遂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橙國，從阿橙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此文言班超專派甘英出使大秦，爲安息船夫誑言所阻。並知須盡安息西界，再由其南渡海，始可抵大秦；最後則敝大秦之物產。

同書同卷，對大秦國有更多之描寫，而爲晉書卷九七、魏書卷一〇二之所本，茲錄如後：

「大秦國一名犁鞮，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塗之。有松栢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轔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幟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遊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偏。常使一人持纛，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卽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

三國志卷三〇註所引魏略，文尤長，而以記出產品爲最詳，見下節。

「大秦國一名犁鞮，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

後漢書完成於第五世紀；其次記大秦者爲魏書卷一〇二，作於第六世紀後半期；又其次爲晉書卷九七，作於第七世紀前半葉；茲更錄魏書如下：

「大秦國一名犁鞮，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爲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

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譴責，大則驅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備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南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晉書記曰：

「大秦國一名犁鞮，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椽桷，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

國使到者輒獻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梁書諸夷傳「中天竺傳」曰：

「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漢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二六六），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士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威送論，威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

魏書所記五城，晉書所記五宮，魏略記之尤詳，曰：「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至日懸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或即指羅馬之三十六元老制也。

第四節 中國與羅馬之通使與通商

後漢書西域傳謂：「大秦國……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綰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

讀上引後漢書西域傳語，似漢與大秦從無直接之外交關係可言，但實際又有羅馬帝安敦遣使來華之敘述，不知其何以如此自相矛盾也。

史家或疑安敦所遣之使，實為敘利亞商人所僞託者。但早在公元九十七年，即和帝永元九年，有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安息西界而止之事，見上節引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

茲據中西史籍所記中國與羅馬通使事，不論是否成功或是否正式使節，列表於後：

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二七）羅馬史家弗勞羅斯 Florus 謂奧古斯多於是年即帝位，萬國來朝，中有賽來斯（絲國）使者。

和帝永元九年（九七）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枝，臨大海欲渡，為安息人所阻而罷。

安帝永寧元年（一二〇）暹國王雍由調遣使獻樂及海西國大秦幻人。

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自口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

以上見於中國史籍之後三次，本書均分別論及，不另詳。公元一六二年，羅馬與波斯戰，三年後戰事結束；波斯既征服，即無人從中作梗，故桓帝延熹九年，羅馬使節之到達中國，其可能性為最大。

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關係，不論其爲間接的，直接的，亦不論其是否會有正式使節往還。羅馬之得自我國者，以絲爲大宗；我國之得自羅馬者，則爲珍奇異物。

史記大宛傳謂葱嶺東西各國「其地皆無絲絮。」據一九二八年西克斯(Sir Percy Sykes)所著 *The quest for Cathay* (德譯本三十五頁)，中國絲之出現於羅馬，當爲公元前一世紀之事，**乃由陸路運至底格里斯河之塞琉基亞城(Seleukia)及敘里亞之安底奧基亞城。**

在西克斯前六十年，里希登芬著「中國」(China)一書，第一冊五〇三頁謂：「中國絲雖在公元前一世紀已發現於羅馬，但絲之貿易，則須遲至公元後一世紀。且因西域交通中斷，故由海道經印度而來。乃公元後一百年左右，班超征服葱嶺東西各國，於是陸上交通再興，不里尼烏斯謂中國輸往之貨以絲織爲大宗，即指此時；由羅馬東來者，則爲金、銀、玻璃、珊瑚、象牙等。」

不里尼烏斯曾謂羅馬每年須以三千五百萬至一億之羅馬幣 *Sesterces* 付與中國，此數約合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之美金二百萬至五百萬之數。不里尼烏斯曾嘆曰：「此即吾窮奢極慾之婦女所付出之代價！」但男子亦有有用之者，底倍利烏斯(Tiberius)朝曾下詔限制之，蓋目爲巾幗之氣太重也。不里尼烏斯所擬奢侈品及貴重物品表，絲亦被列在內。脫拉耶奴斯(Trajanus)出，雖禁止一切糜費，而絲之貿易如故。且有敘利亞婦人在羅馬業此致富者。

尼祿虐待巴貝亞 (Pappaea) 至死，但行火葬禮時，絲及絲服，用如泥沙，韋爾斯著世界史綱，亦云：「羅馬王安敦時代，(一六一至一八〇年) 須經遼遠而迂迴之路程，方能運抵羅馬之絲，其價值高於黃金，然羅馬人恣意妄用，財源東流……即絲爲何人所織，亦不過問。」此實爲羅馬帝國後日經濟枯竭原因之一。

史記大宛傳記中國出使外國者之多，曰：「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漢季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一年派往外國之使節，多則十餘批，每批多則數百人，此所謂使者，蓋多屬求利商人，而非真正之政治性使節也。

此等僞稱使節之商人，雖非全數皆以羅馬爲目標者，然以羅馬帝國需要量之大，故去羅馬者必最多。大宛傳又記曰：「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至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

可知當時外國求中國派使，不過爲「利」；中國則官吏不願去，於是牟利之徒，遂自薦而去。然中國之絲並不能由中國商人直接售與羅馬人，須經波斯商人轉手，後漢書西域傳曰：

一其王（大秦）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絮與之交市，故遮闔不得自達。一波斯人之阻斷中國與羅馬之絲絹貿易，以圖從中取利，後漢書之言，極爲顯然。班超遣甘英出使羅馬，終不得達，其原因卽在於此，已見前述。

至於自大秦傳來之商貨，亦有可資探討者。

後漢書西域傳曰：「其地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又「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壁、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縠、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

三國志卷三〇註引魏略，所記種類更繁，除九色次玉石外，計有：

「金、銀、銅、鐵、錫、神龜、白馬、朱鬘、駭雞犀、瑠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眞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黃十種氈氍、五色氈毼、五色九色首下氈氍、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河蘇得布、巴則布、度伐布、溫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

木、二蘇合、狄提、迷迭、兜納、白附子、蕙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以上物產品中，必有附會或誤傳者。如「蘇合」，後漢書明言乃「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芸香可避毒虫，至六朝尙有，宋卽不知爲何物；迷迭亦作迷迭，魏時且有人作賦頌之。其他有今日已不知爲何物者。疑蘇爲 *Sassafras* 音譯，卽地毡。洛陽西三十里古墓中，前會掘獲玻璃耳環，現歸不列顛博物院，據分析，與同時期地中海附近所發現之玻璃，製法相同。蓋傳自西方者。據不里尼烏斯所著「博物志」（見下第十四章第五節）當時亞歷山大城所製各種琉璃，有半透明之紅白色者，有色似螢石青玉或風信子者；又有用黑色玻璃製成之杯盤；羅馬玻璃種類尤多，透明者有藍、綠、黃、紫、棕、紅諸色，不透明者亦有白、黑、紅、藍、黃、綠、橙黃諸色，而以似石英之純白琉璃爲最貴。製玻璃之技術，乃北魏時由大月氏人傳入，並在洛陽設窯製造。

漢時貴人皆喜胡化，靈帝亦然。今漢墓中可見胡俑，面貌服裝，皆爲胡人，則彼時或已有胡人爲奴者。

然對於羅馬出產之奇物，後漢書作者卽曾表示懷疑。西域傳在記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獻物後：曰「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可知後漢書所記者，皆爲傳聞之辭，故曰「疑傳者過焉。」但表貢無異物，乃因使臣係商人僞託，非直接來自羅馬，故獻儀多採自

中印半島者，漢人司空見慣，遂不覺奇，乃有此疑。

第五節 漢代傳入之大秦等國樂舞

古代中外之娛樂，皆以宮廷爲最盛。

◎ 秦漢帝王及巨官，其初皆求成仙；雖其後東西求仙，無一成功，然享樂之心理則不變，而羅馬帝國之各種宮廷娛樂及奢侈品，適於漢代東漸，乃更造成其時宮中窮奢極欲之風氣，謂漢室之亡，其一部分原因，實受羅馬帝國豪華生活之影響，不爲過也。

張騫通西域，傳入條枝與黎軒之善眩人，已見上述。顏師古注漢書張騫傳曰：「眩與幻同，卽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後漢書列傳第四十一陳禪傳曰：「（安帝）永寧元年（一一〇）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于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

幻人之出產地及其與大秦之關係，已見前述。讀此，可知其受宮廷歡迎之一斑。

同書列傳第七十六西南夷傳所記略同，已見前引。

當時宮中之宴樂，不可勝計，而以傳自西方者爲多。劉昭禮儀志註引蔡質漢儀曰：「正月且，天子幸德陽殿，……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化爲比目魚，又化成黃龍，以兩大絲繩繫

兩柱頭，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相逢，切屑不傾；又隴局出身，藏衫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

此僅言從西方來，未言何國。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注引魏略云：「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吐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跳丸又名飛丸、弄丸，亦見於文學作品如西京賦、正都賦及平樂觀賦。後乃稱舞，各有專伎，如弄丸舞、弄丸伎，或釋為弄丸掌中，或解為跳丸空中，或認為以足舞弄，但據漢畫，則為手玩者。丸與劍又常同時飛跳，漢畫中即有一人飛四短劍與兩丸者，旁有鼓樂以為節奏。

漢代娛樂情形之見於畫象石者，有武梁祠畫象石、孝堂山畫象石、臨淄文廟畫象石、濟寧兩城山畫象石、登封縣開母廟闕畫象石、嘉祥隋家莊闕廟畫象石、（曾藏山東金石保存所）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藏漢畫象石、前東京帝國博物館藏漢畫象石、永初戴氏畫象石、（出兩城山，端方舊藏，後為某法人所得，有正書局出版漢畫第一集有拓片）及中央研究院所藏者，共十二塊漢石，得考見之戲凡十種：

（一）側立舞戲（伎）

（二）尊權戲（伎）

（三）弄丸戲

（四）擊抵戲

(五) 馬戲

(六) 翻筋斗戲

(七) 弄劍戲

(八) 倒行

(九) 蹋鞠

(十) 對舞

據藝文類聚六十一引傅玄正都賦，六十三引李尤平樂觀賦、張衡西京賦及晉陸翹郡中記：尋橦卽爬高竿，又曰險竿；或建橦於車，衆馬疾馳，兩伎在橦上行；或在平地上，或在額上，或在口吻上，緣橦而上；或設車馬，立木橦於車上，長二丈，橦頂再按橫木，兩伎兒各坐一頭，或鳥飛，或倒掛。

第六節 羅馬帝國滅亡所受中國之影響

羅馬帝國之興亡，與漢代之時期大致相同。漢興在公元前二〇二年，但漢高帝年號始於公元前二〇六年；漢前三十四年西西里入羅馬版圖；前十六年，羅馬統一北義大利；前八年，羅馬發動第一次馬其頓戰役；底倍利烏斯之爲羅馬保民官，卽在漢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一三三）；馬利烏斯（*Marius*）之爲羅馬執政，在元封四年（公元前一〇七）亦卽樓薄及車師邊境後一年；羅馬帝國之始分東西，在晉武帝太康七年（二八六），卽漢亡後七十七年；羅馬君士坦丁大帝卒於晉成帝咸康三年（三三五），國分爲三。

當雙方全盛時，羅馬帝國勢力已達小亞細亞，且準備更向東發展；漢朝勢力亦已伸展至中亞細亞，而兩大帝國竟未能發生直接關係。

然羅馬帝國之亡，實受中國之影響。

(一) 爲中國之經濟壓力，即絲之傾銷，已見前述。

(二) 爲匈奴對中國之阻，不能東侵，乃不得不向西進，使羅馬帝國爲其所困，終於不支。茲略述其經過。

當漢初興時，亦即匈奴開始強大之時；東滅東胡，西逐月氏，盡取北部之地，蓋即冒頓單于統率匈奴之時也。

其後匈奴更西進至鹽澤，即羅布泊，南以長城與中國爲界，西域三十餘國均屬於匈奴，向西行爲大宛、大月氏、安息、條枝，安息最大，但亦畏匈奴，見大宛列傳。賴班超努力，乃能：

(1) 絕匈奴向南之進展，使大月氏、安息獲得休息，中西商路亦得暢通，並使佛教文化在中亞大放光明。

(2) 使匈奴自身分裂，南匈奴降於漢，北匈奴越金微山即今阿爾泰山而北遁，復向西侵，佔有康居之地。

匈奴西侵路線，大約在中亞以北，經伏爾加河流域，在公元後一二世紀，此亞洲遊牧民族已出現於歐洲東境，即已在裏海之東與烏拉爾山之間。至公元後四百年之間，則更大舉侵入歐洲，至第六世紀止，不斷西侵。

吾前於第六章第三節，曾假定中國史籍中之匈奴，即係侵入歐洲之 *Henni*，但關於此問題，二百年來，學者意見不一。一七五六至一七五八年間（乾隆二十一至二十三年），德經著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Huns. des Turcs, des Mongols*……可譯為「匈奴人、土耳其人、蒙古人全史」，彼蓋認為 *Huni* 即匈奴也。

至十九世紀，格拉勃洛德以為匈奴乃突厥族，*Huni* 屬芬族。

夏德則恢復舊說，從者亦多。

自吾人觀之：匈奴與 *Huni* 即非同族，然 *Huni* 侵擾之方向，所以西進而東不進，其為阻於中國邊境之匈奴，則無疑也。然外族侵入羅馬帝國者多矣，何以謂其為亡於匈奴？

蓋最早侵入羅馬帝國者為日耳曼族，但曾受挫，其時羅馬人之抵抗力尚強。

其次則為西哥德人，公元二五一年時大舉入寇，羅馬帝許其入貢。其時東哥德人已在俄國南部受 *Henni* 人之壓迫，西哥德亦被逼而南侵羅馬帝國。

至公元三七八年，（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哥德人乃聯合 *Henni* 人，合攻羅馬。

羅馬帝國之亡，原因甚多，本節所言二原因，僅爲有關於吾國者；故謂羅馬帝國之亡，完全由於此二原因，則爲以部分概全體；謂絲毫不受此二原因之影響，亦爲抹殺事實之論，不可不知也。

第十四章 公元前後希臘羅馬作家關於

中國之稱述

第一節 拉丁詩人之稱述

自羅馬勃興，凡以前爲希臘文明光被之地，皆置於羅馬統治之下，拉丁文「東方」(Oriens)一名，乃大爲人注意，而成爲一特殊世界，與希臘、羅馬世界相對峙；蓋希臘、羅馬文化擴大及於西歐之後，「東方」文化被視爲歐洲以外之另一文化系統；由於此一概念，「亞細亞」一名之見於羅馬著述中者，其意義蓋卽爲非、歐二洲以東之另一世界。

然羅馬人所有關於東方之現實資料，仍不出希臘人範圍。所得新資料，僅爲龐貝派烏斯(Pompeius)經黑海、裏海間往高加索遠征時所得之些許地理知識，然對於裏海之位置，仍未能有正確之觀念。

(一) 維奇里烏斯 (Publius Virgilius Maro 公元前七〇年至公元後十九年) 所吟詩，有云：「愛底奧比亞 (Aethiopia) 人的叢林中怎麼會發生細軟潔白的羊毛？絲國人 (賽來斯人 Seres) 怎麼會從他們的樹葉中取出細緻的線？」

(二) 是猶利烏斯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六五年至公元後八年) 在五首詩中提及中國，分譯如下：(所有關於絲、絲國、絲國人之拉丁原文，均按原寫法錄出。)

「這些斯篤意啓 (Sertius) 人的書有何用處？他們只喜歡在絲綢的 (Sertius) 褥子上躺下。」
(按斯篤意啓，近人按英譯作斯多嗎，爲公元前四世紀希臘之一派哲學，重實行，提倡克己禁欲。)(「他 (指奧古斯多) 雖然擊退了威脅拉丁地方的巴得人 (Partes 卽波斯人)，以一種應受的失敗懲罰他們；他雖然 (戰勝了) 住在東方的絲國人 (Sertius) 和印度人，但是他是屬於你 (猶比得 Joviter，羅馬最大之神) 的，你照着公道統治世界。」「那個頭髮芬芳的王室孩子是誰呢？他最善於發射他父親弓上的絲國的 (Sertius) 箭矢。」「你爲都市不安，你爲城鎮憂慮恐懼，你惟恐戰利品可以使絲國人 (Sertius)、居魯士在那裡爲王的巴克提拉 (Bactra) 人和答那衣 (Taris) 人失去和睦。」「那些汲飲多瑙河深水的人，他們從不違背猶利烏斯 (Julius) 的法律，(按指愷撒的命令) 傑得人 (Getae) 也從不，絲國人 (Sertius) 也不，不忠的波斯人也不，生在答那衣河畔的人民也不違反猶利烏斯的法律。」

(三) 拍洛貝爾啓烏斯 (Sextus Aurelius Propertius 公元前五〇至一五年) 在兩首詩中提及絲·「絲 (Sertius) 和各種彩色的絲織品，它們能減輕 (不幸的情人們) 痛苦嗎？」「對於你的徑子的絲綢馬車，我只有不出一聲。」

(四) 奧維地烏斯 (Publius Ovidius Naso 公元前四三年至公元後十七年或十八年) 有詩曰：「什麼吓！(你的頭髮) 是那樣的纖細，你不是怕加以梳理嗎？絲國人 (Seres) 所戴的有色的頭巾也就像那樣的細。」

(五) 西利烏斯 (Silius Italicus 公元後二五年至一〇一年) 有三詩提及絲國人曰：「太陽已經在達爾得斯 (Tartessus) 海上解放了戰馬，把牠們引到東方的海邊，以便在夜色沉沉中穿過去；絲國人 (Seres) 炫耀出他們的光輝，在他們的樹林的分枝上採取絨毛。」(巴古斯 Bacchus 酒神名) 在統治絲國人 (Seras) 和印度人之後，他從東方召回了凱旋的軍隊，勝利車牽引着高加索的虎，在各城遊行。「怪人吓，住在東方的絲國人 (Seres)，看到了(意大利) 火山的灰燼，把他們產生絨毛的樹林也發白了。」

按拉丁詩人在吟咏中提及絲、絲國與絲國人者，尙有若干家，如：公元後三九年至六五年之路加奴斯 (Lucanus)、四〇年至九六年之斯達啓烏斯 (Statius) 等，茲從略。

第二節 希臘地理學家斯脫拉波之稱述

斯脫拉波約生於公元前五八年，公元後二一年卒；亦有作公元前六三年或五四年生，公元後二四年或二五年卒者。爲羅馬籍之希臘種人，著有地理書 (Geographica)，其書成於公元後

第一世紀初期，亦引用克對希亞斯之記載。自謂其書材料取自亞歷山大部將奧內西克利都斯 (Onesicritus)，其人卒於公元前三二八年（周顯王四一年，秦惠文王十一年）。斯脫拉波書縱或偽託，然成書之期甚早，故價值甚高。茲據一八五三年巴黎版穆勒氏希臘法文合刊本，譯如下：

「拔克脫利亞諸王擴張他們的統治權直到絲國人和弗里諾衣人 (Phrynoi) 地方。」

「爲同樣的理由（指地方氣候炎熱）他在若干種樹上擠取奶汁。內亞爾加 (Nearch) 說：有人就用這些奶汁織成美麗的細布，馬其頓人以其用於褥墊和鞍椅；這些（細布）很像絲 (serics)，那是人們用剝去了皮的胡麻 (Byssus) 織成的。」

「然而有人以爲絲國人年壽更高（比活一百三十歲的摩西加尼人 Musicians 更高）。」

「有人以爲絲國人壽命頗高，在二百歲以上。」

斯脫拉波又有 *Christomathia* 一書，亦提及絲國人，茲據一八六八年穆勒氏刊本，節譯如下：

「印度地勢作斜方形，北方是高加索山，它從亞細亞一直延到它的最東方的極端；這座山的北面是薩該人 (Sagari)、西徐亞人和絲國人，南面是印度人。」

第三節 羅馬哲學家塞納加之稱述

塞納加 (Lucius Annaeus Seneca) 公元前四年生，公元後六五年卒。羅馬之政治家兼哲學家也。曾爲尼祿之師；尼祿卽帝位，拜爲相，後坐叛逆罪賜死。在其書札與悲劇中，有述及絲國人者，譯如下：

「今天你們認爲誰是最聰明的呢？是知道用隱藏的管子，把鬱金香的香氣，升到最高處的人嗎？……還是那知道告訴別人，也告訴自己，自然所加於我們的，決不是殘酷的，艱困的，我們可以無需大理石和冶工而安居，我們也可以沒有絲國人的 (Sericorni) 貿易而蔽體。」

按賽特著「希臘拉丁作家關於遠東之記述」，對上文末句註曰：「絲國人的一語亦可以指絲麻言」。按拉丁原文第一字母爲大寫，且用陽性，應係指絲國人。

「如女們，脫去這些金繡的絳色衣服吧！底爾人所織的紅衣，遙遠的絲國人從他們樹上所採的絲絲，遠遠的離開我吧！」

「皇帝們雖然聯合起來，攻擊分散的大哈人 (Dacae)，也是徒勞無功的，因爲他們或居於紅海邊，或居於某些水邊，水裡的寶石，發出血紅的反光，或就在裏海口，守住強悍的撒爾馬大人 (Sarmatae)；就是被那些敢在多瑙河濶行的人攻擊，或被散居各地，以他們生產的毛而

著名的絲國人 (Seres) 所攻擊，也是徒然的。」

按歐洲人初不知絲為何物，亦無定名，故常以羊毛或其他毛類稱之。

「那在天涯地角的絲國人 (Seres) 也高歌他的 (指海爾古來斯 Hercules，猶比得神的兒子) 勝利。」

「她不用松奧尼亞 (Macedonia) 地方的針，在那些住於東方的絲國人 (Seri) 從東方樹上採集的織物上來刺繡。」

「假使可稱為衣服的話，我曾見過絲國的 (Sericus) 衣，不能蔽體，甚至不能遮蔽私處；穿上這種衣服，婦女可以宣稱自己並未裸體，只是稍稍明亮些。爲了這個重大的理由，無知的外國人，已被禁止來貿易。我們的婦女們已受到警告，除了在自己墮房內，不許在公共場所顯露，以免譴淫之嫌。」

第四節 羅馬地理學家梅拉之稱述

那波尼烏斯·梅拉 (Pomponius Mela)，公元第一世紀人，著有「論地球位置」(De Situ Orbis) 亦在絲國名，曰……

一、在亞細亞的最東部，有印度人、絲國人和西徐亞人爲第一位。絲國人差不多佔有東方的

中部，印度人和西徐亞人則在邊境。」

「有空曠地區，野獸繁殖，直到大比斯(Tarbis)山，山崎立海濱。達烏魯斯(Taurus)高山，離此頗遠。絲國人居在兩山之間。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們把貨物放在曠野中，購貨的人，在賣主不在時來取貨，這種經商方式是很著名的。」

第五節 不里尼烏斯博物志之稱述

不里尼烏斯(C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後二三年生，七九年卒。著有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公元後七七年成書)關於中國之記載，據一八七五至一九〇六年萊勃茲版，馬育弗(Mayhoff)刊本，譯如下：

「從加斯比海(Mare Caspium 卽裏海)和西徐古(Oceanum Scythicum)大洋，沿海岸，折向東方。西徐古東部的近處，爲了積雪，無人居住；隣境有野人，地亦荒蕪。這些西徐古野人，以人肉爲食。四周都是荒野，野獸極多，牠們常傷害人，不在那些野人之下。過此以往，又是西徐古人，又是佈滿野獸的荒野，直到一座名叫達比斯(Tarbis)而靠向海邊的山爲止。海岸線向着東北，那是有人住的地方，但到此，海岸線還不及一半。」

「那裡首先遇到的便是絲國人，他們是以樹林中所產的毛(按卽絲)出名的。他們在樹葉上灑

上水，然後由婦女們以加倍的工作來整理，並織成線；靠着在那麼遠的地方，那麼繁重的手工，我們的貴婦人纔能在公工場所，光耀奪目。絲國人固溫良可親，但不願與人爲伍，一如鳥獸，他們也只等待別人來和他們交易。」

「絲國人居在海莫度斯 (Hemodus) 山外，(達勃洛巴納 [Taprobane 島] 人曾見過，且以經商出名；拉基亞斯 (Rachias) 的父親到過那裡；旅客亦遇見見過絲國人，他們比普通人大，紅髮碧眼，聲音洪亮，不和外人交談。其它和我們商人所傳說的相同；貨物都放在河邊，靠近絲國人，假如他們要買，他們就放下貨款，拿走貨物。」

「據依西各奴斯 (Isigonus) 說：起爾尼人 (Cyri) 活一百四十歲。愛底奧比亞人、麻克洛比人 (Macrobi) 和絲國人也同。」

「更足驚奇的，是人們竟爲採取大理石而開鑿大山，爲求衣料而遠至絲國，爲求珍珠而投身紅海深淵，爲求寶玉而掘地千丈。」

「我們已在講絲國人時，提到絲國的絲。」

「在(底洛斯 Tylos) 島的最高處，有一種和絲國所產不同的做絲的樹。」

「那地方(指阿拉伯海)供給吾們珍珠。據最低估計，吾們帝國每年總有一億羅馬幣 (Sextertius) 流入印度、絲國和半島(指阿拉伯)。」

「第五種野葡萄名爲有毛的 (Ispello)，牠外被纖毛，我們不必驚奇絲國人和印度人能從樹上採取羊毛類的東西。」

「在織的各種種類中，只有絲國的織有棕櫚樹枝。絲國人把它和他們的衣服及皮貨，運銷國外。」

第六節 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之稱述

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出無名氏手，約撰於第一世紀末。作者爲僑寓埃及之希臘人，約在公元八〇至八九年（後漢章帝建初五年至和帝永元元年）之間，航行於紅海、波斯灣、及印度之東西岸。關於中國之記述譯如下：

「過了這地方，（按指克利斯 Chryse）已到了最北部，海止於「秦國」。按賽特氏註謂：原抄本此處有脫文，又謂決非指絲國，但其法文譯本仍譯爲「絲國」，玉爾本則譯爲「秦」(Sina)。在這國家的內地，（玉爾本將「已到了最北部」句置於此）有一極大城名秦尼 (Thinae 或 Thinar)，那地方出絲、絲線和名爲 Sarrikon 的布，（按指綢緞）由陸路（原文作步行，當指駱駝而言）經拔克脫利亞，而至巴利加薩 (Barygaza)，又經恒河而到里姆利亞 (Tinnaria)。進入那地方（秦國）是不容易的，因爲從那裡回來的很少，也是很難得的。那國家正處於小熊

星之下，並且據人說，那國境就在黑海和裏海的對岸（按指東方），其旁有梅奧底斯（*Meotides*）湖，可通大洋。」

「每年有矮人到秦國邊境，這些人面部寬大，而極聰明。（滙篇譯為「與禽獸相似，然不害人」，誤。）據說他們稱為倍撒帶人（*Beserai*），類似野人。他們率領妻兒同來，携有大包貨物，又有大筐，那顏色和還在發青的葡萄樹葉相同；他們到了本國和秦國之間的地區，便停留一個時間，慶祝若干日，這時，他們即用他們的大筐以代床用；（滙篇譯為「取蓋中物，散之地面」，誤。）然後回到他們本國更裡面的地方。當地的人民窺見（這個機會），就來那地方，收取他們的臥具，並在奪取名為貝脫洛衣（*Pethoi*）的蘆葦後，摺一葉為二，作成球形，以成葦的纖維穿起來。造成三種（馬拉巴脫隆 *Malabathron*）：大葉製成地球，中等葉製成中等球，小葉製成小球。這三類馬拉巴脫隆，常由製造者，從那裡販到印度。」

「比那裡更遠的地方，或因氣候太冷，或為冰雪所阻，無法通行，或由於神力不可抗，沒有人去探查。」

第七節 托勒密地理書之稱述

「托勒密（*Klaudios Ptolemaios*），希臘人，有地理書，約撰於公元一五〇年（後漢恒帝和

平元年），關於中國之記載極多，節譯如下：

「世上無人類居住（滙篇誤譯爲「人類可居」）的地方，東至無名地（Terra Incognita）和大亞細亞的極東國家，支那與絲國爲隣。」

「已經人知道的世界，極東止於支那的都城。離亞歷山大港，經度一百十九度半，相差約八小時。」

托勒密又引馬利奴斯（Marinus）之語而加以評論曰：

「關於幼發拉底河渡口和石塔之間的距離，照他（按指馬利奴斯）是八百七十六雪尼（schoeni）或二萬六千二百八十斯大特（stadia），而在石塔和絲國（Seres）的首都賽拉（Sera）（絲城）之間，根據步行需時七個月來推算，應有三萬六千二百斯大特。照我們修正的方式，兩處的距離，我們都要加以削減。」

「他（按指馬利奴斯）確實說有名梅斯（Mes）者，又名底啓亞諾斯（Tiranos），原籍馬其頓，是商人，一如其父，他曾記下這路程，他雖沒有到過絲國人地方，但他曾派了幾個手

塔而到拔克脫利亞那 (Bactriana)，不止一道，別有一路，可經巴林波脫拉 (Palimbothra) 而到印度；(他們又說) 從支那的都城到加底加拉 (Kattigara) 港口的路，是向西南走的。」

「絲國 (賽來斯國) 西界西徐亞，在伊毛屋斯 (Imaos) 嶺外，照指定的線而更高；北止於無名地，與都耳 (Thouie) 島在同一緯度。東亦與無名地爲界。界在東經一百八十度六十三分，至一百八十度三十五分。南界印度恒河東岸。邊境是沿東經一百七十三度三十五分。再進即與支那爲隣，而止於已指出的無名地。」

「絲國四周有阿尼巴 (Aniba) 山圍繞，山自一百五十三度六十分起，迄一百七十一度五十六分止；山的東部有奧薩基亞 (Auzakia) 山，其極端位於一百六十五度五十四分；阿斯米拉亞 (Asmiraia) 山，其西端僅於一百六十七度四十七分三十秒，至一百七十四度四十七分三十秒；這些山的東部有加西亞 (Casia) 山，其極端位於一百六十二度四十四分，大古隆 (Thagorion) 山，其中央處位於一百七十度四十三分，東有愛莫大 (Henoda) 山和賽里古斯 (Sericus) 山，其極端位於一百六十五度三十六分；奧篤洛各拉斯 (Othorokorhas) 山，其兩端位於一百六十九度三十六分和一百七十六度三十九分之間。境內有二河，絲國的大部都受灌溉；第一條名奧依加爾大斯 (Oikharidas)，有三源：一源在亞斯米拉青衣 (Asmiraioi) 山附近，另一源則在一百七十四度四十七分三十秒，近加西亞山，一河由位於一百六十度四十九分三十秒，在詞

一山中，別有八第三）源，位於一百六十一度四十四分十五秒；第二條河名樸底索（*Daurios*）山，一源在加西亞山附近，位於一百六十度四十三秒；另一源在奧鷲洛各拉斯山附近，位於一百七十六度三十九分；在愛莫大 *Emoda* 山河附近，有一河曲，位於一百六十八度三十九分。

一在絲國，最北的種族是：食人野人；在他們以下，有亞尼博衣（*Anidol*）人，居於同名字的山上；在他們和奧薩基奧衣（*Arsakioi*）人之間，有希其傑茲（*Sisykos*）人；再在他們之下，則有達姆納衣（*Damunai*）人和比阿拉衣（*Pitari*）人，直至奧依加爾大期河；河以下就是同名的奧依加爾大衣人。」

「支那人（*Sini*）的邊境，北與絲國一部分爲界，前已述及；東與南爲無名地；西邊是印度恒河邊境，依照已經確定的線面直到大海灣，大海灣名帶利奧特斯（*Theriodes*）灣，在支那的海灣，有吃魚的愛底奧比亞人居住。」

第八節 弗勞羅斯諸人之稱述

弗勞羅斯（*Florus* 公元一世紀末）記曰：

「西徐亞人和撒爾馬特人，都造使修好。絲國人和處在同一日光下的印度人，奉着寶石、

珍珠，而在各色禮物中，還有象；最足以表示他們誠心的，是他們在途中竟走了四年；而這些人的膚色，也就證明他們是從另一世界來的。」

此外有員里愛傑對斯 (Dionysius Periegetes)，二世紀人，有詩說：「絲國 (Seres) 的野蠻人民，不吃牛羊，但廣大的地區，點綴着五顏六色的花卉；以各種技能，製成寶貴的衣服，模仿草的顏色，以表現其光彩，蜘蛛的工程亦不能與人比較。」

第四世紀有亞維安奴斯 (Rufus Festus Avienus) 說：「絲國人 (Seres) 靠着有森林而取得樹上的羊毛。」

四世紀初有普里亞奴斯 (Priscianus)，亦有詩說：「絲國人 (Seres) 不知牧羊放羊，所穿衣服，就是那洪安放臥具的田野裡的花卉所織成的。」

約公元後一七四年，包撒尼亞斯 (Pausanias) 著希臘遊記，始明言生絲之產生，全賴昆蟲之飼育，而稱絲國人為亞比西尼亞種。

約公元後三八〇年，馬切里奴斯 (Ammianus Marcellinus) 著史書一種，曾以若干節描寫絲國人及其地域。但僅取托勒密書為之闡說，並加以若干寓言式之細節，論述其織絲之方法及交易；而在地圖描寫中，則已提及長城。

第十五章 魏晉南北朝之中西交通

第一節 三國志晉書宋書之記載

魏晉南北朝時，西域交通大衰。魏時，「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但西域「已不能盡至」。晉時，武帝泰始中及太康中，僅康居、焉耆、龜茲、大宛、大秦來貢。北朝曾將西域交通完全隔斷，故宋、齊、梁、陳皆以海道與西方交往；唯北齊與西域，則「信使往來，得驕蹙勿絕之道。」「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茲節錄正史記述如後。

三國志卷三十，對印度之記載，有浮屠誕生、漢哀帝元壽元年景盧受浮屠經等；又記有車離國及盤越國，似即漢書西域傳之東離國及盤起國。記盤起國曰：

「盤起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

晉書卷一一三苻堅傳上，記晉孝武太元六年（三八一）天竺國獻火浣布於苻堅。梁書及南史則皆記晉安帝義熙初（四〇五）師子國來獻玉像，師子國即錫蘭島，印度商人僧伽刺 *Singhala*

冒險經商於島上，並建國爲王，師子國爲僧伽刺之譯義。可證其時中印間已有海上交通，中國高僧法顯卽自錫蘭乘商船而返國者。

至宋元嘉五年（四二八），師子國王刹利摩訶奉表曰：「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浮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己。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遺，願垂音告。」

刹利摩訶南，梵音讀若 *Raja Mahansana*，晉義熙六年（四一〇）卽位，宋元嘉九年（四三二）卒。

同年，天竺迦毗黎國卽佛國記之迦維羅衛城；西域記之劫比羅伐窣堵國，（*Kapilavastu*），國王月愛亦遣使奉表；十二年（四三五）師子國王又遣使奉獻。皆見宋書卷九七。

迦毗黎王表文有云：

「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敕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反；所自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

月愛王卽笈多王朝旃陀羅（月）笈多（愛）二世 Chasparagupta。

元嘉五年師子國王表文謂「音信時通」，又謂「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可證當時中印間政治使節往還之頻繁，而失記者必多。迦毗黎國王亦希望「二國信使往來不絕」，如其時中印間交通不暢，亦不能有此願望。

據宋書續夷傳，阿羅單國於元嘉七年（四三〇）遣使獻金剛指環及赤鸚鵡，十年又奉表；二十六年（四四九）太祖詔曰：「詞羅丹、罽皇、罽達三國，頻越遐海，教化總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並遣使策命曰：「惟汝慕義教化，效誠荒遐，思之所洽，殊遠必甄；用敷典章，顯茲策授，爾其欽奉凝命，永固厥職，可不慎歟！」二十九年（四五二）又遣長史罽河沙彌獻方物。元嘉十二年（四三五）閩婆婆達國王師曩婆達隨阿羅跋摩遣使奉表，有一雖隔巨海，常遙臣屬」之語，則其歸附我國，當在劉宋之前。按阿羅單及閩婆婆達皆在今爪哇。

第二節 梁書南史魏書之記載

梁書海南諸國傳總叙曰：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百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

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夥，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爲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

當時與南海諸國往還情形，可略見焉。

梁書王僧孺傳曰：「天監初。（天監起於公元五〇二年）……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嘆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則當時外人之來中國者，年必數次。

梁書諸夷傳記宋孝武之世，干陀利國王釋婆羅郡隣陀遣長使竺留弛獻金銀寶器。天監元年（五〇二），其王嚩曇修跋陀羅遣使並畫工，奉獻玉盤等物，模寫高祖形。十七年，子毗耶跋摩遣長史毗呂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元年（五二〇）復遣使獻方物。其地在今蘇門答臘。

北史石婆利傳，謂自交阯、海南，過赤土、丹丹而至其國，似卽婆羅洲。天監十六年（五一七）來獻金席；普通三年（五二二）又獻方物數十種。

丹丹國，見同上，似卽今馬來吉蘭丹地，大通二年（五三〇）遣使奉表，奉牙儻及塔各二軀，並獻火齊珠、吉貝、麝香藥等。大同元年（五三五）又遣使獻金銀、瑠璃、寶香藥等物。

南海又有頓遜國，見萬震「南州異物志」及康泰「吳時外國傳」，（均見太平御覽及藝文類聚所引）梁書諸夷傳稱其與扶南、交州、天竺、安息「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寶貨物，無所不有。」按新加坡古名 Temasek，與頓遜音頗近。

梁書卷五十四記印度事，可分析如下：

- （一）中天竺國之名稱、方位、張騫之傳聞、與月支之關係；（明言身毒即天竺）
- （二）大江、出產，與大秦、安息、罽賓之貿易；
- （三）漢及三國時與大秦之關係；
- （四）漢和帝以後之中印關係。

茲錄最後一段於後：

「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頗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旌遣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即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旌。遺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龐，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

于渠壘，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裡，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也。」

其下錄宋元嘉五年迦毗黎王月愛之表文，惟改稱屈多王，卽笈多（愛）之異譯；使臣名竺羅達；表文亦略有改易。文末所列貢獻方物則完全不同，計爲「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

梁書同卷又記師子國卽錫蘭情形，蓋採自佛國記者。所記中國與錫蘭之關係，則有三事：（一）「晉義熙初，始遣（南史卷七八，遣下有使字）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二）「宋元嘉六年、十二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貢獻。」按宋書作五年，此處王名最下亦脫「南」字。

（三）「後王伽葉伽羅訶利邪使奉表。」表文與元嘉五年者同，僅竄改數字，如首句「謹白大宋明主」，「宋」改「梁」。「四海之外，無往不伏」，「外」改「表」，「往」改「有」，

「伏」改「從」。此外可以類推。末曰：「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救；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周書卷十九楊忠傳曰：「于謹伐江陵，忠爲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東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按史記大宛列傳記張騫報告，謂印度人「乘象以戰」，據周書，則梁人已做印度人，以象出戰矣。

南史卷七八所記，與梁書全同，惟誤「中天竺」與「迦毗黎」爲二國，於是國王「屈多」與「月愛」亦被誤認爲二王。除記元嘉五年派使來華貢物外，又記：

「明帝泰始二年（四六六）又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四五五），斤陀利國王釋婆羅那憐南遣長史竺留陁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

此段亦見宋書，蘇摩黎卽蘇門答臘北之薩馬浪加（Samarlangka），「婆利」宋書作「婆黎」，亦在岡地，今名巴拉克（Parak）。斤陀利，不詳。

魏書卷一〇二記屬賓國曰：

「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

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爲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北史卷九七同。

魏書同卷並記南天竺國曰：「國王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又記烏菴國及乾陀國曰：

「烏菴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訟，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烏菴，梵語 Udjāna，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作烏長，曰「彼自云鬱地引那」，文獻通考作越底延；洛陽伽藍記作烏場，大唐西域記作烏仗那，新唐書西域傳作烏茶，開元釋教錄卷六作鄔茶。意謂園圃，蓋御苑也；地點不一，不出今斯瓦脫河 (Swat) 沿岸。

「乾陀國在烏菴西，本名業波；爲嚧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勅勒，臨國民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鬪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鬪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卽所謂雀離佛園也。」

乾陀國自漢武帝時已通中國，同名異譯甚多，詳前。「業波」洛陽伽藍記作「業波羅」，梵

語 Gopala。魏書西域傳稱之曰「小月氏國」。蓋公元四世紀末，大月氏衰，小月氏亦適受壓噠(Ephthal)之壓迫，南下入北印度，都於富樓沙城，此爲魏書西域傳譯名，梵語Purusa-pura，佛國記作弗樓沙，大唐西域記作布路沙布邏，其地卽乾陀羅之政治中心；至第五世紀，曷唎更南下，破其地；至超月王(Vikramaditya)始收復其地。乾陀羅開國甚古，阿輸迦王卽曾遣末闍提(Madhvantika)前往開教，自是佛教卽大行。迦賦色迦王時代，建都其地，爲東西文化交流之樞紐。

第三節 魏書所記中亞西亞各國遣使來華年表

高祖孝文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九月，庚子，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諸國，各遣使朝貢。

世宗宣武皇帝景明三年(五〇二)，疏勒、罽賓、婆羅捺、烏菴、阿輸陀羅婆不耨陀拔羅弗婆提斯羅噠舍伏耆奚那太羅槃烏菴、悉萬斤、朱居槃、訶盤陀、撥斤、厭味、朱沱洛、南天竺、持沙那斯頭諸國，並遣使朝貢。

景明四年(五〇三)，四月，庚寅，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

正始四年(五〇七)，九月，甲子，疏勒、車勒、阿駒、南天竺、婆羅等諸國，遣使朝

獻。冬，十月，丁巳，半社、悉萬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闐等諸國、並遣使朝獻。

永平元年（五〇八），二月，辛未，南天竺國遣使朝獻。秋，七月，辛卯，罽賓國遣使朝獻。

永平二年（五〇九）春，正月，丁亥，胡密、步就磨、忸密、槃足、悉萬斤、辛豆、那越、拔忸諸國，並遣使朝獻。十二月，疊伏羅、弗菩提、乾陀、陀波羅諸國，並遣使朝獻。

永平三年（五一〇），九月，壬寅，烏菴、伽秀沙尼諸國，並遣使朝獻。

永平四年（五一一），三月，癸卯，婆比、幡彌、烏菴、比地、乾達諸國並遣使朝獻。六月，乙亥，乾達、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不流沙諸國，並遣使朝獻。八月，辛未，阿婆羅、達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等諸國，並遣使朝獻。九月，驟囉，朱居槃、波羅、莫伽陀、移婆僕羅、俱薩羅、舍彌、羅樂陀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冬，十月，丁丑，婆比、幡彌、烏菴、比地、乾達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十有一月，戊申，難地、伏羅國並遣使朝獻。

延昌三年（五一四），十有一月，庚戌，南天竺、佐越、費賓諸國，並遣使朝獻。

肅宗，孝明皇帝熙平二年（五一七），春，正月，癸丑，地伏羅、罽賓國並遣使朝獻。秋，七月，乙丑，地伏羅、罽賓國，並遣使朝獻。

神龜元年（五一八），閏七月，丁未，波斯、疏勒、烏菴、龜茲諸國並遣使朝獻。

正光二年（五二二），五月，乙酉，烏蕯國遣使朝貢。

以上正始四年，九月、十月疏勒兩次朝獻；永平四年，乾達三次；烏蕯、伽使密、不流沙、婆比、比地等兩次；肅宗熙平二年，兩國在同一年春秋兩次來朝，皆為事實上所不可能，故疑為商人偽託。然其時，中國與中亞、西亞各國交往之密，實可由此見之。

第四節 魏晉南北朝與南海諸國之貿易

欲知魏晉南北朝時中國與南海各國之商務關係，先不可不知其時中國所確知之南海國家。

當時正史中之記南海國家者，有宋書夷蠻傳、南齊書蠻夷傳、梁書諸夷傳，然各書頗有參差，李延壽作南史夷貊傳，乃總其成，而列為十五國，計為：

- 一、林邑國 即今占婆（Campa），今安南中圻。
- 二、扶南國 即今柬埔寨。
- 三、阿羅陀國
- 四、阿羅單國 在蘇門答臘島。
- 五、婆皇國 即今 *Pahan*，在馬來半島。

六、婆達國

七、閩婆達國 宋書作「閩婆婆達」，或誤閩婆與婆達爲二。

八、槃盤國 似亦在馬來半島。

九、丹丹國 在今東京與 *Bali* 間。

十、干陟利國 在蘇門答臘島。

十一、狼牙修國 今之 *Lankasuka*，在馬來半島。

十二、婆利國 今爪哇東之 *Bali* 島。

十三、中天竺國 在今印度。

十四、天竺迦毗黎國 在今印度。

十五、師子國 卽今錫蘭島。

至於當時海上之交通工具，則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曰：「爲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此語似出康泰吳時外國傳，見太平御覽卷七七一引：「扶南國伐木爲船，長者十二尋，廣六尺，頭尾似魚；皆以鐵鑄露裝，大者載百人。」同書另有一則曰：「從加那調州乘大船船，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大秦國也。有七帆，其船已不小。加那調州，水經注作「迦那調洲」。伯希和以爲「調」卽梵文 *Diva* 對音，漢語常譯作「洲」，此處「調」字下再

加「洲」字，是一贅文。但正法念處經作「迦那洲」。見「關於越南半島的幾條中國史文」，馮承鈞譯，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太平御覽卷六七九又引有萬震撰南州異物志（三世紀時書）曰：「外域人名船曰船，（船之誤），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開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

同書卷七七一又引南州異物志曰：「外徼人隨舟大小式作四帆，前後各載之，有盧頭木，葉如牖形，長丈餘，織以爲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後者激而相射，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宜增減之。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

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〇）玄應著「一切經音義」曰：「海中大船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似亦出南州異物志。

其時中西文化之交流，音樂則繼漢之後，發展西域之流風，而促成日後隋唐時代之全盛狀態；美術如以南京爲中心，在江南諸地之齊梁陵墓上之有翼石獅，其波斯色彩，極爲顯然。自漢以來，中國卽有西方傳入之玻璃器，然至第四世紀止，尙不能自製，讀西晉潘尼琉璃碗賦，知其仍從西域傳來；及第五世紀，則至北魏之大月氏工匠，始授優良玻璃器製造法，並傳至江南南京一帶。

至中國與南海諸國商務之繁盛，則可於後列二文獻中見之：

一、宋書夷蠻傳，史臣曰：

「若夫大秦、天竺，廻出西溟；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民衆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所虛心。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

二、南齊書蠻夷傳，史臣曰：

「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瓊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輒積王府。」

讀此，則知其時貿易之盛，已凌駕漢代之上矣。而與之俱來者，且有外國植物等。南方草木狀（漢魏叢書）記晉惠帝永康元年（三〇〇）時：「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記曰：『南越行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耶悉茗，西陽雜俎卷八作野悉蜜，卽 Jasmine。

其時，海上交通雖發達，然北周時，卽公元第六世紀時代，河西地方且流通西方之金銀貨幣，似亦有貿易存在。隋書卷二十四，錢貨條曰：「後周之初，尙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五六一）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

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

晉書稱：「大宛善市買，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爲幣。」又稱「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交州日南太守貪利侵侮，十折二三。又刺史姜肱時使韓貳領日南太守，估價太半，又發船調礮，云欲征伐，諸國悉憤，國外貿易，因而中斷。」

第五節 北朝時外僑之雜居與歸化

洛陽伽藍記卷四卷五，記元魏時洛陽外國僧人及外僑情形甚詳。各國沙門，多至三千餘人；專容外僧之大寺，大至千餘間；有遠自大秦國來者，則或非佛教僧侶。若輩之服飾與交通工具，皆已華化。原文曰：

「永明寺，宣武皇帝（四九九——五一五）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洛土；宣武故立此寺，俾以憩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庭列修竹，簷拂高槐，奇花異草，駢闐塔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績紡百姓，野店邑房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

當時在伊洛間之御道，特設異國館里；館以處外人暫時來吾國居留者；歸化之外人，則賜宅，宅分區口里，亦有自己築室而居者。原文曰：

「永橋以南，圓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以後，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以後，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之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矣。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閻埽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五〇九）乾羅國胡王所獻。……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洛陽之外僑住宅區，多至萬餘戶，戶以五人計，則共有五萬餘人。所謂「葱嶺已西，至於大秦」，則此輩外僑應多為中亞及西亞之人，間或有歐洲人，則恐不多。乾羅當即乾陀羅，或譯健陀羅，即今阿富汗地。

第六節 朱應康泰之出使南海

吳帝孫權曾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扶南。見本章第二節所引梁書卷五四海南諸國傳總叙。歸國後，朱應著有「扶南異物志」，今已全佚，但著錄於「隋書經籍志」及「唐書藝

女志」、康泰亦有關於外國（扶南）之著作，而書名不一，計有：

「吳時外國傳」 太平御覽、冊府元龜。

「吳時外國志」 太平御覽、藝文類聚。

「扶南土俗」 太平御覽。

「扶南記」 藝文類聚。

「扶南傳」 通典、水經注。

「康泰扶南記」 水經注。

以上各書中，均有康泰原著之引文，伯希和與國人某均曾從事輯佚，惜未見刊布。盧鶴松女士撰有「康泰吳時外國傳輯本」，僅有稿本，存北京大學圖書館；駒井義明有「所謂孫權之南方遣使」一文，見「歷史與地理」第二十五卷第六號，亦略作鈎稽，訛漏殊多；近門生吳斌以着手研究此題見告，頗願早覩厥成。北平圖書館刊第四卷第六號有「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一文，論康泰書，頗有見地。略曰：「全書體製若何，不甚可知。今就散見羣書之吳時外國傳與扶南記觀之，所述大致相同；外國傳記扶南事頗夥，而扶南記所誌亦不盡爲扶南。如水經注卷一引扶南記，從迦南調洲西南到枝扈黎大江口，渡江而西極爲大秦之一段文字，與御覽卷七七一所引吳時外國傳文略同，稍有繁簡之殊而已。如屬兩書，似不應如此雷

同。故楊守敬氏以爲「吳時外國傳其總書名，扶南傳又其書之一種。」（水經注疏要刪卷一）余疑不惟所謂扶南傳者爲吳時外國傳中之一部份，卽扶南記、扶南土俗與外國傳亦實爲一書。扶南記等名如非原書之子題，則係傳抄者以意分之，後時沿襲，遂成二書耳。」

二人著作略如上述。其出使經過，首見梁書海南諸國傳，見前。三國志不僅未記其事，且未著二人名，然遺「從事」南宣國化之事，則見於吳志卷十五呂岱傳，曰：「岱旣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置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按黃武五年（二二六）交州平，黃龍三年（二三一）孫權召岱還，則遣從事南宣國化，當卽在此六年間。

又按吳志卷二記赤烏六年（二四三）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則二人出使最遲亦必在此年之前。且必在扶南王范旃在位時，蓋梁書卷五四中天竺國傳曰：「吳時扶南王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卽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丹支馬四匹報旃，遺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又按范旃死後，大將范尋爲王，南齊書卷五八扶南傳稱其事在「吳晉時」；而梁書卷五四扶南傳云：「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

尋國。一似二人出使扶南，係范尋在位時，或爲第二次出使；若范旃在位時，卽已出使，直至范尋時而仍奉使在外，則爲時將有一二十年之久，或不可能。朱應、康泰立傳記南海、西域、天竺、外國事，並詳姚振宗補三國藝文志。據南史天竺傳，康泰在扶南問天竺土俗，則康或未至印度。

第十六章 漢末迄南北朝與西方各國之佛教關係

第一節 漢末三國時西域譯經師之東來

中國佛經之翻譯，信而有徵者，實始於漢末桓、靈二帝時代。其時著名之譯經師有安世高、支謙、竺佛朔、支謙、康僧會等。

安世高 (Parthasaris)，以字行，名清，爲安息國王滿屈 (Pakor) 二世之太子。後漢和帝永元九年 (九七) 王薨，弟嗣位，世高退爲亞美尼亞王。羅馬滅亞美尼亞，欲以世高爲安息王，國人不願，乃出家修道，深究經藏。道安安般若守意經序曰：「昔漢世之末，有安世高者，博聞稽古，特專阿毘曇學，其所出經，禪數最悉。」蓋世高所傳爲小乘之學，且以關於實際上之禪觀修行者爲多，鮮涉理論。世高以漢桓帝初至洛陽，不久即通華言，並着手譯經，自桓帝建和二年 (一四八) 至靈帝建寧四年 (一七二)，歷二十三年而不懈。高僧傳第一稱其「義理明晰，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又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詳譯之首。」靈帝末，關中擾亂，乃振錫江南，或稱爲南方佛教之祖。

支謙 (Lokasinh)，全名爲支婁迦讖，月支 (氏) 人，漢桓帝末至洛陽；靈帝光和、中平

間（一七八——一八九）譯經甚多。高僧傳稱「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所譯多屬大乘，且爲大乘譯經之嚆矢。後不知所終。

竺佛朔，亦作竺朔佛，天竺人，後漢靈帝光和二年（一七九），齋梵本道行經來洛陽，並譯爲漢文，高僧傳稱其「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義。」

支謙字恭明，一字越，月支人，祖父時已率數百人歸化。支謙之再傳弟子也，師支亮，故號三支。通六國語言，佛經以外，兼通多種俗學。漢獻帝末，避亂於吳，孫權拜爲博士，從吳黃武元年（二二二）至建興中（二五二——二五三）譯經四十九部，高僧傳稱其「曲得聖義，辭旨文雅。」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蓋從海道東來也。其人「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吳赤烏十年（二四七）至建業（卽南京），孫權准建塔寺，號「建初寺」。實爲佛教傳於中國東南之第一功臣。其所譯經，高僧傳亦稱「妙得經解，文義允正」，「辭趣雅使，義旨微密」。晉武太康元年（二八〇）卒。

天竺曇摩迦羅（Dharmakala）（譯云法時，佛祖統紀卷三五，摩作柯。）於嘉平二年（二五〇），在洛陽白馬寺，譯出「僧祇戒心」。是乃摩訶僧祇律之戒本。

魏正元中（二五四——二五五）又有安息國沙門曇帝（一作曇無諦）（Dharmasatya），

此云法實。善律學，亦於洛陽白馬寺譯出曇無德羯磨，卽曇無德部四分律之受戒作法也。

嘉平末，在同一寺中，又有天竺沙門僧跋摩（梵名僧伽跋摩，又作僧伽婆羅）（Sangharman）譯出那伽長者所問經等四部經。或以爲現存「無量壽經」亦其所譯。

第二節 三國及西晉時中國之梵譯名家

朱士行以作朱士衡，爲中國最早西遊求學者，但僅至于闐而止。出發時爲魏甘露五年（二六〇），早於法顯者凡一百四十年，爲今河南許昌人，以俗姓著稱。漢靈帝時，竺佛朔譯有道行經，士行出家後，專務經典；及講道行經，乃病其意義未明，遂西去求經；及至于闐，得般若梵書正卅九十章。晉武帝太康三年（二八二）遣弟子弗如檀（譯曰法鏡）等十人，送至洛陽。未發時，于闐王爲當地沙門所惑，不准携經，士行當王前曰：「若經當東傳，則投火不學，若我經於火，火果滅。」後以八十高齡，卒於于闐。

至洛陽，有居士竺叔蘭，本天竺人，父避難居河南，精梵漢文；由西域無羅叉比丘執梵本。叔蘭口譯爲漢文，祝太玄、周玄明筆受，稱爲「放光般若」。太安二年（三〇三），沙門竺法寂更與叔蘭校寫，至永興元年（三〇四）始成定本。叔蘭後自出經兩種，皆佚。

中國佛經之翻譯，其在鳩摩羅什之前者，應以竺法護爲第一，通三十六國語文。其人先世

爲月氏人，後以從天竺沙門竺高座出家，按當時風俗，卽隨師姓姓竺。然法護實世居敦煌，敦煌設郡以後，應稱中國人。然法護之名仍爲梵語曇摩羅刹或曇摩羅察（*Dharmaraksā*）（按外國譯師前後同此名者凡四人）之漢譯。曾隨其師遍遊西域諸國。秦始皇二年，費梵本，自敦煌經長安而至洛陽，又之江左，沿路不停譯經，至永嘉二年（三〇八）已譯出百六十五部，時人或尊之曰敦煌菩薩。晉武帝末，隱居深山，旋立寺長安。宣揚佛法凡二十年，從者數千人；助其翻譯者有聶承遠及子道真。高僧傳稱其所譯經「雖不辭妙婉顯，而宏達欣暢。」

惠帝時，譯經名家有帛遠，字法祖，撰老子化胡經之道士王浮，卽苻與祖辯論者。

第三節 東晉時東來高僧鳩摩羅什

東晉時，東來高僧應以鳩摩羅什（*Kumarajiva*）爲第一，而中國佛教譯經鉅子，前有羅什，後有玄奘，固先後輝映，昭耀中國佛教史乘者。

鳩摩羅什，其梵名之正確譯音，應爲鳩摩羅耆婆，略作羅什，或什，譯曰童壽，其先天竺人，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辭相位出家，東度葱嶺，龜茲國王郊迎入境，請爲國師，以妹耆婆妻之，遂生什；時在晉康帝時（三四三或三四四）。七歲隨母出家；九歲隨母渡辛頭河（印度河）入罽賓，就名師槃頭達多；十二歲隨母返；尋至疏勒，並師事莎車王子兄弟二人；又隨

母至溫宿國，與道士某辯論，龜茲王迎歸國；二十歲受戒於王宮。時其名已聞於中國。

前秦建元十八年（三八二）九月，苻堅遣師伐龜茲及焉耆諸國，大將呂光殺其王白純，立王弟震，見什年少，以常人視之，並娶其妻王女，又屢辱之，什無異色，光慚愧而止。還。回至涼州，聞苻氏已滅，遂自立，稱涼王，什羈於涼者十八年，無所宣化。後秦弘始三年（四〇一）姚興遣將討呂隆，降之，迎什入關，十二月抵長安，與以國師禮之。什以前所譯經，或義有未達，或詞不通暢，遂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使沙門八百餘人助譯；興亦執經與僧五百餘人，研究其義旨，然後寫成。此後仍繼續翻譯，凡三百餘卷。嘗論佛經梵文原本及漢譯本曰：「天竺國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爲尊。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姚主以法師聰明過人，天下無二，不可無嗣，逼受使女十人。佛教載籍稱其人神情朗徹，傲岸出群；且篤性仁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晉義熙五年，後秦弘始十一年（四〇九）寂於長安大寺，年七十。（其卒年尙有前三年及四年二說）

第四節 東晉時其他東來高僧

（一）弗若多羅（Puruyata），譯曰功德華，屬賓人。後秦弘始中（三九九至四一五）入

關，姚主以上賓待之，鳩摩羅什亦甚崇敬。嘗與羅什集僧數百人，譯經於長安寺中，多羅誦梵文，羅什譯爲漢文，未竟其業，遽爾棄世，人多惜之。

(二) 卑摩羅叉 (Vimalakṣas)，譯曰無垢眼，亦屬賓人，先在龜茲弘調律戒，鳩摩羅什亦嘗師事之。龜茲亡後，先避地他處，聞羅什在長安，冒險東渡，以後秦弘始八年（四〇六）抵關中，什以師禮敬待；及什棄世，又乃出遊關左。又南至江陵；通漢言後，各方問道者如林；每有撰述，輒相傳寫，卒年七十有七。

(三) 佛陀耶舍 (Buddhayaśas)，譯曰覺明，亦屬賓人。幼從巫師出家，年二十七方受戒。後至沙勒國。苻堅遣呂光等伐龜茲，沙勒王自率兵相救，留耶舍輔太子，並委以後事。及龜茲敗，聞鳩摩羅什被俘，以相遇雖久，未盡懷抱爲恨；聞什在姑臧，往訪，則什已入長安。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微，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譯，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耶舍以羅什在，乃來，與自出問候，另立新省於道遙園中。羅什時譯十住經，月餘不敢落筆，待耶舍，相互研討，詞理力定。道俗三千餘人，莫不嘆賞。耶舍此外所譯經尚多，後辭回外國，主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託商賈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四) 鳩摩提婆經 (Buddh-bhadra) 譯曰覺賢，又曰佛賢，以譯華嚴經著稱。北天竺人。

遊屬賓，適中國沙門智嚴，在彼訪求同道，未得其人；遂諮詢其國民，群推重之，嚴亦苦求，遂憐而許焉。越葱嶺，凡歷三載。高僧傳初集卷二，謂其「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卽往從之。」惜不詳其自葱嶺至交趾一段路程。義熙二年（四〇六）至長安，羅什大悅，有疑義，必共諮決。後至建康（卽南京），義熙十二年（四一六）與法顯共譯經於道場寺，所譯華嚴經，實肇華嚴宗之端緒。其經通稱晉譯華嚴，又名六十華嚴，自義熙十四年（四一八）至宋永初二年（四二一）譯畢。元嘉六年（四二九）卒，年七十一。

第五節 南北朝時往來南海之中西僧人

繼法顯後往來南海之僧人，據高僧傳，南北朝可考見者，約有十人，內中國三人，扶南三人，天竺四人，中國僧人一名智嚴，先遵陸路至天竺，歸國後復汎海路重至天竺；一名曇無竭，於宋永初元年（四二〇）往天竺，後在南天竺隨船汎海達廣州；一名道普，宋太祖遣將青吏十人西行求經，至長廣郡，船破傷足，因疾而卒，扶南僧人一名僧伽婆羅，此言僧養，梁天監五年（五〇六）譯經揚州；一名曇陀羅，梁言宏弱，繼僧伽婆羅而來；一名須菩提，此言美吉，陳時在揚州譯經，以上六人，均知其汎海而來，惟行程皆無可考。天竺僧人一名佛馱跋陀羅，

詳前第四節；一名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從師子國航海至闍婆，宋元嘉元年（四二四）汎海至廣州；一名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宋元嘉十二年（四三五）亦從師子國汎海至廣州；一名拘那羅陀，此言親依，元嘉二十三年（五四六）從扶南達廣州。諸人行程雖多不詳，然其止航地則有山東半島之東萊，南岸之長廣，及交廣二州，當時外國船舶且有溯江而上至於揚州江陵者，交通之發達，可想見也。茲更記國人智嚴及曇無竭之事蹟：

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即以精勤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本城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晉隆安三年（三九九）共法顯等行抵烏夷，爲求行資，遂返高昌。復往西國，進至罽賓，從佛馱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馱先見其禪思有緒，特深器異。時佛馱跋陀羅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傳法東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越沙險，達自關中，頃之跋陀被擯，嚴亦分散。晉義熙十三年（四一七）劉裕西克長安，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牀，禪思湛然，恢心敬精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高潔法師也。」恢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既屢請謙至，二人推嚴隨行。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至元嘉四年（四二七），乃共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是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

達。既得戒，於是步歸，至屬寶無疾而化。

曇無竭，此云法勇，俗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沙彌，卽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四二〇），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五人，共齋糲蓋供養之具，發迹此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河西郡，進入流沙，至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旣空曠，惟齋石蜜爲糧，同侶十三人，八人死於道；將至舍衛，又遇師象；及度恒河，復值野牛。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迹別有記傳。後不知所終。

第六節 隋以前中外求法譯經僧俗總錄

自漢迄南北朝，中國西行求法者，不可勝數，或姓名已佚，行實不彰；或未譯經，無所傳世；至於東來外國僧俗，當以譯經之功爲最弘，與中西文化交流之關係亦最深；茲據馮承鈞編「歷代求法翻經錄」及他書，爲列名於此：

（漢）東來譯經僧俗十人：印度人四，安息人二，月支人二，康居人二。

摩騰、竺法蘭、竺佛朔，竺大力；安世高、安玄；支謙，支隱；康居、康孟詳。

(三國) 魏吳二國共有外國譯經師十人：印度人三，安息人二，月支人二，龜茲人一，康居人一，康居人世居印度又徙交趾者一，即康僧會。

曇摩迦維、維祇難、竺律炎；曇諦、安法賢；支謙、支暉、梁接；白延；康僧鎧；康僧會。

(西晉) 中國西行求法者三人；外國譯人五；印度人一，安息人一，月支人一，西域人一；又一外國人，如非印度人，即係印度化之西域人，即若羅殿。

朱士行、竺叔蘭、法護；彌梁婁至；安法欽；支法度，無羅叉；若羅殿。

(東晉) 西行求法可考者五十一人，外國譯人可考者二十七人；印度十七人，西域三人，月支二人，龜茲一人，印度人世居龜茲者一人，康居一人，吐火羅一人，不詳何國者一人。(馮承鈞誤作印度十八人，西域二人。)

于法蘭、康法朗、竺佛念、慧常、進行、慧辯、法領、法淨、曇猛、法顯、寶雲、智嚴、慧景、道整、慧應、慧鬼、慧簡、僧紹、智羽、智遠、僧景、慧達、智猛、慧叡。竺曇無蘭、曇摩持、鳩摩羅佛提、僧伽跋澄、曇摩婢、曇無讖、竺難提、曇摩掘多、曇摩耶舍、卑摩羅叉、佛陀耶舍、弗若多羅、曇摩卑、佛跋跋陀羅、迦留陀伽、僧伽

羅久、僧伽提婆；曇摩流支、僧伽陀、祇多蜜；支道根、支旃菴；僧尸梨蜜多羅；鳩摩羅什；康道和；國摩難提；佛圖羅刹。

(亂宋) 西行求法者七十餘人，內佚名者六十餘人；外國譯經師十人；印度六人、西域三人，但知爲外國人者一。(馮承鈞作印度五人，又加吐火羅一人，誤。)

沮渠京巖、道泰、曇無竭、僧猛、曇朗、僧純、曇允、竺道曼、智猛、曇纂、竺道嵩、道普、法盛、法獻、法維、僧表。

佛財什、僧伽跋摩、求那跋摩、曇摩蜜多、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羅；功德直、浮陀跋摩、曇良耶舍；伊葉波羅。

(元魏北齊北周) 西行求法者十九人，內佚名者三人，東來譯師十二人，皆印度籍。

曇覺、威德、道榮、慧生、宋雲、法力、子統、王伏、寶暹、道邃、僧曇、智周、僧威、法寶、智昭、僧律。(寶暹等一行共十一人，知名者八人，馮承鈞作十人，誤。)

吉迦夜、曇流支、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毗目智先、達磨菩提、攘那跋陀羅、達摩流支、闍那耶舍、耶舍崛多。

(南齊梁陳) 東來外國譯師十人；內印度人四，西域人三，扶南人三。

曇厚伽、求那毗地、波羅末陀、月婆首那；摩訶乘、僧伽跋陀羅、達摩摩提；曼陀羅、僧伽婆羅、須菩提。

第十七章 法顯等之訪印及貢獻

第一節 法顯歷遊天竺記傳佛國記研究

佛教傳入中國稍久，外來僧侶傳譯之經典，漸爲中國學佛者所不滿，於是有發願親往印度求經並習梵文者，法顯雖非第一人，然最負盛名。

法顯之功績不僅在譯經及弘宣教旨，其所記旅程雖僅九千五百餘言，然精確簡明，包括往返西域歷程及航海經驗，尤爲今日研究中西交通史及中亞中古史地者必需之參考資料。故特立專章記之。

研究法顯之最重要資料，卽其自天竺歸後所作之遊記。書成於義熙九年十年之間，二年後又略加增補。

此書異名甚多，據日人足立喜六著「法顯傳考證」（何健民、張小柳合譯）統計，有：

佛（歷）遊天竺記 一卷

歷遊天竺記傳 一卷（或無卷數）

法顯傳 一卷（或作二卷，或無卷數）

法顯行傳 一卷

法明遊天竺記（唐人避中宗諱顯改）

在智昇「開元釋教錄」未出前，概名曰「歷遊天竺記傳」，其後則多稱「法顯傳」，但約附「法顯自記遊天竺事」。至隋書經籍志地理部，則改稱「佛國記」，然又收於史傳部，仍名「法顯行傳」，實爲一書異名。國人談域外地理而援引此書，較早者，有李光弼之漢西域圖考，時在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其次爲道光間，魏源著「海國圖志」；民初丁謙著有「佛國地理考證」，殊不足取。民國二十三年商務版「佛遊天竺記考釋」，亦極簡略。

近世歐洲翻譯是書者，喜用「佛國記」或「法顯佛國行記」名。計有下列數種：

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巴黎版，Abel R musat 譯，書名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hiques: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dans l' Afghanistan et dans l' Inde, exécuté, à la fin du IV^e siècle. Ouvrage postume revu, complété, augmenté et éclaircissemens nouveaux.* par Klaproth et Landresse.

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倫敦版，Samuel Beal 譯，書名 *Travels of Fah-Hian and San-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倫敦及上海版，Herbert A. Giles 譯 *Fa-hsien, 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牛津版，James Legge 譯，Fa-hsien,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Chinese Monk Fa-Hia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 D. 399-414) in search of the books of Discipline.

一九一三年劍橋版，H. A. Giles 譯，Fa-hsien, 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A. D.)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歐洲學者之通病爲不知校勘正文；民國二十四年日人足立喜六著「法顯傳考證」，據日本所藏古寫本及古刻本作版本之研究，並詳爲校釋，允稱善本。

法顯傳後編入大藏經，惟宋時大藏經官私刻版雖多至二十餘種，現僅存北宋版二種，南宋版一種及高麗版，今皆歸日本；北宋版法顯傳藏於京都市東寺及宮內省圖書寮，南宋版法顯傳則藏於東京增上寺及埼玉縣川越喜多院。高麗版新版藏於東京增上寺。寫本法顯傳，現存者不少。

至於叢書之收有佛國記者有原刻秘冊彙函、肆遠秘書、說郛、漢魏叢書、學津討原及唐宋叢書。

第二節 法顯略傳及其去印路程

法顯傳記有梁僧祐撰「三藏記集傳卷十五」、梁慧皎撰「高僧傳卷第三」、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三」及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三」等。

法顯俗姓殷，晉平陽郡武陽（山西襄垣縣）人。三兄皆髡髮夭折，故法顯三歲即度爲沙彌。因歸於律藏殘闕，遂於隆安三年、弘始元年（三九九）自長安出發，欲至印度尋求戒律，同行者慧景、道整、慧應、慧鬼等十一人，但異日歸來時獨法顯一人，故梁慧皎有云：「發跡則結旅成群，還至則顧影唯一。」過隴山，經張掖，值亂，道路阻塞，時北涼王段正都張掖，遂留作檀越。後至燉煌，記曰：「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停一月餘，後過沙漠，記曰：「多有惡鬼、熱風，遇到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爲標識耳。」

沙漠中行十七日，約計一千五百里，至鄯善，住一月。其地在羅布淖爾之西南，羅布淖爾即所謂蒲昌海，又名樓蘭海、牢蘭海，蓋鄯善即漢之樓蘭。又西行十五日到焉耆國，即漢之焉耆。智嚴即從此返高昌，後又至闐賓，詳前。

法顯更西行，至于闐，即今和闐，過葱嶺。記曰：「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

女石留、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又記曰：「葱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彼土人即名爲雪山人也。度嶺已，到北天竺。」度新頭河，又名信度河，（非印度河本流）記曰：「昔人有鑿石通路極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類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減八十步，猶言不足八十步也。

自北天竺至中天竺，亦有「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佛法甚盛。」到憐陀衛國，（卽健陀羅，或作乾陀羅）記迦賦色伽王造塔事，書中作「賦伽王」。至那竭國，記佛頂骨精舍「鑿大鼓、吹螺、敲銅鈸」。

法顯過小雪山，至羅夷國、跋那國，又渡新頭河，至毗荼國，記曰：「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慙，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爲道遠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法。」其時已爲晉元興二年，卽公元四〇三年。毗荼國大唐西域記作鉢伐多國，今之 Doh。新頭，又作信度。

法顯歷訪中天竺與東天竺，原書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歎秦地，衆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得佛，願不生

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

第三節 法顯自印度歸國之路程

法顯由中天竺，順恒河而至海口多摩梨帝國 (Tamalitti)，今名 Tamruk，溯 Hooghly 河約六十哩，而位於河之西岸。大唐西域記作「耽摩栗底國」。在加爾各答西南。傳記曰：「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商人大船，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二年當爲義熙四年五年（四〇八、四〇九）。師子國即今錫蘭島，又名「執師子國」或「僧伽羅國」。遊記對錫蘭島描寫頗多，住其地亦二年，當爲義熙六年七年（四一〇、四一一）。

法顯在錫蘭求律藏畢，乃航海東歸，記曰：

「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卽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來多，卽斫繩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漏，卽取龜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君墀（兩口水瓶也）及澡灌並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

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瀾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龜、鼈、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法顯所謂「到一島邊」，或即指今 Nicobar 島。所謂「九十日許」，或云當解作九日十日，即約十日之義。對於耶婆提之考證，近人多主卽爪哇，日人足立喜六以爲非是。因爪哇古記雖稱爪哇 (Java) 原稱 Yavadhīpa，然古記無人目覩，不能斷言其真實性亦非今日之 Palembang，蓋其地佛教極盛，法顯則稱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足立喜六之揣測，以爲法顯必由 Nicobar 島漂流九十日許，入馬來海峽，然後達蘇門答臘島東北之耶婆提國。

法顯在耶婆提停五月，續記曰：

「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費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趨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

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爲一人令我等危險。法顯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並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于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過期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藜藿依然，知是漢地。」

長廣郡在今山東東南，膠州灣東北；牢山今名勞山，在卽墨縣東南六十里。計自隆安三年（三九九年）三月間自長安出發，至義熙八年（四一二）七月十四日登陸青州，凡十三年又四月。

第四節 法顯回國後事略

法顯抵山東青州勞山南岸後，續記曰：

「然不見人民及行跡，未知是何許。或言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卽乘小船入浦，覓人欲問何處。得兩獵人，卽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法顯先安慰之，徐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問：『汝人山何所求？』其便詭言：『明當七月十五

日，欲取桃臘佛。』又問：『此是何國？』答言：『此青州長廣郡界，統屬晉家。』聞已，商人歡喜，即乞其財物；遣人往長廣。太守李嶷敬信佛法，聞有沙門持經像乘船汎海而至，即將人從至海邊，迎接經像，歸至郡治。商人於是還向揚州。劉沈、青州請法顯一冬、一夏。夏坐訖，法顯遠離諸師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禪師出律。」

臘佛即七月十五日盂蘭盆會。獵人避言殺生，故詭言取桃，法顯到長廣郡時，南燕滅亡已二年，值羊穆之拜北青州刺史，圖謀復興，故曰「統屬晉家」。沈爲水名，在兗州，故兗州亦稱沈州；法顯以義熙八年七月十四日漂抵勞山，返揚州，九月到京口，即今丹徒縣，而劉道憐於同年九月拜兗、青兩州刺史，故稱「劉沈青州」。資治通鑑卷一一六亦稱「劉兗州」。夏坐爲釋迦遺法，即每年在雨季三箇月中，入禪靜坐，名曰「雨安居」，亦曰「夏坐」或「坐臘」。是爲義熙九年（四一三）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續記曰：

「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滅三十國。沙河已西迄于天竺，衆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說。竊惟諸師未得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危而得濟，故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是歲甲寅。」

甲寅卽義熙十年（四一四），九年七月下旬至建康，十年完成紀行稿。所謂「滅三十國」者，卽不足三十國之義，蓋不計沙河以東之四國，及屬饒夷城、迦維羅衛城及拘夷那竭城，此三城，玄奘皆稱國；如此，僅二十七國，正合。

法顯傳卽歷遊天竺記傳佛國記有宋僧所爲跋，足供參考，並錄於後：

「晉義熙十二年（二字疑衍），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人。既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歲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叙始末。自云：顯尋所經，不覺心之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於是感嘆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將，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第五節 宋雲惠生等之西行

自魏甘露五年（二六〇）朱世行首作于闐之行，法顯繼之（梁高僧傳第三）；又其後則有中國僧人寶雲（同上）、慧叡（同上第七）、智猛（同上第三）、法勇（同上）、道秦（同上）、智嚴（出三藏記集第十五詳前）、道樂（釋迦方志）等，作佛教之朝聖及求法而赴西

域，時在第四世紀末葉，至第五世紀中葉，更據出三藏記集第十四、宋元嘉中（四〇二—四五三）高昌國沙門道普受宋太祖之寶給，率僧徒三百人赴西域求經。又歷代三寶記第三及第十二，載北齊公主武平中（五二〇—五七五）沙門寶暹、道邃、僧曇、智周、僧威、法寶、智照、僧律等十一人，同往西域求經。

法顯歸國百年後，魏孝明帝熙平元年（五一六），胡太后命使者宋雲與沙門惠生（亦作慧生，釋迦方志作道生）輩赴西域朝佛，並獻供品。宋雲撰有家記，惠生撰有行記，皆不傳，惟楊街之撰洛陽伽藍記卷五中可略見二人行踪。以正光三年（五二二）回洛陽，得大乘經論一百七十部。是在外凡六年。

法人萊慕沙於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譯佛國記時，即已附有洛陽伽藍記之法譯；後英人皮爾於同治八年（一八六九）譯爲英文，附所譯西域記之前。丁謙有宋雲求經記地理考證。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沙畹又有新譯本，載於遠東法國學校校刊是年之七八九月合刊中；同年有單印本，安南河內出版。馮承鈞譯「宋雲行記箋註」，載「禹貢」四卷一至六號。

宋雲爲敦煌人，故出發前必已習聞國外地理及旅行情形。而北魏永熙十六年（梁武帝太清元年五四七）楊街之著洛陽伽藍記，所據材料，自云得自「道藥傳」及「宋雲家記」。按節錄之：

「初發京師（卽洛陽），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至捍磨城，……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四九五）、景明三年（五〇二）、延昌二年（五一三）。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興時幡。……至于闐國。……神龜二年（五一九）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月，登葱嶺山。……九月中旬，入鉢和國。……十月初旬，入厭曠國。……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國王見大魏使宋雲來，拜受詔書。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宋雲遠在絕域，因屬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至正光元年（五二〇），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宋雲詣軍通詔書，王因慢無禮，坐受詔書。……曰：『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

丁謙謂赤嶺卽今西寧丹噶爾西南一百三十里之日月山。宋雲等一行，似先至青海，然後至

羅布泊南岸之都善，蓋吐谷渾族，當時正居於青海也。左末，漢書及魏書西域傳作且末，今作車爾成。捍巖城，斯坦因考爲和闐東北五十五英里之烏村塔第 (Uzun-tati)。朱駒波，或作朱居波、朱俱波、朱俱槃等，葉爾羌附近之加爾伽里克 (Karghalik) 也。漢盤陀或作渴槃陁、漢陀、渴飯檀、渴盤陁，玉爾譜卽帕米爾東之撒里庫爾 (Sarikul) 及塔什庫爾干 (Tash Kur-shan) 一帶。波斯或爲東波斯之簡稱，其時東至葱嶺之麓，皆稱東波斯。烏場亦作烏婁、烏仗那、烏茶、郎茶等，其地無定所，蓋指御苑也。參見前第十五章第二節。

(附記)

南北朝時，漢文佛典亦有譯爲外國文者：

(一) 北魏曇無最著「大乘義章」，外國沙門菩提流支讀之，每加讚嘆，譯爲胡書，傳之西域。見伽藍記。

(二) 北齊劉世清能通四夷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之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可汗。勅中書侍郎李德林爲之序。見北齊書斛律羨傳。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西交通史 (一)

作者 =

页数 = 2 4 8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